

蔣党真相

著勳 翊

印翻部治政區軍疆新



目錄

蔣黨真相

曾國蕃的治兵術	三
「精神感召」	五
「揮金如土」「一錢如命」	七
陰謀起家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最後代理人	八
第一個升降機——「左派」右派	一一
流氓本色	一五
「無齒之徒」	一九
第二個升降機——「黨統」與軍閥	二二
「分而治之」——縱的割據	二六
柯建欽——陳誠——胡宗南	二九
朱伯「小諸葛」	三五
CC團	三七
藍衣社	四五

「十三太保」	四六
製毒籌款	四七
賀衷寒與劉汝霖	四八
暗殺專家	四九
「國際情報」	五二
藏笠二三事	五三
政學系	五四
關於大公報	五七
政學系與其他派系的矛盾	六〇
孔宋財閥	六一
宋子文的理財術	六四
「法幣」與「外匯」	七一
孔祥熙的發財法	七五
所謂「英美派」	七九
新舊「夫人派」	八五
孫科派	八六
「下詔罪人，破格用己」	九〇
「副總統」李宗仁	九二

附 錄

勝利前後

「百萬皇軍守護上海」	一〇〇
「共死圈」	一〇一
日本投降了	一〇三
三位一體	一〇四
「新太子派」	一〇六
關於吳紹澍	一〇七
「忠救」與中美合作所	一〇九
「以毒攻毒」	一一〇
接收報館	一一二
發了一筆大財	一一四
湯恩伯與錢大鈞	一一五
接收敵產與逮捕漢奸	一一七
偽官可用。偽學生要罰	一一八

MG
D693.74
808



3 2173 5339 4

前言

「蔣黨内幕」在「新華文摘」陸續發表之後，按書店編輯部同志來信，說要印單行本。「內幕」兩個字是寫了第一節時隨便裝上去的，如作為「LITSLIP」的解釋，像根室的「歐洲內幕」那樣，這也可以叫做「內幕」；但咱們中國的習慣，一提到「內幕」，似乎應該是「此中人語」，必須暴露許多外人完全不知道的祕密事情才對；而我所寫的許多故事，則都是有很多人知道的，現在看起來，雖有一部分像是隱瞞，而在那時那地則是公開的祕密，不過沒有在報紙上公開刊載而已，而另一部分則是完全公開的。所以在出單行本的時候，不得不把「內幕」兩字改去，而用「蔣黨真相」，以免某幾讀者誤會而失望。

開始寫「小東西」的時候，手頭毫無參考的資料，完全憑記憶，究竟能寫多少，毫無把握。後來有空即寫，最初擬寫十來節，後來擬寫成二十多節，最後則寫了三十一節。寫好即送給書店，居然積起來有七八萬字，實出於意外。但正因爲是「泥羅荀泥段拔」的緣故，有些先緊後鬆，前面的寫得少而簡略，後面的寫得多而詳，顯得輕重多寡不勻。

十餘年來，常搜集近代歷史事件與重要人物的資料，抗戰時期曾搜集過幾百個名人的出身，發展經過與態度，一百多個資本家的資本累積過程，常想假以時日，能整理出一些規律或系統出來，爲專門作研究工作的人提供些有用的材料。在上海、在香港，經過三次的大變，三次都丟得一乾二淨。到解放區之後，舊的材料既難從搜集，又得自衛戰爭的激勵空前，書籍報章也常精簡到一無所有。因此這裏所寫的都是憑個人一時的記憶，沒有任何資料供參考，錯誤（尤其是時間先後）一定不少。但我可以保证：這裏面沒有一個字、一句話是我加添的。只有脫漏（憑腦子無法記得完全）而決沒有絲毫增加；只有記錯（如一件

2

事情中有一二個人的姓名搞錯，而決沒有絲毫捏造；寫在括弧裏的文句，可能有語氣輕重或詳略之出入，但大體上是正確的。對於記憶中已很模糊的事情，不論如何重大，我都沒有寫。希望各地讀者對錯誤、脫漏之處，加以指正，來信可寄山東新華書店編輯部轉。

翊勳

一九四八·五·二十六·

蔣黨真相

曾國藩的治兵術

湘鄉曾蔭生（國藩）爲中國近百年間的重要人物，捧他的頌之爲聖人，罵他的就說之曰漢奸。究竟他是好是壞，極易判斷，只要看那誰辦事，反對的是那一階級，就黑白分明。他死於南京的兩江總督任內，南京玄武湖一個亭子上過去懸掛他的遺像，辛亥革命後，像上的眼睛被人挖去了，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不料過了十餘年，這位詔祭異族，屠殺同胞的「英雄」，忽然又交起好運，蔣介石把曾國藩捧上三十天，不論治軍治家，處處奉「曾文正公」爲規臬；在鄂豫皖湘贛「剿共」的時候，曾大軍印行「曾胡治兵語錄」頒發給他的部下研究；提倡「禮義廉恥」的「新生活運動」，更是根據曾國藩「原才」一文的理論——在一二人的倡導下，可以使天下移風易俗，撥亂爲治；抗戰以來，蔣經國在贛州，每兩星期必須寫一封長信給他，而且一定要寫楷書，還是刻意摹仿曾國藩的家書，尤其明顯。

蔣介石爲了什麼這樣崇拜曾國藩呢？除去「方以類聚，物以羣者」，臭味相投的一般性原因之外，特別是因爲曾國藩是中國軍閥建軍的祖宗（在曾國藩之前，正規軍爲綠營，是統一的，他創始了湘軍，才有李鴻章的淮軍，袁世凱的北洋軍），他的治兵方術，是反人民軍隊唯一的有效辦法。這一點，蔣介石的老師段祺瑞，和他的「太先生」袁世凱，都沒有蔣介石那樣體會得深刻。

曾國藩以在籍侍郎辦團練，招募一大批農民爲保衛地主豪紳的利益與另外的「批農民作戰，這件事已不大好辦，後來「率領湘勇出省殺賊」，當然更不好辦——在本地時還可以用「保衛家鄉」——實際是保衛地主——的口號騙人，出省就不能再用了，而打仗是要拚命的，農民爲什麼肯爲滿清和曾國藩拚命去殺另外

一批農民呢？聰明的曾國藩想出了一個欺騙窮人拚命的辦法，就是每打下一個地方，允許官兵大搶數日，以刺激其士氣。在曾國藩的叢書中，他寫信給其九弟國荃，常有「想見大寨三日」、「大寨十日」的詞句，所謂「大寨」，名義上是搜索「殘敵」，實際則是搜索財寶，公開搶劫。搶劫之餘，強姦婦女當然是通中應有之文。

曾國荃攻入南京時，先鋒爲提督李臣典，照官家文書的記載，李臣典日夜血戰，進城後不久卽力竭身死。蔣清追念其功績，封世襲子爵，大家都相信李臣典是作戰過勞而死的。民國十六年大革命失敗後，李昌芬同志亡命來投，在我創辦的一個中學裏教書，工餘閒談，始知他是李臣典的曾孫，談起他曾祖的軼事，才知道李臣典的死，是另外一種「過勞力竭」。破城之役，李臣典是辛苦了幾天，破城後經過強姦了兩個婦女，致脫陽而死。提督是清朝武職中最高的官，本身如此，其部下的紀律就可想而知了！（李昌芬同志於民國十七年夏遭蔣介石的毒手，在南京就義！）

民國初年湖南農民當兵的最多，除農村破產的一般原因外，還有一個因素，就是受曾國藩部下湘勇在蘇浙皖贛搶掠發財的影響。（湘勇無謂犧牲的爲數甚多，但在舊社會中，窮人的性命並不值錢，死了是沒有人會掙到的！）左宗棠部下的周揚督，是雇農出身，因挑送地主的禮物在中途賭錢輸去了，就逃到左宗棠部下當兵，連升到總兵，回家後成了本縣最大的地主，從縣城到他家近一百里，道路兩旁的田都是他的。

放縱官兵搶掠雖然能夠刺激其拚命，打下一個地方，就可以發財；但不能鞏固部隊，因爲官兵搶飽了就想開小差回去，即使不能開小差，有了錢也就不肯拚命。於是曾國藩就想了第二個好方法，叫官兵賭博，在賭博中把官兵的錢都騙光了，於是再鼓勵他們去打仗。士兵拚命打仗，打勝了好搶老百姓的財寶；搶到後在賭博中被軍官騙去；騙光後再拚命，再搶掠，如此循環不已，湘軍軍官（中國最早的軍閥）就發了大財。

左宗棠是曾國藩一手提拔的（左在湖南巡撫羅榮處當幕府，因設獎獎山——贛——的父親，被羅

南官紳所彈劾，曾國藩保薦他「才可大用」，反得破格擢升，但在最不佩服曾國藩，說他最虛偽。左宗棠對曾國荃却投契，說「曾九是血性男子」。左宗棠曾問國荃：「九帥一生得力之處何在？」曾國荃回答他有兩句話：「殺人如麻，揮金如土！」左宗棠大為佩服。曾國藩的家庭成份是富農，後來則成爲營地主，家中並不是豪富，當然沒有「如土之金可揮」，曾國荃雖做過幾任督撫，但都因不善於敷衍上司和同僚，時間均很短，刮地皮也刮不到許多，他所揮的金從何而來的呢？當然是帶兵時搶來的騙來的。（曾國荃打下南京後回籍置田百頃。）

曾國藩靠這兩手，所以能組織幾十萬軍隊進行反人民戰爭，所以蔣介石要事事摹仿，處處崇拜他。

蔣介石發動內戰以來，「中央軍」紀律之壞，有口皆碑，「中央來了一掃光」的民謠已遍及全國。淮河還有一個民謠：「盼中央，望中央，中央來了稿了一肚子小中央」，更是刻畫得入木三分。爲什麼壞到這樣，因爲他得了曾國藩的衣鉢真傳，知道非如此就不能「鼓勵士氣」啊！

「精神感召」

蔣介石一生翻手爲雲，覆手爲雨，權謀超過袁世凱。尤其是削弱地方勢力成績卓著。其中如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劉湘，都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從來沒有人能奈何他（劉文輝劉湘叔姪之間爭奪，最後還是劉湘佔優勢），但碰到了蔣介石，就都被搞得四分五裂，不是土崩瓦解，就只得抱殘守闕。蔣介石在抗戰之前所辦的廬山「軍官訓練團」，的確收極大的效果，許多地方集團的中級將領（師旅長）到廬山受了幾個月的訓，心就變了，傾向於蔣介石了。蔣介石的嚙噬們，說是「由於委員長的人格偉大，他們受了姜座的「精神感召」，所以心悅誠服地歸向中央」。

蔣介石常常講「精神」和「道德」，他的言論中充滿了唯心論的色彩，但在實踐方面却是庸俗的機械的「唯物論者」，如誇張「日本可以三日滅亡中國」，沒有飛機就不能打仗之類，就是一個例子。蔣介石的道德如何，是否「足以服人」？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究竟用什麼「精神」能「感召」別人傾向他呢

據熟悉廬山訓練團内幕的人說，蔣介石的「精神感召」過程如左：

廬山訓練團的教育課程包括蔣介石的訓話在內，都是官樣文章，主要的工作是派的許多纏綿的特務分插在各班，了解地方將領的生活、歷史、財產及與地方長官關係，特別是長官和他的經濟關係，曾經給他發過多少財。到訓練完畢，蔣介石即分批接見受訓的將領，簡單詢問一些部隊的疾苦，說些好話，無非是關心他們，愛護他們，有什麼困難一定代為解決等等的官面話，這就是所謂「個別訓示」。「個別訓示」之後，受訓將領就要整裝回防了，蔣介石的侍從室就分別有人去訪問他們，說「委員長特別關心你，所以叫我單獨送些路費。」這一筆路費，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沒有經過手的大數目，對西北軍和晉綏軍一類的軍官，數目是十萬二十萬元；對四川軍廣東軍一類的較富庶地區的軍官，則多到八十萬或一百萬元，反正這一筆錢比收受人的全部財產還要多。收受者拆開封套看到這樣一筆大數字的支票，不由得神精為之震盪，通過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怎樣看花了。於是他的「精神」就開始「感召」了！接着再想：「我跟了某某人（原來的長官）十幾年，或幾十年，為他出力拚命，他從來也沒有給我搞到這許多錢；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筆錢，結果大部分被他拿去了，我只落得很少一部分；或者是某一地區是很有出息的，我能駐防了一年半年也可以得到不少油水。但他一定要調劑別人而不肯調劑我；過去我那一代為他拚命，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險，他却待我如此吝嗇刻薄，實在大對不起人了！蔣委員長，我沒有為他做過什麼事，他却送我這許多錢，可見他待部下的厚道！」於是這個人的「精神」之被「感召」，就更深一層了，最後回去時，侍從室經手送「路費」的人要介紹一兩位親戚朋友，拜托安插一下，拿到「路費」的將領當然滿口應允，於是隨着特務的打入，日夜宣傳「中央化」的利益，及挑撥原來隸屬關係間的惡感，這位將領的「精神」就完全被蔣介石「感召」去了！

這就是蔣介石「精神感召」的全部過程，及其「偉大人格」的具體「影響」！這就是廬山之所以成爲蔣介石集團的「寶藏」！

「揮金如土」「一錢如命」

蔣介石的「精神感召」，已夠得上就是「揮金如土」了，但在蔣介石二十年來所指揮所擴張的數字中，儼為「滄海之一粟」。如民國十九年蘇馮之戰，蔣的嫡系精銳第三師（師長為張治中），第四師（師長為徐庭瑤）幾乎全軍覆滅，蔣介石用陳誠所獻的計策，以一千五百萬元收買韓復榘、石友三兩人叛變，得以轉敗為勝。那時候，南京政府全年的收入不過兩萬萬元左右，一千五百萬元就佔了三分之一；那時候，蔣介石自己的軍隊不足三十萬，全年的軍餉只要三千多萬元，一下子就付出等於全年軍餉的一半，可見蔣介石用錢用得很慷慨。

民國二十五年夏，蔣介石用二千餘萬元收買陳濟棠的空軍，有人計算一下，比買新飛機還要貴三四倍，說這個買賣不犯着做。蔣介石說：「你不會算賬，這個買賣並不吃虧，而是便宜的！」我們買一架新飛機，只能抵他一架，現在把他的收買過來，我多一架，他少一架，當然一架要抵兩架的價錢；單有飛機還不用，一定要有人，訓練一個空軍人員，比買一架飛機的錢還要多，我訓練一個，也只好抵他二個，收買他一個，則我多一個，他少一個，自然一個要頂兩個。因為蔣介石精明到此地步，於是陳濟棠的「天南王」就垮台了。

在抗戰之前，蔣介石自己的嫡系部隊，武器好，服裝好，吃得更好，嫡系軍官還另外有額外補助費，如李延年，就每年要買一輛最新式的美國汽車，一九三六年快不坐一九三五年的汽車，一九三七年一月，就把一九三六年的汽車換掉了，他們的生活比上海大銀行經理還要闊氣些。錢從那裏來的呢？大部分是蔣介石給的。（在抗戰之前，蔣介石嫡系軍隊吃空額，使佔士兵餉銀的風氣還不大，到抗戰第三年，由於物價飛漲，蔣軍軍官才大家從士兵身上打主意，貪污之風比嫡牌要甚。）

蔣介石的「揮金如土」，已如上述，但還僅是他用錢的一方面，他的另一方面則吝嗇異常，幾幾乎「

一錢如命」。

民國二十六年抗戰勝起，黃任之先生（炎培）沿津浦鐵路北上旅行，回到上海時對友人說：「在徐州同時看到東北軍五十一軍（于學忠部）和中央軍第二師（黃杰部）兩種軍隊的服裝與生活，真是天壤之別！我如果是東北軍，就非造反不可，實在太氣人了！」黃先生是以八面玲瓏著名的，尙且如此憤慨，其對待東北軍的苛刻，也就可想而知了！

民國十九年蔣馮戰爭的導火線就是爲了待遇不公，那時蔣介石與馮玉祥換過兩番不到三年，電報往來，稱兄道弟，馮電請蔣何以對西北軍（那時稱二集團軍）待遇不公，蔣介石覆電申述兩大理由：第一，二集團軍生長西北，向來苦慣的，苦些也不要緊，不妨事；一集團軍（蔣自己統率的）生長東南，就苦不得。第二，二集團軍是馮親自訓練，苛刻苦作風，生活苦些無妨；一集團軍就不行。蔣介石還說：過去所以推兄爲軍政部長，即希望兄能以西北軍之艱苦作風貫徹於全國軍隊。言外之意，就是說：我的一集團軍所以不能吃苦，必須待遇高些，這備責任就要你馮玉祥負。

果真是因爲沒有錢，所以必須苛待西北軍嗎？只要把收買韓復榘、石友三的二千五百萬分出一部分給整個西北軍，馮玉祥也就沒有反蔣的理由與必要了。

抗戰以後，中央機器廠與中央電氣廠均遷到雲南去，把機器廠在山洞裏生鏽，全國經濟委員會的技術人員，一再建議稍增一些機件，即可製造飛機，那時預算只要化費一百五十萬元就可以每月製造一架飛機，先搞起來，以後再擴充。三上呈文；蔣介石和宋美齡（航空委員會秘書長）均置之不理。爲什麼？因爲自己能造，就要少買外國貨，少買外國貨，就少賺了回佣。

陰謀起家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最後代理人

蔣介石在國民黨初期幾乎毫無地位，辛亥革命時從日本回滬，與張羣、吳忠信同隸滬軍都督陳其美部下，號稱「團長」。當時陳其美的部下異常龐雜，五花八門，無所不包，上擄各色各樣的流氓，大部分都

和「楊梅都督」(陳其美的外號)有些淵源關連，所以都督府的「將軍」多如牛毛，區區校官誰也不放在眼裏。那時共舞台的演員潘月樵、夏月潤、夏月珊兄弟都是「少將」階級(當時共舞台在城內九畝地，後失火，即遷至法租界，在廢墟重建的戲院改名新舞台，對民國十年前後，潘、夏仍登台演戲)，蔣介石那樣的起碼團長，從那裏數起來也數不到他。蔣介石最光榮的一件事，就是民國二年跟了楊虎到江陰去運動江陰要塞砲台獨立(反袁)，失敗後經江北逃回上海，計過幾天飯。不過人家說起這件事，只說楊虎，說不到蔣介石，他的確做了一次無名英雄。蔣介石一生做事，都見不得人，祇做了這一件本是光明磊落的，但他却因不願人家知道他當過楊虎的部下(後來楊虎做了他的部下了)而譚言那事，所以這裏特加「表揚」。好者好說，壞者壞說，決不抹煞他。民二反袁失敗以後，益沉溺於嫖賭徵逐，民十孫中山北闕，派他做粵軍總司令，許崇智的參謀長(另一粵軍參謀長為羅翹羣，羅蔣不分正副，同稱參謀長)，蔣也想投機一下，不料一到廣東，就撞上陳炯明叛變，跟了孫中山退到上海，這一下蔣介石就有了政治資本了。

孫中山當愛用死人作榜樣以激勵活人，因此陳英士(其美)的姓名常被他和朱執信鄧仲元一起提及，被誇獎為「革命功臣」，而蔣介石是陳英士的部下，又是陳英士的同鄉(浙江人)，這次又跟隨了孫中山在危難之中，因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民國十一年孫中山在廣東重振旗鼓，要蔣介石去辦軍官學校，但蔣那時在上海跟着陳果夫(其美之姪)、張靜江、戴季陶(陳其美的湖州同鄉，那時與陳果夫同為物品交易所經紀人)在交易所「搶搶帽子」(交易所不發什麼本錢的投機買賣，看價漲先買進，再賣出；看價跌即先賣出再補進；看準了賺到漲跌的差額，看錯了蝕去差額，不漲不跌則貼去交易所手續費。買賣均當揚了結，不拖到第二天，交易所的術語為「搶帽子」)。足夠標賭精實，早把「國民革命」拋在九霄雲外。那時廖仲愷先生寫信催他到廣東去，他回信說：「必須有人能集英士那種原諒，並不時教育，才有信心。」換句話說，他是不守什麼紀律規矩的，乾脆就是不幹。那時他正和長三盒子裏的「信人」(番禺妓女)陳潔如(宋美齡之前的「蔣夫人」)搞得火熱，把老妻趕回家去。據民國十六年蔣經國給他母親(蔣介石的元配毛氏)的信上說：他(指蔣介石，下同)討厭自己在外嫖賭吃着，不願家裏妻兒的飢寒；你(指毛氏

「規勸他，得到的回答是非罵即打，我親眼看到你從樓梯上端被他一脚踢下，從樓上直撲到樓下，跌得不省人事，他却揚長而去；可見他是殘忍沒有人性的，是典型的下流流氓！這是他的兒子寫的，大概不能要說是『審歷虛造』的吧！」

交易所的全盛時代如曇花一現地過去了，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等虧空了一百多萬，上海站不住腳，只好到廣東去「革命」。披山大樹倒了，門下食客蔣介石在上海也混不下去，於是請了一次「賴債」酒，說：蔣某到廣東去，如有得法的一天，一定加利奉還，否則來生變牛變狗認答各位。也就帶了陳潔如南下「革命」了。到廣東後又奉命到蘇聯去考察，知道蘇聯真正盡力幫助中國革命，孫中山的事業是有前途的，此「機」大可「投」，於是在廖仲愷先生的扶助與中國共產黨的全力合作下，辦起黃埔軍官學校，到民國十四年時編了兩團學生軍，參加東征，才初露頭角。但直到討平楊（希閔）、劉（督憲）之後，成立國民政府，還沒有蔣介石的地位。

蔣介石怎樣能一躍而居重要地位——在軍隊中從軍長、總監、總司令，而委員長，在國民黨內從中執委、中常委、「主席」，而「總裁」，在政府中做到「院長」和「主席」的呢？一句話，完全以陰謀起家——蔣介石不僅攫奪權位的過程很短（爬得快），而且維持他的獨裁專制統治的時間也很長，袁世凱的統治祇四年多，段祺瑞年時起時落，併起來也祇有四五年，吳佩孚則僅一二年，連世界首屈一指的獨裁帝王希特勒也僅十餘年，而蔣介石的統治獨維持了二十年以上。他靠什麼維持他的血腥統治的呢？除殘忍狠毒之外，主要就是靠陰謀！

他的發展過程，簡單描摹起來，就是：製造矛盾，擴大矛盾，利用兩個以上的勢力互相對立，各不相讓，造成自己脫穎而出，獨樹一幟的機會；自己出頭以後，再繼續挑撥離間，以甲倒乙，以乙倒甲，互相抵消，各個擊破，造成「唯我獨尊」的局面。民國十六年「四一二」事變以後，武漢軍委會政治部出版過一本分析蔣介石的小冊子，有這麼幾句話：

「你是左派，好，我拉你一下，又打你一下，免得你醜態得左派，而不曉得我蔣介石！你是右派

，好，我拉你一下，又打你一下，免得你只曉得右派，而不曉得我蔣介石！左派右派，都成了蔣介石個人的升降機。」

蔣介石的起家的確是這樣的，成功之後，他仍靠這一套排除異己，穩定既得地位，則復得統治地位以後，他當然又意料到他的部下可能抄他的老文章，「以子之道，還治子之身」，蔣介石爲預防這一着，於是對他的部下亦製造矛盾，互相牽制，各不相下，這樣，大家就既擁戴他這「領袖」，所以他的專制皇朝，才能維持到二十年以上。

袁世凱的失敗就因爲馮國璋、段祺瑞兩人的勢力太大，具備了繼起爲北洋軍閥領袖的條件，所以袁世凱爲人民所反對，以北洋軍閥爲代表的中國封建集團，就犧牲袁世凱。從個人講，蔣介石比袁世凱高明，因爲在他的下面沒有一個能抵得上馮國璋、段祺瑞年那樣的威望與實權，可以代替他，所以他兩次「下野出洋」，不久即捲土重來。從大地主大買辦資產階級整個階級講，袁世凱不行了，可以另用一個代理人，繼續維持階級的統治地位，但今天蔣介石雖已成臭肉，這個代理人再使用下去，一定凶多吉少，但却找不出第二個强有力的代表人可以代替他，只好和他同歸於盡了。蔣介石的一生爲中國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盡了最大的力量，血腥鎮壓人民革命二十餘年，延長了封建地主與帝國主義對中國統治的壽命，然而他已是地主買辦階級的最後一個代理人，他的滅亡，也就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在中國消滅的。

第一個升降機——「左派」右派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後，就明顯的分出了左右派，左派擁護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右派則反對三大政策，而且主張反蘇反共反工農。國民黨老人物中害怕新興的人物奪去他們的權位，大部分是右傾的，但孫中山的主張很堅定，把堅決公開反對三大政策的馮自由等開除出黨，因此這些人就不敢公開活動而暗中阻撓。當左派右派的名詞初次出現時，謝持鄒魯等就硬說這是鮑羅廷製造出來的，國民黨就是國民黨，沒有什麼左右派。國民黨左派中包含著兩種人物：一種是真正認識到要革命必須聯俄、辦共、擁護工農利益，如廖仲愷、宋慶齡、何香凝、鄧演達、柳亞子諸先生；一種則是投機的，因爲上有孫中山主持，外有

蘇聯幫助，又有羣衆擁護，祇有跟着這條路走，才有個人的前途，如汪精衛、宋子文、甘乃光、陳公博，以及武漢時代的孫科（孫科原來是右派）。汪精衛等應該加上括弧叫「左派」。蔣介石從民國十三年到十五年初的兩年間，也是這樣的「左派」，他甚至主張國民黨要加入第三國際，成爲共產國際支部之一，你看他何等「進步」？蔣介石就落了這一時期的「左傾」面目，騙得了各種支持而成爲實力派，掌握了武裝的領導權，他就不再「左」了，他站在「左」右之上操縱一切，以「左派」打壓右派，以右派打壓「左派」，自己就扶搖直上，而成爲統治一切的「領袖」。這樣說，好像他比右派還「左」一些，不是的，在反革命的壓決狼毒，比一切右派還厲害。

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右派以胡漢民爲代表，胡爲辛亥革命以後民二反袁時的廣東都督，資望較高，左派領袖陳仲澧先生則爲孫中山最有力的助手，總攬財政民政，以大木營財政部長兼廣東省長又兼廣東省財政廳長，廖仲愷人因主張不同頗不協調。十三年冬孫中山北上，由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時粵國還有一大本營，係指揮討伐曹吳北上軍隊者，則由譚延闓代理大元帥），民十四春孫中山逝世，胡即爲軍事政治上的領袖，當時大本營所轄部隊許崇智，湘軍譚延闓，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豫軍樊鍾秀，其中以滇軍爲最大，兵多械精，豫軍在粵鎮守實力所餘無幾，另外還有贛軍總司令李烈鈞，川軍總司令熊克武則僅一空名。驅逐陳炯明出廣州，迎孫中山回粵，即滇桂軍之功，故楊希閔劉震寰恃功而居盤踞要津，自己籌款籌餉，成爲革命的障礙，孫中山逝世後，楊劉更日擴大本營，愈益跋扈。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認爲必須討伐楊劉，否則革命不能進行，但胡漢民等則憐於楊劉兵力強大，且處於廣州市內肘腋之下，如討伐不勝，則連廣州也要失去，因此猶豫。經政治委員會再三考慮，最後決定令東征的粵軍及學生軍回師討伐楊劉，一面由大本營嚴令滇桂軍接受約束，不能胡行。楊希閔接令後對胡漢民的回答是：「請代帥先下令攻打三日，然後我在回手。」其驕矜自恃的程度可想而知，這也是右派所以遲疑不敢討伐的原因。但討伐戰事一起，只一天半，滇桂軍就全部瓦解，成功之速，出於意外。（滇桂軍在貴州勒索鉅款，販煙開賭，軍官自營長以上均積資十餘萬，數十萬不等，在開火之前，均攜款走香港澳門，或逃入

沙面租界，故失敗如此迅速。」事後即聯大本營而成立國民政府，考慮國府負責領袖問題時，大家主張要根據討伐楊劉時是否堅決爲標準，因爲不討伐楊劉，根本就沒有成立國民政府的可能。在這一原則下，胡漢民當然不能担任國府主席，唯一適合的是廖仲愷先生，但廖如出任主席，則將引起胡派的不滿，因此就把握來不做官的汪精衛抬上台，以作緩衝。那時國民政府的陣容如下：主席汪兆銘、外交部長胡漢民（原大本營代理大元帥）、財政部長廖仲愷（原任）、軍事部長譚延闓（湘軍總司令，留關大本營代帥）、建國部部長孫科（原廣州市長），原在大本營外交部長伍朝樞則調任廣州市長。

滇桂軍閥楊劉崩潰之後，以粵軍許崇智部的實力爲最大，胡漢民在廣東的勢力根深蒂固，廖仲愷則深得人心，衆望所歸，又經精明強幹，爲就所選擇。蔣介石率領的學生軍在東征惠陽及討伐楊劉中建了兩次功勞，急於出人頭地，攫奪大權，於是秘密佈置了一個大陰謀，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刺殺了唯一能約束他的廖仲愷先生，刺廖案一發生，蔣介石就大哭大吵，說：「廖黨代表（黃埔軍官學校的黨代表）是革命的擎天柱，反動派竟敢刺死他，真是罪大惡極，就是把全廣州的人殺掉一半，也不能抵償這筆血債！」那時蔣介石真裝得是「義憤填膺」，爲廖先生親切的猶如精神是表現得最堅決最激烈。誰知道刺廖案的真正兇手就是誰！這個晴天霹靂對於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當然是一個極大的震動，爲應付這非常巨變，成立了特別委員會，集中黨政軍一切大權，推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三人爲特別委員，負責鎮壓叛變與緝兇。蔣介石就利用這個機會把平時對廖不滿的與胡漢民許崇智的部下都羅織在內，說是胡發生（胡漢民之弟）林直勉（孫中山的秘書）等主使，粵軍將領魏邦平（軍長）等直接參與，把許崇智的部下——一箭三鵠，蔣介石就一躍而爲廣東最大的實力派。那時的國民黨左派則因蔣介石嚴厲鎮壓了右派，認真爲廖仲愷報仇，把他當作好人。

刺廖案以後，就以蔣介石爲中心，改組國民革命軍，蔣介石把學生軍擴充爲第一軍，自任軍長，何應欽爲副軍長；湘軍爲第二軍，譚延闓爲軍長，魯滌平爲副軍長（民國十五年何、魯升爲軍長）；滇軍爲第

三軍，朱培德爲軍長；粵軍爲第四軍，李濟爲軍長；又第五軍，李福林爲軍長（福清所部湘軍在討伐南路鄧本殷勝利後編爲第六軍），蔣介石任軍事總監，統轄各軍，他就成了國民黨的軍事領袖了。

右派勢力在廣州受到打擊後。謝持、鄒魯、林森、居正、戴季陶、葉楚傖、石青陽、邵元冲、沈定一、譚繼、吳敬恆（稚暉）、覃振、傅汝霖、茅祖權等十四人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擅自舉行第四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國民黨第一屆中執委共二十四人，參加西山會議者共八人，其餘二人爲中監委，四人爲候補執監委）在上海另立中央，即所謂「西山會議派」。民國十五年一月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以紀律制裁西山會議派，謝持、鄒魯兩人開除黨籍，戴季陶、吳稚暉兩人雖列名通電，未出席會議，仍當選爲執監委員，其餘十人，則須於一個月內向國民黨中央表明悔過態度（否則喪失黨籍）。國民黨二大會後，左派佔了優勢，革命勢力在全國各地蓬勃展開，於是蔣介石又搞第二個大陰謀，把左派的勢力壓下去。

三月二十日（即北京「三一八」慘案之後兩日）蔣介石和他的盟弟歐陽格（時任海軍局長）商量，以電話轉達一個命令給中山艦長李之龍，叫中山艦開到黃埔，說有人陰謀異動，要去鎮壓，中山艦到了黃埔，蔣介石說他遠令開來，意圖不軌，把李之龍扣起來，追李之龍承認是共產黨員，有異動意圖，藉此就把共產黨員拘捕的拘捕，驅逐的驅逐，當時共產黨中有人主張：蔣介石既如此無理，公然反對革命，就乾脆去掉他，但陳獨秀等要「和蔣介石講統一戰綫，主張忍耐」（陳獨秀和高語罕各在「響導」週刊發表一篇文章，表明對蔣介石一貫推崇擁護的態度）。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變之後，蔣介石即在其槍桿壓力之下舉行第二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人不能擔任國民黨部的部長，中執會與中監會合設一個「主席」（變相的總理），大量起用西山會議派分子。二中全會中蔣介石自任中執會中監會的「主席」（後來因許多老頭子不服，自己覺得無趣，就改推張靜江代理），中央各部人員大加更換，以葉楚傖代吳玉章爲秘書長，陳果夫代譚平山爲組織部長，顧孟餘代毛澤東爲宣傳部長，邵元冲代甘乃光爲青年部長，新設一軍人部，管轄軍隊中的特別黨部及委派各級黨代表，蔣介石自任部長。其中葉楚傖，

邵元冲爲西山會請派，並未表示得過，按照二全大會決議，應喪失國民黨員資格，曠吳夫是監察委員，照例不能担任中執會負責工作，田祚要蔣介石認爲對他有功，就不管什麼紀律黨章。

二中全會後，連假左派的汪精衛也被迫出洋了，國民政府主席由譚延闓代理。（譚的外號叫「八面觀音」，即面面都做好人的意思。陳誠是他的女婿。）左派的勢力又被蔣介石壓下，於是蔣介石就初步打下了獨裁的基礎。

二中全會開會，柳亞子先生曾從上海趕到廣州去出席，開了兩天會，就一氣而回上海，他對蔣介石的專橫無理，非常氣憤；同時又不滿意當時共產黨人對蔣介石的遷就忍耐，因此回上海後杜門不出者數月，連江蘇省黨部也不到。（柳亞子先生時任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同時又兼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

流氓本色

15

蔣介石在民國十年前後曾投帖於上海法租界捕房包探頭子黃金榮門下爲門生，黃金榮在法租界仗仗洋人勢力，販土開賭，逼良爲娼，是第一名大流氓，名師出高徒，所以蔣介石一生作事，深得流氓三昧。）有人說蔣介石是黃金榮的徒弟，是錯誤的，因爲黃金榮是「孔子」，沒有資格開香堂收「徒弟」，只收「門生」。中國的秘密會社分爲清紅兩幫，紅幫爲反清組織，加入者通稱兄弟，其首領稱「大哥」，名稱有「天地會」「哥老會」「小刀會」等，通稱洪門，相傳由鄭成功開創，一般仇視官廳，帶有民族革命與原始的平民革命性質。清幫名安清幫，則起源於代滿清運糧，供滿清朝廷利用，長江以北一般稱「三番」，因安清幫祖師，相傳爲翁、錢、潘三個師兄弟，其後翁錢兩人均爲潘所謀害，潘即獨攬權運，故安清幫均爲潘之徒弟徒孫，「三番」即拆開「潘」字而成。加入者講行輩，須拜師父，拜某人爲師，即爲某人的徒弟，師徒關係有如家庭間的父子，徒弟要絕對服從師父，黃金榮既非洪門，亦非清幫，解江潮規矩叫做「

孔子」，既不能收弟兄，亦不能收徒弟，只能收門生。又江湖規矩：做了某人徒弟，就不能再收，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門生得法，老師可以把弟子退還他，就不算「門生」了。蔣介石做了總司令，黃金榮就把弟子退還他，所以蔣介石既不肯說他曾拜在黃金榮門下為門生，黃金榮也不肯承認曾收過蔣介石為門生。

流氓的主要特點有三：第一是虛張聲勢，裝腔作勢人；第二是翻面無情，栽贓害人；第三是賣身投靠，仗勢凌人（封建社會有所謂江湖義俠，講信用，打抱不平，那與流氓完全不同，封建統治階級常把兩者混淆起來，把反抗統治階級的叫做流氓地痞，把為統治階級利用的稱做俠客義士，實際上往往相反。）蔣介石的老師黃金榮就是一個典型。黃金榮在法租界捕房做包探，專門幫法國人敲中國人的竹槓，今天想法收一種捐，明天建議創一種稅，後天又說什麼事應該罰款，以孝敬法帝國主義，法國派到殖民地的官吏都是「萬里為官只為財」的，目的就在刮錢，黃金榮能帶他刮錢，就成了法帝國主義的好奴才，逐步高升為探長，為督察長；黃金榮得到法國主子的信任，愈加耀武揚威，欺壓同胞。但僅是一樣還不夠，他只能靠了法捕房的勢力嚇人，在一般社會中，只要不違法，不違警，就不必怕他，不必睬他。於是黃金榮又生一條妙計，一天組織了一批嘍囉，分為兩隊，同到戲園去看戲，一語不合，就互相打起架來，打得很厲害，連戲也做不下去。開戲園的都是和流氓有淵源的，於是去請了「老頭子」來，但無論什麼大面子，不管他是「禮」字輩「大」字輩的大亨，都喝不住，勸不開，在沒有辦法中，有人建議去請黃金榮來，戲園老板雖不相信黃金榮有此能耐，但出於無可奈何，只好去試一試；黃金榮一到場，登台一喝，打架的立即停止，全場烏雀無聲，靜聽他吩咐。這一幕戲演過後，全上海都知道黃金榮是最有力量的「大亨」，比其他清紅幫的頭子都有面子，於是成爲一霸。

蔣介石的所以能成爲國民黨軍事領袖，主要是靠共產黨人的力量，沒有周恩來、譚代英、熊雄……等政治工作，六個月到一年的黃埔軍校能夠訓練出什麼人材？其次是蘇聯的協助，沒有蘇聯的接濟，就組織不成軍隊；另外還有國民黨左派陳仲愷先生和鄧演達等支持與幫助，否則也搞不成一個學校。蔣介石羽

毛未乾，就暗殺廖先生，羽翼初成，就製造「三月二十日事變」。民國十五年七月九日出師北伐，第一大功是葉挺所率的獨立團，那是大家所知道的差不多完全由共產黨員組成的部隊，汀泗橋賀勝橋兩役，打得吳佩孚的精銳潰不成軍，奠定直下武漢的基礎。在北伐出師之前，蔣介石抽調了分散在各軍的黃埔一二期學生，組成了教導師，是他的親信嫡系精兵，由王柏齡任師長，北伐時即作為總預備隊。那時北洋軍閥連打敗仗，所遇到的盡是第四軍（由副軍長陳其銓率領，張發奎、陳銘樞兩師及葉挺獨立團）、第七軍（軍長李宗仁），流傳着這樣一句話：「還沒有遇到正牌黨軍，已覺如此厲害，不知正牌黨軍來到如何地步？」王柏齡的總預備隊後來在江西遇上了孫傳芳的第四師（師長謝鴻勳），一交手就全軍覆沒，王柏齡和黨代表魏斌僅隻身脫逃。原來國民革命軍從逃起各級黨代表制，軍官所發命令必須黨代表簽署始發生效力，三月二十日事變後，蔣介石為取悅於黃埔學生，在第一軍及教導師中將營連黨代表取消，於是那些營連長就可以毫無忌憚地自由活動，北伐時教導師剛到韶關，營長竟無一人宿於營房者，一進城時即四出作樂。蔣介石知道了，也很焦急，立即電告陳果夫，要他選派一批人馬上恢復第一軍和教導師的營連黨代表，而且特別註明，必須選派共產黨員，否則就沒有用場。他不知道只有共產黨員才能全心全力為革命辦事，局勢緊急了，就想到共產黨員的好處；但危急時期一過，馬上就想消滅共產黨，驅逐共產黨！可是他那批得意門生所組成的教導師，紀律廢弛已達極點，雖然恢復了營連黨代表，也不能約束，所以一戰即潰。照那時的情形，王柏齡魏斌兩人都應槍斃，但蔣介石却送三千元路費給王柏齡，叫他到日本去買動風頭，而魏斌則不獲去受處分，反升任第一軍副黨代表（黨代表由汪精衛兼）。這就是蔣介石的「軍紀革命」！

十五年秋，蔣介石為討好英帝國主義，出賣了香港大罷工，恢復了香港和沙面英租界的繁榮；是年冬，又派魏琴剛到日本去勾結日本帝國主義，為出賣中國革命找尋主子。蔣介石到了南昌之後，和閩銀行的買辦、上海英租界的總董虞洽卿（與蔣介石為舊交同鄉，又是蔣曾寄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理事長，有恩於蔣）聊英美日等國帝國主義和中國金融買辦階級的使命到南昌去談判，答應蔣到上海南京後借給蔣介石六千萬元款子，以反共滅共為條件。蔣介石對於革命事業，對於孫中山時遺教，本沒抱着孔子的教訓：「活

之說！活之說！我特買者也」，聽到了這巨大的價錢，當然一口承諾，絕不猶豫。十六年三月，上海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三次暴動，驅逐了直魯聯軍，光復了上海，江右軍（總指揮程潛，黨代表林鳳瀾，統率第六軍第二軍及賀龍龍葉開鑫的獨立師）擊潰了聚集南京的十幾萬直、魯聯軍，復了江寧，當時民氣蓬勃，各界歡騰，各地工農羣衆迅速組織起來行動起來，有氣壯山河之勢，老牌帝國主義侵略的首領大英帝國甚至已考慮退出上海及長江各口岸，只求能保留香港就心滿意足；江甯父老無不認為這一次中國可以翻身了！蔣介石本太平地從江西到浙江，從浙江到上海，與帝國主義及買辦資本家商議如何摧殘人民羣衆及其領導的工人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好取得六千萬元的賣國寶身錢！四月八日首先從上海開刀。

上海三次暴動後，工人以繳自直魯聯軍的軍械武器，自己成立了工人糾察隊，計有三千餘武裝，實力與那時蔣介石駐在上海的第二師（師長爲劉峙）相等，如吳雙方以武力比賽一下，則工人政治覺悟高，地勢熟悉，有羣衆擁護，被繳械的會不是工人糾察隊而是劉峙的第二師，所以蔣介石不敢公開發難。七日晚，工人糾察隊總部東方圖書館四周，突然受到襲擊，糾察隊以深夜不明真相，即隔牆抵抗，到天明時見第二師的一個團長率隊趕到，問明原因，糾察隊說攻擊者一定是反動派，第二師即將那些人繳械並細送師部訊辦。工人糾察隊眼看那些人的確紅粉細細而去，認爲那個團長很好，當時雖有傾，但他的部下却有進步分子，不能一概而論。那個「進步」的團長向糾察隊慰問，並提議舉行一個聯歡會，「以消除過去某些誤會和隔閡，便利今後密切合作」。這個提議當然馬上得到工人糾察隊的同意，於是同到北火車站附近空場上去開「聯歡會」，到了那裏，工人糾察隊剛把槍架好，第二師的兵突然架機關槍勒迫糾察隊後退，出其不意把糾察隊的槍全部繳去。糾察隊退回隊部去的時候，東方圖書館已被第二師佔領，隊部裏的武器也被搶去了。（東方圖書館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對面，是直魯聯軍在上海的最後一個據點。是工人打了兩晝夜才攻克的，所以工人糾察隊總部設在那裏。）上海總工會得到這個消息後，總工會委員長汪壽華突接杜月笙的電話，說有極關重要的消息，要和汪壽華面談，希望汪馬上就去。因爲在三次暴動時，跟蹤林

杜月笙都表示「進步」，與汪精衛時有往來，所以汪想談一談也好，對事情的真相可以多得些材料，弄得很清楚，汪從總工會所、湖北會館、繞道到法租界去的時候，在路上被預伏的匪徒亂槍打死！而總工會所也即被封。蔣介石宣佈「工人持械內鬪，影響治安，所以繳械」。

四月十二日全上海八十萬工人在極度憤慨的情緒下向蔣介石請願，要求立即發還工人糾察隊的槍械，啓封總工會，懲辦劉峙，當工人列隊擁擠在寶山路上時，蔣介石下令以機關槍掃射徒手擠在一起的工人羣衆，因爲幾十萬人擠在一條馬路上，當前面被射擊倒了的時候，後面的人還在向前湧，要退的也退不出，當時間血流成河，從此蔣介石就在帝國主義的指揮下開始了歷時十年的大屠殺！建立了二十年的血腥與銅臭熏天的獨裁專制皇朝，當血洗寶山路的一天，工人糾察隊晚上受襲擊的真相也揭開了：由黃金榮馮玉祥林杜月笙三人出面宣佈成立了「共進會」，以反共滅共爲宗旨，蔣介石則聘請他們爲總司令部的少將顧問，原來晚上襲擊糾察隊部的就是他們的健驍。（按「共進會」的組織在民元時即有，民二爲袁世凱暗殺宋教仁的兇手應桂馨，即「共進會」首領之一，其後因爲人所不齒，就陰消了，至此蔣介石再抬出這塊招牌，稱爲「義士」。主持「共進會」的，除黃馥杜三大流氓外，還有王柏齡，和東路軍前敵總指揮部——總指揮爲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陳羣，總司令部特務處長楊虎等「黨國要人」。）

「四一二」以後，就由吳稚暉出面提議「清黨」，并在南京另立「政府」與「中央黨部」，與武漢分裂。五六月間蔣介石派「清黨」的要員楊虎陳羣兩人（上海人民叫他們爲「狼虎成羣」）到甯波去「清黨」，因爲甯波是蔣介石的家鄉，所以楊虎陳羣特別向蔣請示方針，蔣介石對他們說：「凡是可以用殺的一律殺！寧可錯殺，不可錯放！我們將來總是要給人殺的，不如多殺幾個。」蔣介石自己知道是一個紙老虎，所以只能以殘殺來壯胆逞威，「唯懦弱者最殘忍」，的確是至理名言。

「無齒之徒」

出面提議「清黨」的吳稚暉，原籍江蘇武進，生長在無錫，所以寫起文字來是「武進吳敬恆」，一開

口則說：「耐侬無錫」（「耐侬」爲無錫土話的「我們」），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以不做官不要錢標榜「清高」，民國十三年國民黨改組後任中央監察委員，十四年各列名於西山會議派通電，後來却又寫一封信給汪精衛說：「此間情形複雜，凡非本人親筆簽名，概不負責。」因此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仍當選爲中央監委。從此以後右派得勢了，他就自稱是西山會議派；西山會議派失勢了，他就否認是西山會議派。民國十五年北伐開始以後，他在國民黨內部兼了好幾個委員會的委員，並且老担任授印監督之類的工作，人家問他：「你不是不做官的嗎？現在做了什麼？」他却依老實老地回答：「做委員不算做官。」「四一二」以後，蔣介石委他做總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陳銘樞爲第一副主任，方覺繼爲第二副主任），他也到任了；人家又問他：「政治部主任不是委員了，算什麼？」他却說：「在共產黨人及附和共產黨的份子，這個人一定與鄧演達一樣窮兇極惡，所以就用我的名字與鄧演達相對壘（按鄧演達時任武漢政府的軍委會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爲副主任），事情我并不做，一切由真如（陳銘樞字）負責。」這是他「不做官」的真相。

蔣介石在南京成立偽政府後，即派鈕永建（字惕生）爲江蘇省政府主席，西山會議派的茅祖權（著名的鴉片鬼）爲民政廳長，後來西山會議派與桂系關係密切，被蔣介石排斥，民政廳長由鈕永建自兼，鈕是老同志會員，說他好是「好好先生」，說他不好就是「昏庸老朽」，他自己不做什麼大壞事，但也不會做什麼好事，更不能約束部下不做壞事。民國十八年宋美齡與繆斌訂了一個買賣合同，要拉繆斌出來當江蘇民政廳長，提出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時，吳稚暉獨堅持反對，說繆斌年少任性，行止不檢，在總司令部經理廳長任內聲名狼藉，不應主持一省的地方行政。因爲吳稚暉是中政會中發言地位較高的委員，蔣介石正要利用他放砲攻擊異己，所以相當尊重他的意見，尤其爲了他是江蘇的元老，關於江蘇省的事情，更應尊重他的意見。那時繆斌是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列席中政會親自聽到吳稚暉說他不行，眼看民政廳長有告吹的危險，於是他立起身來走到吳稚暉掛大衣的地方去摸了一下。據傳說，繆斌在吳稚暉的大衣裏放了一張什麼票子，數額是八萬元。當然這一傳說是無法得到人證物證的，繆斌不肯說他的廳長花了

多少錢，吳稚暉更不會承認他受了賄賂。但下一次中政會議開會，吳稚暉却不再反對繆斌當民政廳長了。繆斌走馬上任之後，大開寶官鬻爵的門路，各縣公安局局長和縣長，按缺份的肥瘠，分成等級，標出價格，最賤的是一千元（揭中公安局長），最貴的是二十萬元（吳縣公安局長），出什麼價錢就放什麼官，交易公平，門庭若市。繆斌則以寶官收入與宋美齡四六折賬。（在北洋軍閥時代，江蘇省最肥的缺是滬甯警察廳長，一年有二百萬收入，其次即為蘇州警察廳長，國民黨時代上海已劃為特別市不屬江蘇省了，所以吳縣公安局長就成為第一好缺。）如此一來，「小道士」官聲之壞，不僅空前，而且絕後，因為無論滿清和北洋軍閥時代的腐敗官僚，沒有不感到他那樣地步的。（繆斌的父親是無錫南城門口的道士，所以人家叫他「小道士」。）儘管這樣，吳稚暉却不再罵他了，不僅不罵他，還時常說他好。民國二十三年蔣介石派陳果夫做江蘇省政府主席，那時吳稚暉已不為蔣所重視了，所以他只能在背後說怪話：「難道江蘇就沒有個做主席的人材，一定要用浙江人？」人家問他：「江蘇的人材那些可以做主席呢？」他說：「講年高德劭有鈕惕生；論道德文章有葉小鳳（楚僧）；說英俊有為，則繆不承（斌）也夠格。」吳稚暉果然識貨，抗戰一開始，繆斌就「榮任」日寇卵翼下的「新民會會長」，漢奸的資格比汪精衛還老！所以有人為吳稚暉「不做官」不要錢」的口號下一註解，叫做「不做官——嫌小；不要錢——嫌少！」

吳稚暉的牙齒都早脫落了，人家叫他是「無齒之徒」。（蔣介石的牙齒也在十五年前全部脫落了。）也正因為無恥，所以甘心做蔣介石的騙人工具，蔣介石在做某一件大壞事的前夜，總得由吳稚暉出面大發議論，正如張警代齊燮元撐腰，章太炎為孫傳芳發聲援通電一樣。張季直為齊燮元製造輿論是為兒子張莘若取得省長地位，孫傳芳每請章太炎發一個通電，送潤筆一千兩，吳稚暉從蔣介石那裏取得什麼代價，決不止八萬元的支票吧！民國十八年冬馮玉祥曾給他一個電報，內容說：「如有人罵先生：蒼髯老賊，暗首匹夫，不惜以黨國元老為獨夫作奴才，死後有何面目見先總理於地下！先生將何以自解？」這些詞句是寄用諸葛亮黑王期的，但王期一罵竟氣絕而死，但吳稚暉的「修養」到家，恬不知恥，依然老着脸皮當蔣介石的奴才，真是無恥之尤。

第二個升降機——『黨統』與軍閥

上面已經說過：「左派」右派是蔣介石的第一個升降機，他利用了這一個矛盾排斥壓倒許多資望較高的國民黨領袖獨攬大權。他的第二個升降機則是利用「黨統」以對付其他軍閥。民國十六年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武漢仍保持着國共聯盟，領導全國革命，遂平一役，擊潰了張作霖最精銳的三、四兩軍團（張學良和韓麟春所統率），使帝國主義與地主買辦階級大吃一驚，他才明白了單是一個蔣介石並不能把中國人民的革命高潮鎮壓下去，必須聯合一切力量對付中國人民，於是竭力促成馮玉祥與蔣合作（在「四一二」之前，武漢政府任命蔣為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當時陳獨秀對馮的估計很高，說他是「代表農民的」，最可憐！遂平一役擊退了奉軍，第二集團軍得從陝西開入中原，他却不到武漢去，反先和蔣介石會面，交換盟詞，結為盟兄弟），策動汪精衛唐生智背叛革命，為了統一反革命力量，講定了汪蔣同時下野，寧漢合流。蔣介石到日本去，在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的家中住了一個時期，受了這個著名的日本法西斯大流氓的教誨，回國後即與宋美齡結婚（把陳潔如送到美國去）。在蔣介石下野時期，國民黨中西山會議派與桂系軍閥合作當權，李宗仁白崇禧出兵討伐唐生智，佔領了武漢，這時蔣介石已佈置重新上台的一切把戲，當南京的西山會議派於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論唐勝利的慶祝大會時，陳果夫指使噶嚨開槍擾亂，警察因此開槍，傷及羣衆，於是到處鬧起反對「一二二」慘案的運動，要求懲辦葛建時等，鬧得不可開交。十二月中國民黨召開中央執監會議，蔣介石一隻手抓住了西山會議的弱點，另一隻手則以廣州暴動打擊汪精衛派，這樣一來，只有蔣介石可以上台了，於是再任總司令。十七年繼續北伐，張作霖退出山海關，全國算統一了，改組國府，成立五院，蔣介石當了國府主席。當主席是西山會議派聯合桂系限制蔣介石的結果，因為實權在行政院，但他們把行政院長給了原來的國府主席譚延闓，把有名無實的「主席」給了蔣介石，蔣介石當然十分不願，就設法收拾桂系。

那時西山會議派自恃反共先覺，以國民黨正統自居，胡漢民也和他們比較接近；廣西軍閥則李澤深舉

鎮廣州，李宗仁在武漢，白崇禧在北平，都兼政治分會的主席。湖南省的主席程潛魯滌平，先後均桂系編遣，唐生智的舊部幾乎全都投到桂系陣營，桂系勢力從兩廣兩湖直判河北，聲勢浩大，如一弧形包圍着蔣介石所控制的東南幾省。蔣介石首先拉攏了李濟深部下的陳濟棠，把李濟深騙到南京去囚在湯山，同時與汪精衛進行談判，說：「我自知資望不足，黨國重任一定要汪先生才能負担，但今天桂系軍閥篡奪國民革命的果實，篡竊黨權，實在忍無可忍，我們首先要打倒桂系軍閥，桂系軍閥打倒後，我一定下野，一切由汪先生來領導」於是汪精衛陳公博等就作下列三種策動：等一，叫張發奎從江西出兵進攻湖北；第二，代蔣拉攏唐生智北上運動其舊部；第三，通過徐作柏的關係去分化桂系內部。這三着，特別是後兩着，都收到極大的決定的作用：那時白崇禧在華北統率的軍隊，幾乎全是唐生智的舊部，如廖磊、周西奇、鄧錫鄰在北平路上，蔣介石一面打發白部的軍餉，一面則交給唐生智兩個月的軍餉，由唐帶到秦皇島去運動其舊部，一面發餉，一面宣佈「打倒了桂系，回湖南去」，於是湘軍都重新歸唐生智的「護黨」旗幟之下，唐生智原定活捉白崇禧的，白崇禧事前毫不覺察，原來是很容易活捉的，結果因廖燕農（聶）對白崇禧的感情較好，把白放走了，白崇禧總算能夠從海道隻身逃回廣西，未做俘虜。武漢方面由於李宗仁主張「鄂人治鄂」，一切實權操縱於胡宗鐸、陶鈞兩人之手，夏威、李明瑞、楊騰輝等桂系嫡派將領頗不得意，對胡宗鐸、陶鈞有意見，當戰爭發生之前，李宗仁因目疾到上海租界去醫治，不在武漢。夏威態度消極，稱病入醫院，前綫軍事由李、楊指揮，俞作柏就去運動李、楊，廣西將領本有「當權發財」的湖北人，打仗拼命又要我們廣西人了」之感，俞作柏去活動，李明瑞、楊騰輝就不戰而退到武漢，於是胡宗鐸、陶鈞等就猖獗向沙市、宜昌一帶西退，蔣介石垂手而得武漢。李宗仁亦倉惶由滇南返。桂系的勢力縮到廣西老家一隅，而張發奎則被蔣介石擺佈追擊，一直到了宜昌，仍舊是「張逆」，唐生智雖然對蔣「功勞」不小，不獨不得湖南省，接下來却是二次討唐，其實力完全被瓦解分化。桂系軍閥的浩大聲勢是打倒了，只剩下葉琪、夏威兩個軍，實力比北伐出師時大不了多少；汪精衛陳公博等不僅上不了台，連黨籍也沒有恢復，蔣介石的「元首」地位却更加鞏固了。

這一天最失敗的莫過於馮玉祥。那時馮玉祥的勢力從陝甘發展到豫魯，蔣桂兩方都要拉攏，他也兩面敷衍，一面屯兵於信陽，一面屯兵於徐邳附近，坐觀勝敗，如果蔣勝李敗，則他即由平漢路出武勝關而南取武漢，可以比蔣介石到得早湖北就是他的地盤了；如果李勝蔣敗，則他即由津浦路直下南京，李宗仁還來不及趕到，中央政權就歸他控制。他還替蔣：你們去火拚，打得你死我活，實力互相消耗，敗的固然吃了大虧，勝的也精疲力竭，讓我来坐收漁人之利，那時打了勝仗的，也無力與我爭奪了。他印好了十萬份討逆佈告，但每個「逆」字之上留一空白格子，預備蔣勝了就填上「李」字成「李逆」，李勝了就填上「蔣」字成「蔣逆」，好在所宣佈的十大罪狀，如：「屠殺青年」、「壓迫民衆」、「苛捐勒索」、「賣官鬻爵」、「違背總理遺教」、「培植私人勢力」、「不守法紀」等等，蔣李都是一樣，可以統一使用。不料蔣介石的手段特別厲害，竟能利用唐生智張發奎楊桂系的後路，利用俞作楨龍濟光等倒戈，戰事迅速解決，馮玉祥還沒有出武勝關，蔣介石的嫡系軍隊已進入武漢了馮玉祥便宜沒有到手，而他的空白佈告倒到了蔣介石手中，而桂系一去，蔣馮矛盾就格外尖銳起來，不久即發生蔣馮之戰。由於徐復榘石友三兩軍圍攻收買反馮，於是馮玉祥又失敗了。民國十九年馮玉祥又聯合閻錫山反蔣，把汪精衛和西山會購派的領袖討捧抬了出來，結果還是失敗。蔣介石擁護這些實力派的政治資本，就是：別人都是軍閥，他自己則是國民黨「正統」。

當「四一二」蔣介石背叛革命之後，李濟琛唐生智李宗仁白崇禧馮玉祥都曾逼蔣介石很多的忙。那時除西北國民軍（後改稱第二集團軍）外，蔣介石所指揮的為：粵敵總指揮唐生智（主力為第八軍），江右軍總指揮程潛（主力為第二第六兩軍），江左軍總指揮李宗仁（主力為第七軍），東路軍總指揮何應欽，東路軍前敵總指揮白崇禧（主力為第一軍），總預備隊總指揮朱培德（兼江西省主席，主力為第三軍）後方留守司令兼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琛（在廣州，兼第四軍一部及第五軍），廣西留守則為第七軍副軍長秦德代表黃紹竑。蔣介石開始公開反共時，擁護他的除嫡系前何應欽外，只有李濟琛白崇禧黃紹竑三人，程潛是那時武漢的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唐生智是反蔣的擁護者，朱培德李宗仁則作右翼望。朱培德在接到

蔣介石「清黨」命令之後，就來一個「縱容共產黨人出境」，送出共產黨人出境，他仍接受武漢派去的汪精衛孫科系統的政治工作人員。黃郛臨只能盡看守廣西之責，作用不大，白崇禧則出任上海衛戍司令，對蔣殺共產黨員是相當賣力的，人殺了不少，但初期的實際工作由陳雲楊虎負責，衛戍司令部只管執行（雖一般將軍法處審判，大都聽蔣故事，清黨委員會說殺就殺，說放就放，只有清黨委員會沒有具體意見的人，軍法庭才能作主）。那時的李濟琛則是反共最堅決的，一般公認他是地主買辦階級的代表（實際上所有這些軍閥都是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代表，但那時在機會主義陳獨秀的領導，只認為李濟琛是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的，而蔣介石則是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代表，唐生智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馮玉祥又是代表農民階級的，這種可笑的事無根據的分析，自然要助長了右傾機會主義，而把大革命引到失敗的道路），「清黨」事件一發生，他立即在廣州進行屠殺共產黨人及革命的知識份子與青年，著名的共產黨員如蕭楚女（時因病在醫院治療，被拖出槍斃）熊雄（黃埔軍官學校的政治主任）等都死在他手裏。因為廣東是革命的策源地，工農運動比較有基礎，而又是財賦所出的地區，那時北伐軍的軍費和國民政府的政費主要就靠廣東，所以蔣東的傾向最關重要。廣東的革命勢力被李濟琛鎮壓下去，蔣介石的反動統治才減除了一個最大的威脅，才完成了對武漢的經濟封鎖。從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的反動陣營講：蔣介石是絞殺大革命的「第一大功臣」，李濟琛就是「第二大功臣」。

蔣介石叛變以後，武漢方面就把希望寄託在馮玉祥身上，認為他是農民出身，最可靠的，只要與第二集團軍會了師，就有把握打敗蔣介石。平漢路豫南一戰，鄧演達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奉軍打退，西北軍可以順利東下河南。馮玉祥到了河南却不去與武漢政府會面，倒是與蔣介石會面。武漢方面雖大吃一驚，但聯合主義者還宣傳馮玉祥與蔣介石會面是為了脫服蔣介石先共同打倒北洋軍閥。蔣馮會面後不久，西北軍來比較公開的共產黨員都被送走了，而且「送」字之上還沒有「禮」字，比宋培德還不如。馮玉祥被奉系軍閥追走時，到了一趙森聯，回國重整旗鼓，是得到蘇聯幫助的，五原督師時曾發表了一篇漂亮動人的演說，共產黨中央機關報「響導」週刊會轉載過，所以大家對他的期望很高。馮玉祥一傾向到蔣介石一轉，

本來不很堅定的武漢一批小資產階級領導人物就失去了信心，日益動搖起來，也就助長並加速了唐生智汪精衛這一批人物的叛變。

從更斗寅、許克祥等叛變發展到唐生智的叛變，當然直接結束了武漢政府的命運。李宗仁到了武漢，通過胡宗鐸（湖北省政府主席）陶鈞兩人的手，進行了最殘酷的屠殺。在武漢，只要在家內燒一張字紙，無人報告後就要殺頭，不需要任何證據和口供！理由很簡單：不是秘密文件就不需要燒；有秘密文件的就是共產黨；共產黨就要殺頭。在這樣的邏輯下，桂系軍閥在湖北創造了最殘酷的血腥統治。而這種方法，到蔣介石統治武漢時當然「一仍其舊」。

『分而治之』——『縱的割據』

蔣介石自己運用製造矛盾，挑撥離間，利用並擴大派別間的衝突，收買拉攏等等手法，把地位實望比他高的、以及勢均力敵、地醜德齊的人物，一一搞垮，他當然預感到他的部下，也可能用這一套辦法（特別是利用李濟深搞垮許崇智，利用陳濟棠搞垮李濟深，再利用余漢謀倒陳濟棠，這一套辦法），『以子之道，誣治子之身』，因此他對他的部下是完全不信任，不放心的。他的對付辦法也是集中了中外古今的大成，分析起來，大致有三套：第一套是大英帝國統治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操縱國際政治的辦法，叫做『造成對立，分而治之』；把部下培養成各種勢力範圍，互相對立，互相牽制，互相監督，誰也不能成爲『天下第二』的大奸者。第二套是中國歷代權臣奸相和德意志法西斯的辦法，儘量重用庸碌無用之人，嫉賢忌能，提倡盲目服從，曹操所說的『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爲惡人』，這就是蔣介石的幹部政策之一。第三套則是中國古來末代帝王以官者監軍等任用官官的辦法，以特務監視部下，熟悉他們的一言一動，使他們不敢萌絲毫異志。

先講第三套，我只舉四個例子：（一）、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結果被蔣介石打败了，遭一役殺，衛立煌的功績最大。衛立煌到了福州，有一天晚上和幾個朋友打了一夜牌

，第二天接到蔣介石從南昌發來的電報，先講了一些正事，末段加上一句「昨晚睡如何」。竊立煌接到這個電報後知道有特務在他旁邊每天報告他的行動，於是誠惶誠恐地發了一個電報去向蔣請罪。蔣覆電慰勉，說是爲了關心他，所以順便附上了一句「毫無責備的意思，並且說：『彼此情同手足，故不拘形式。』」竊立煌是他的「員大將」，在內戰中建立了不少「汗馬功勞」，然而蔣介石却派了特務經常報告其行動，對其他人員當然更不消說了。(二)抗戰時期，重慶的「要人」們有一個俱樂部，每晚有許多特任官蒞任官，上將中將，帶了女人去玩，打牌跳舞，吃喝閒談，何應欽幾乎每晚都去。有一晚，來了一個女客，好些人不認識她，於是大家猜測，一定是特務。一想到是特務，那些大官們就個個無精打采，連話也不敢說，自然更沒有興趣玩下去了，何應欽第一個溜走，別的人也很快散去。因此，重慶官場就盛傳著「何應欽也怕特務」的說法。(三)救國會領袖之一張申府是第一屆國民參政員，某次蔣分批宴請參政員席中，他質問張申府：「爲什麼在防空洞裏批評政府？」張申府說沒有這回事，蔣硬說他知道有這件事。原來是章伯鈞的事，特務報告後，蔣自己說錯了。結果第二屆參政會中張申府章伯鈞兩人名字都被抹去了。(四)日寇佔領沿海各地，並侵入越南後，滇緬公路成爲通英美的唯一出路了，管這條運輸綫上業務的爲「西南運輸公司」，由宋子文主持，真是腐敗不堪，甚至連「西南運輸公司」領過多少經費，公司裏的會計不知道，財政部也不知道，其糊塗也就可想而知了。因爲這條運輸綫關係太重要了，各方面都主張要整頓，特別是美國人督促着要整頓。於是改組成爲「軍委會運輸統制局」，由參謀總長何應欽任主任委員，但何應欽不能實際去管這件事，必須有一個實際負責者，設一個秘書長誰當秘書長呢？物色了一個多月，還是宋子文。爲什麼一定要宋子文呢？因爲必須具備兩個條件才能做這件事：第一是能向財政部要到錢；第二是「不怕特務做情報」。具備這兩個條件的只有宋子文。後來因宋子文有了麻瘋病到美國去醫治，才改派蔣介石的表弟俞飛鵬去，俞飛鵬雖沒有一定向財政部要錢的把握，但可以不怕特務做情報，所以還能勉強及格。

再說第二套辦法。其中又可分爲三種形式：第一是登庸庸材，只求他服從，不必他有本領辦事，最典型的例子是孔祥熙。孔祥熙的號叫「庸之」，的確符合其實，昏庸庸碌到驚人程度，但他做到中央銀行總

兼、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行政院長。簡直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做了許多年財政部長，竟不知道收入多少錢，支出多少錢。當他做行政院院長的時候，用他的二女兒令傑（一般稱為「孔二小姐」）做秘書，什麼事情都代拆代行，某年派了一個人到湖北河南西部去巡視，孫運仲在那裏做時區司令長官，知道來人是孔二小姐所派的，所以伺候極為恭順，大約孝敬也不少。這位「欽差大臣」回重慶後，對孔二小姐報告了許多孫運仲的好處，孔令傑說：「那末我們保舉他一下，你去辦一個公事，用我父親的名義保舉他。」公事辦好了，孔令傑看過蓋了章，孔祥熙也看過，送到蔣介石那裏去。過了幾天，蔣介石把這公事退給孔祥熙，連聲說他「糊塗」、「糊塗」。孔祥熙拿回後仔細看了幾遍，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地方不對，事後召集了幾個老秘書來研究「究竟糊塗在什麼地方」，才明白過來。原來孔祥熙保舉「孫運仲可升任特級上將」，誰都知道國民黨的上將分為「特級」、「一級」、「二級」、「三級」，「特級」只蔣介石一個人，「一級」的不到十個，那時白崇禧還是二級上將，孔祥熙說孫運仲可升特級上將，豈非把他代替了蔣介石，至少是把孫運仲抬到與蔣介石平等的地位，這在蔣介石看來，簡直是「大逆不道」的事，罵幾句「糊塗」，已是特別客氣的了。這個道理很容易懂，也可以說是蔣政府中一般官吏以及稍有政治常識者的起碼知識，但身為行政院長的孔祥熙，就不懂得，其「庸」也就可想而知了。為什麼蔣介石要用這樣的人呢？為了可以放心。這種人大家都看不起他，只有跟了蔣介石才做到大官，發大財，離開了蔣介石就一點辦法也沒有，因此就是「不佞不叛之臣」，決無「震主」、「奪主」的危險。第二個是伴威作福。如好好先生邵力子，做過他多年的秘書長，一向安分守己，從無過錯，在國民黨中也已算得七元老，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之傷）說了一句蔣介石認為不應該說的話，被蔣介石打了兩個耳光！大家都很驚訝！連邵力子也打了，真是「天威咫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第二天，蔣介石就下令派邵力子為甘肅省政府主席，弄得邵力子真是又羞又喜。蔣介石打人的事很多，每每於打人後就把被打的人升官，所以有許多無恥官僚，以能得到蔣介石拳打腳踢為榮。「領袖」的威嚴與權力，一至於此！第三個是提倡盲從。如「領袖腦壳論」之類的言論，大家都知道，無庸細說。最使蔣介石得意的是國民黨中央黨部訓練部長兼江蘇省教育廳長

周傳澤所提出的兩句口號：『信仰領袖，要信仰到迷信程度；服從領袖，要服從到盲從程度。』（周傳澤）之所以得到蔣介石「特赦」，其原因可想而知了！）

最主要的「一套」就是「分而治之」，把部下造成幾個派別，各矯一行，互不相下，互相對立衝突，而在各大派別之下培植小派別，以資牽制。蔣介石口口聲聲反對地方自治，說是「封建割據」，但在他的內部則造成許多割據局面，不過它內部的割據不是割據一方，而是割據一行，如CC的霸持黨務與文化，政學系專斷行政，包辦外交，孔宋獨攬財政，黃埔系掌握軍權，大家都掌握一行，但都不明全盤，而且大家都看准其他部門發展的野心，CC要染指行政及金融，政學系要奪取財政權，黃埔系要搞黨務文化，一發而即侵佔了別人的勢力，就要爭吵打架。因為彼此間矛盾很深，就都起「挾天子以令諸侯」，要取得「領袖」的信任，借「領袖」的勢力去壓下別的派系。但蔣介石是爲了「分而治之」才叫他們獨霸一行的，當然不願意其中任何一派太擴大了，所以常是一壓一拉以操縱調劑，不能滿足任何一派的願望。這些派別雖知道蔣介石不是完全袒護他們，但他們却沒有辦法離開蔣介石的支離，因爲樹敵太多，常在四面楚歌之中，離開了蔣介石，就有被人打倒的危險。但他們又另有一套辦法對付蔣介石，就是你既不能幫助我擴充勢力，那麼我的事情你不要多管。從一九四一年下半年以後，蔣介石的「手諭」常常沒有效果，就是這個道理。蔣政權任何一個辦法，總是行不通，成中途廢掉了，除一般的機構腐敗之外，還有這一割據原因，從上到下，都有「你說你的，我做我的」之氣概。據說蔣介石對此也很苦悶，但是他自己造成的，有什麼辦法呢？

何應欽——陳誠——胡宗南

蔣介石最大的政治資本是黃埔系，沒有黃埔軍校就不能成爲軍事「領袖」，沒有軍權就不能成爲獨裁者。所以他第一位重視的勢力是軍事。一般所說的黃埔系，又可分爲二部份，一是黃埔政官，一是黃埔學生。在兩者之中，蔣介石尤其偏重於扶植學生，使他們逐漸取得實權。而在黃埔政官與學生之間又將別派

據浙江同鄉，同樣資格和體力，浙江人與非浙江人就相差得多；如果資望能力兩者不同，只帶是浙江人，儘管資望低能力差，也會不次提拔，地位可能比非浙江人的資望較高能力較弱者為高，權力也可能較大。這也是封建軍閥的所以成爲「封建」的特徵之一，蔣介石當然不能例外。在黃埔軍校教官中資望最高的是何應欽，後來居上受到嚴格提升的有顧誠，黃埔學生中地位最權重的首推胡宗南，我們就先說一說這三個代表人物。

何應欽是黃埔軍官學校的教官長，其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第一次東征時任學生軍團長，（另一團長爲蕭連人譚履癩，北伐時做過雜牌軍某軍軍長，後來槍斃了。）和何應欽地位相等的只有鄧演達和王柏齡，鄧演達是第三期到第六期的教育長，在學生中威信很高，民國二十年被蔣所殺。王柏齡是教導部主任，是軍事訓練家，做教導師長時一勝而全軍覆沒，從此脫離軍隊，曾一度做江蘇省建設廳長，抽了幾年大烟就病死了。何應欽則一帆風順，從第一軍副軍長、軍長、東路軍總指揮、浙江省政府主席，第一路軍總指揮，成爲蔣介石部下第一員大將。當寧漢合作，蔣介石下野時，何應欽也是促成蔣下野的動力之一。當時有很多入願慮到蔣下台後，蔣的嫡系部隊無法統率，會鬧亂子，何應欽表示他有把握。蔣介石本來準備做一次袁世凱拒絕南下的老文章，嚇一嚇西山會講派老朽們的，但由於何應欽的態度也偏於擁蔣下台，因此，不得不暫時出洋。（民國元年南北講和告成，孫中山辭職並向臨時參議院推荐袁世凱爲繼任臨時大總統，議定的條件爲袁到南京宣誓就職，參議院派蔡元培爲特使，到北京去迎接袁世凱到南京就職，袁世凱多方推托，到無可如何時，即曉使曹錕「兵變」，造成非袁坐鎮北方不可的局面，因此孫中山及臨時國會即對袁運就，允許袁在北京就職。）正因爲如此，民國十七年春蔣介石重行登台，第一件事，就是把第一路軍總指揮撤銷，擴大改組爲第一集團軍，蔣介石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其下分設三個縱隊，以第一軍軍長劉峙爲第一縱隊總指揮，第九軍軍長顧祝同爲第二縱隊總指揮，方鼎英爲第三縱隊總指揮，何應欽則調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總參謀長，從此削去軍權。以後何應欽雖歷任訓練總監、軍政部長，但始終沒有掌握實際軍權。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扣留在西安，何應欽乘機取得了掌握軍令的權力，竭

力主張「討伐」張楊，担任了「討逆軍總司令」，那時何應欽的算盤是最好的：如果因他積極主張「討伐」而將出來了，則他是「救國第一功」；如果因他積極「討伐」（那時何應欽曾下令空軍轟炸西安，見「西安半月記」宋美齡的文章，宋到西安途中途在洛陽對空軍演說，再三鼓勵：沒有她的命令，不能到西安去轟炸）而將死在西安了，則他又是「救國第一人」。何應欽所希望的自然偏重於後者，最好是將死了，他就成爲中國最大的實力派，封蓋軍閥的頭子。可是他那時也很苦，「討伐軍總司令」的名義最發表了，對軍隊的實際情況幾乎完全不了解；有些部隊則根本不聽他的號令（如教導總隊的桂永清等），他迫得沒有辦法，只好採納政學系的建議，任命劉峙爲「討逆軍東路軍總司令」，顧祝同爲「討逆軍西路軍總司令」，把實際指揮軍事責任推給劉顧兩人。蔣介石釋放之後，又請假一時期始復職，何應欽利用這一機會，在軍隊中拉攏了一些私人關係，蔣介石復職後，何又儘量爭取用人行政上的發言權，蔣介石也不能不多少採納一些。從此以後，何應欽利用軍政部的行政地位，特別是補給品的運發早發等以扶植自己的勢力，如某師師長和他好，聽他的話，則可以早發，報銷可以馬馬虎虎，如某師師長不聽他的話，與他毫無關係，則報銷屢加挑剔，軍實品壓到最後發——如春天發棉衣，九月發蚊帳之類。因爲國民黨軍隊的食污舞弊是一般性，誰都有毛病，而軍實品從來也沒有都能按時供給過，軍政部儘有上下其手的地步，因此有不少軍官就或多或少地與何應欽發生了關係。據民國二十九年三十年的估計，國民黨軍隊的師長或師參謀長，有一百三十餘人與何應欽有關係的。這個勢力可不小，但蔣介石並不著急；因爲：（一）那些軍官雖與何應欽有關係，但並非專屬於何應欽的；（二）何應欽只能在蔣的勢力下拉攏一部份軍官，而不能拉他們脫離蔣介石；（三）在抗戰時期，何應欽的聲譽最不好，沒有人信仰他，因此不能形成政治上威脅蔣介石的力量。所以抗戰末期雖因羅斯福的提議而將何應欽的軍政部長罷免，但仍保留他參謀總長的地位，而且不久又任命爲中國陸軍（與國裝備與訓練的）二三四方面軍總司令。

何應欽是著名的親日派，長城戰役（民國二十二年）後任北平軍分會委員長，與日本漢道軍司令梅津策訂通賣國的條約協定，連親日派頭子黃郛（時任華北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也屬他是漢奸。政治上則與歐

軍事關係最密切，在他和日本軍調辦交涉（進行實國勿氣）時，熊斌和陳誠兩人是他的左右手。何應欽在軍事上雖毫無特長可說，從來也沒有打過什麼好仗，但敢於手執却不懈，善於利用別人的矛盾，如利用陳誠與胡宗南的矛盾，自崇蔣與陳誠的矛盾，以鞏固蔣介石對他的信任。何雖軍人，但談話極有條理，在國民政府大員中為口才較好的一個。

在黃埔軍官中，除何應欽、王柏齡外，資望較高的有方鼎英，也曾任教育長，因方氏似乎反動手段不純，後經辭職，所以不久就消沉了。但戰時會前飛鷹的有劉峙、顧祝同、錢大鈞，這三個都是餓桶，但由於對蔣介石絕對服從，所以十六年就升放軍長，都做過封疆大使（劉峙河南省主席，顧祝同江蘇省政府主席，錢大鈞曾在滬滬警備司令，日本投降後上海市長）但他們都被陳誠追過頭了，北伐時期，陳誠僅是一個團長，到東北易幟以後，蔣介石整編部隊，陳誠在第四師徐庭瑤部下任第十一旅旅長，劉峙、顧祝同已做過旅指揮；當劉峙、顧祝同是「二級上將」時，陳誠還是「中將」，現在劉峙還是「二級上將」，而陳誠已是「一級上將」了。抗戰初期，劉峙都是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是顧祝同的三戰區的第八集團軍總司令，但現在陳誠是「參謀總長」而顧祝同是他下面的「陸軍總司令」。陳誠在蔣介石部下將領中稱升得最快的，為什麼蔣對陳誠特別重視呢？原因之一就是陳誠和蔣是浙江同鄉。「浙江同鄉」這一關係，對於每一想在蔣介石領導集團「飛黃騰達」的奴才們，是有極大關係的，如陳果夫、陳立夫、朱家驊、潘公展、陳布雷、董文瀾，都是靠了這一關係，所以比其他同時做同等工作的人易於「出人頭地」。在軍隊中，要得到蔣介石的賞顧與特殊提拔，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是黃埔軍校的學生或教員，第二是浙江同鄉。如果兩個條件都具備，那就很快「高升」了，就是犯了罪過也不要緊；如具備兩者之中的第一個條件，部也能升遷，不過比較慢一些，可是不犯錯誤，否則就要倒臺；如具備第二個條件，至少可以保持職位；如果兩個條件都不具備，升官的希望就很少而倒臺起來却不可限量，就不定那一天會把「屎」拉出來。陳誠比劉峙、顧祝同等升官升得快，就沾了「浙江人」的光。（劉峙是江西人，顧祝同是江蘇人。）但陳誠之所以得法，並非單純為了與蔣介石同為浙江人的關係，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會出賣蔣演說，為蔣介石除了一

個大勁敵。

鄧演達任黃埔軍校的教育長，在黃埔學生中威信最高，在三四五六期中，甚至超過蔣介石。大革命失敗後，鄧演達組織「第三黨」主張實行孫中山的三大政策，黃埔系與非黃埔系的軍人，參加「第三黨」的很多，陳誠也是其中之一。黃埔軍人是蔣介石的最大的政治資本，而鄧演達則能與他爭奪黃埔軍人，所以蔣介石最忌鄧演達，必欲殺之而後安心。鄧演達從德國回來後，住在上海活動，蔣介石雖命令特務去多方對付他，但鄧亦頗為機警，終難得手。最後由陳誠出馬去找鄧演達，因為陳誠是「第三黨黨員」，黨員找黨的領導者當然並不奇怪，鄧演達與他會面了，陳誠當時表示很好，沒有幾天，鄧演達及十幾位第三黨的重要幹部都被逮捕了，那是一九三一年八月的事，到十一月廿八日鄧即被蔣所殺。從此以後，陳誠就一天天飛黃騰達起來，就是犯了錯誤，蔣介石也特別優容他。抗戰之前一年，陳誠身兼三要職：廣州行營副主任（主任由何應欽兼，何當然不能去，實權歸陳誠，行營參謀長為羅卓英，辦公廳主任為林蔚，都是陳誠嫡系）、武漢行營副主任（主任為何成濬，但蔣介石當面命令何成濬：「所有行營一切用人行政，全歸陳誠修作主，你不准過問。所以何成濬是一個傀儡主任）、軍政部常務次長，實權之大，超過任何軍人。抗戰以後，權力更大，一身兼的要職，計有軍委會政治部長、三民主義青年團書記長，第六戰區司令長官、湖北省政府主席，同時還節制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及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一九四一年因何應欽、白崇禧、孔祥熙聯合起來反對他，利用「宜昌失守」為口實在蔣介石面前猛烈攻擊他，蔣介石為緩和內部矛盾，把政治部部長及三青团書記長兩職給了張治中。到一九四四年，蔣介石以流砥手段要挾羅斯福召回史迪威將軍，（否則他就不抗日了！）羅斯福接受了這個要求，以魏德邁代替史迪威，同時也要求蔣介石把顯著無效率而不爭榮的部長牌換掉，於是軍政部長何應欽、財政部長孔祥熙不得不更換一下，以敷衍美國政府的面子。當何應欽辭去軍政部長的時候，蔣要何推荐繼任人選，何應欽上了一個簽呈，推荐顧祝同繼任軍政部長，蔣介石看了之後置之不理，何應欽等了幾日杳無音信，就托人去打聽究竟，知道蔣介石寫了四個字在上面是「辭修如何？」何應欽馬上另上一簽呈，推荐陳誠，於是命

合就下來了。一九四六年改組「軍事委員會」，「國防部」時，形式上似乎「國防部」比「軍政部」擴大了，實際上則實權操在「參謀總長」之手。「參謀總長」直接秉承「國府主席」的命令，統率陸海空軍，不受「國防部長」的節制，「參謀總長」指揮着「陸軍」、「海軍」、「空軍」，「後勤」四個「總司令」，「後勤總司令」所管的「軍需」、「兵工」，原來是隨軍政部管的，這樣一來，「國防部」的權威比原來的軍政部反而縮小了。所以白崇禧出任「國防部長」形式上似乎算是做了「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繼承人」。

（這個故事下面再談，實際則是隨談的傳聞。）

在黃埔學生中，升官最快、軍權最大的是胡宗南，大家都知道他比蔣介石最得意最如意培植的學生，甚至很多人相信胡宗南是蔣介石的真正繼承人。在抗戰中統率了四十萬寬綽系導綽系軍隊，任何一個將領沒有他那樣多的部隊，可是他並不打仗。日本投降後，他的部隊東到東北，西到新疆，那些部隊雖分到別的地區，但仍遙受胡宗南的指揮，當地的高級指揮官是不能指揮如意的。胡宗南不僅在抗戰中毫無功績可言，就是在十年內戰中也沒有顯出什麼能耐，以黃埔學生相比較，講學問能力不及范漢傑，講「戰績」則比關麟徵更得遠，比杜聿明也不如些；但為什麼能掌握那樣大權呢？同樣一個原因，他是個浙江人。

抗戰以前胡宗南的第一軍幾近十萬人，軍餉最多，裝備最好，一個連有二百人，一個師幾近三萬，被認為蔣介石嫡系最精銳的部隊。八年抗戰中，胡宗南只派過一部分軍隊參加淞滬戰役，給吳淞守軍軍糧，從此以後，就縮在西北，從來沒有打過仗。抗戰到太平洋戰爭發生的四年中，只有蘇聯援桂助中戰，軍火源源不絕地從新疆運進來，絕大部份用於加強了胡宗南前部隊，因為他駐紮在陝甘，擔任封鎖陝甘寧邊區和準備進攻陝甘寧邊區的任務，「近水樓台先得月」，用蘇聯援助中國抗日的軍械彈藥，對付中國共產黨，這是蔣介石集團認為最得意的傑作！不擔任抗戰任務，而一天天坐大，就是黃埔軍人也很多人心目不服。關麟徵曾說過「大概他政治上沒有辦法」。甚至有人因他三十餘歲不結婚而猜斷他「不識人道」，更因此推測與蔣介石有什麼「特殊關係」，這只能說是無稽之談。關麟徵說他「政治上有辦法」，倒有幾分道理。大家知道：「集中營」就是從西安創始的；而著名記者張青（即任卓宣，現在已遠居紐約中委）則是

胡宗南的重要幹部。在蔣系軍人中。實施各項法西斯統治的血腥辦法的，胡宗南是首屈一指。這也是胡宗南特別受蔣介石重視的主要原因。

在蔣介石的嫡系軍人中，只有陳誠和胡宗南兩人最得蔣介石信任，到日本投降時為止，能夠不等通報直接進去見蔣介石的，除談話之外只有四個人，就是陳誠、胡宗南、孔祥熙、張羣；此外則連何應欽都要通報才能進去，不能直闖。陳誠和胡宗南兩人因為幹的是同一行，所以相互間矛盾很大，彼此都要發展自己的勢力，常常互相攻訐；蔣介石就利用這一點以維持『最高的威嚴』，陳胡兩人要爭權，就必然互相競爭，『誰對領袖更顯得忠實』，『誰更盡心盡力於領袖的意圖』。何應欽則利用這一點使陳胡二人都要拉攏他，以加強自己一面的聲勢，而在蔣介石面前都不說何應欽的壞話，且進一步代何應欽說好話。直到一九四一年陳誠失去政治部長和三青團書記長職位時，何應欽與陳誠的關係才垮壞了。

笨伯『小諸葛』

談到了何應欽、陳誠、胡宗南三個蔣介石嫡系軍人，其中牽涉到白崇禧，白崇禧今天已甘心情願跟着蔣介石為反共反人民而賣力，擔任國防部長後，時常飛南飛北，為鎮壓民變，部署內戰出力。人民解放軍反攻到長江邊之後，蔣介石任命白崇禧為華中地區『總司令』，與東北的陳誠，西北的胡宗南同為『三大將』。白崇禧雖非蔣之嫡系，但也有一說之必要。

白崇禧是廣西系軍人的領袖之一，一般認為他擅長軍事，智足多謀，諳諳『小諸葛』。民國十四年冬，廣西的李宗仁、黃紹竑附國民政府，白崇禧是李黃派到廣州去的代表，廣西軍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七師，李宗仁任軍長，黃紹竑為副軍長兼黨代表，白崇禧為第一旅旅長（那時國民革命軍的編制，軍轄三師或四師，師轄三團，沒有旅的一級，但第七軍的編制特殊，軍下無師，轄七個旅，每旅為兩個團，比一二三四五六軍兵節較多）。民國十五年北伐時，白崇禧任總司令部第五旅旅長兼東路軍前敵總指揮。民國十七年張作霖出關以後，白崇禧任北平軍分會委員長，並實際掌握北平政治分會；蔣桂戰爭桂兵失敗，李自狼狽返

桂，不久黃紹竑被蔣收買，入南京任內政部長（後調浙江省主席），廣西軍政由李宗仁白崇禧主持，並稱白。九一八以後，設西南執行部（黨）及西南政務委員會（政府）於廣州；粵桂兩省久成半獨立狀態，李宗仁常川駐粵，桂省全由白崇禧主持，尖刻者稱李宗仁爲白崇禧的「大使」。民國二十五年陳濟棠失敗，西南兩省機關撤銷，粵軍改編，廣西因內部團結，蔣介石無隙可乘，於是派李宗仁爲第五路軍總司令兼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爲第五路軍副總司令兼廣西綏靖副主任。（蔣介石曾任命白崇禧爲浙江省政府主席，調虎離山，而把黃紹竑派回廣西，結果被桂系拒絕了。）一般人認爲李德鄰（宗仁）忠厚大度，才不勝德；白健生（崇禧）精明強悍，德不勝才，這個批評並不恰當，李白兩人都是封建軍閥，反人民的罪人，根本沒有什麼「德」之可言，就講「才」，白崇禧察察爲明，目光淺短，斤斤較量小得失，不識大體，無容人之量，是小有才而好自用的人物；接近桂系的某政客，對李宗仁的評語爲「大智者愚」四字，雖然稱諷太過分，但也有幾分道理。民二十七年徐州撤退就是白部署的，每一輛汽車什麼時候走，走那一條路，他都要詳細規定，結果情況的發展和他預期的不一樣，下面不能機動作主，致突圍時狼狽亂不堪，損失甚大。（這和蔣介石親自指揮淞滬撤退一樣，限定某時某刻炸毀崑山東面的青陽江鐵橋，到時候，還有三萬兵未過河，炸橋部隊以命令時間已到，就執行炸橋，河東的部隊因此氣憤萬分而向河西開火。）白崇禧的「精明幹練」大批如此。「七七」以後，白崇禧到了南京，與蔣介石等商議抗日大計，蔣復器重他，委他做參謀副總長，調桂軍北上抗戰，任李宗仁爲第五戰區司令長官。一時蔣兼一戰區長官，閻錫山爲二戰區長官，馮玉祥爲三戰區長官，何應欽爲四戰區長官。（某次蔣介石對他的親信人員秘密宣佈：「抗戰一開始，不知何日了結，萬一我中途身死，我的位置由白健生代替；白健生如再死，則由何敬之代替。」這一番話很快就傳到白崇禧那裏，而且有一些蔣介石嫡系人物因爲白崇禧已被蔣指定爲「第一繼承人」而去對他的好。這箇「小諸葛」從此對蔣感激涕零，拚命把廣西部隊調出北上作戰。武漢撤退之後，蔣委白爲西南行營主任，節制三、四、九等戰區，似乎把東南半個中國都交給他了。但到日寇侵入南寧時，廣西境內兵力單薄，只有請調「中央軍」入桂，而岷嶺關一役，第二軍李延年第五軍杜聿明幾乎全軍覆滅，因此陳誠就囑

力功擊白蟻，結果西南行營也撤銷了。那時，桂系軍隊已損失了三分之二，蔣介石的目的已達到，於是白崇禧就到重慶去當一個毫無實權的參謀副總長。智足多謀的「小諸葛」，被蔣介石稍施詭計，就像一個小孩子那樣被玩弄於掌股之上。因此有人把「小諸葛」的「小」字去掉，背地稱他為「笨諸葛」。

廣西軍隊被蔣介石削弱了，白崇禧雖知道了蔣介石的當，但他却轉而死心塌地為蔣介石效力，冀求在蔣介石的羽翼下分些殘羹冷飯，變成蔣介石的鷹徒了。

CC團

蔣介石常以「黨統」壓人，而蔣介石集團的「黨」，則向由陳果夫陳立夫兄弟霸持，一般稱為CC系，包辦黨務、特務、文化部門；後來蔣介石又以黃埔學生為骨幹，建立了法西斯團體，一般稱為「藍衣社」，也搞特務和文化，他們有軍隊作後盾，蔣介石對他們的信任，在某些問題上還超過CC，因此也滲入一部份勢力到黨務部門。到民國二十七年，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就主要由「藍衣社」主持。因此CC與藍衣社之間就時常打架。一般又稱「藍衣社」為「復興系」，這個名稱很不恰當，因為「藍衣社」的外圍組織雖叫「民族復興社」，但民國二十六年以後CC的公開組織就叫個「民族復興大同盟」，同時汪精衛派的組織也叫做「民族復興會」，以「民族復興」為名的有「社」有「會」又有「大同盟」，雖然「民族復興社」的招牌較老，但單稱「復興」，就容易混淆。「藍衣社」這個名稱雖無明文，但比較普遍而含義明確，所以我們仍沿用這個名稱。

CC的來源說法有二：一即陳氏兄弟，「陳」字的英文字母第一個是C字，CC就是「二陳」的縮寫；二是「中央俱樂部」的縮寫。不啻是那一個說法對，反正都是以二陳為中心的集團，因此，在談及CC團時，首先談一談陳氏兄弟。陳果夫出身商人，前年已購進他做上海物品交易所時的歷史，民國十五年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三月二十日」事件後做中央組織部長，北伐後，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遷往武漢，陳果夫在廣州任後方總司令部秘書長，十六年「四一二」後，又担任蔣記中央黨部的組織部

長，蔣介石下野時連帶去職。十七年蔣介石復職時又任組織部長。經過他的手辦理「第三次代表大會」圍定「代表」，指定「代表」等辦法，「九一八」後汪蔣合作，他出任江蘇省主席，組織部長由他的兄弟立夫擔任；以後擔任農民銀行理事長，及國民黨黨校「中央政治學校」教育長。陳立夫出身於北洋大學，習探礦工程，留學美國，十七年返國任蔣介石的英文秘書，為國民黨黨務系統特務工作的創始人，不久即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經過一個共匪黨叛徒代他寫了一本「唯生論」，就成為國民黨的「理論家」。兄弟兩人主持黨務，許多黨棍子都投其門下，所以有「蔣家天下陳家黨」的諺語流傳全國。

民國二十四年國民黨舉行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時，事前蔣介石派戴季陶到廣州去徵求西南實力派的意見，經西南執行部開會商量後，提出執監委員名單，由戴季陶及鄒魯（西南出席）五全大會代表團的領袖帶到南京，交給蔣介石，由蔣轉交陳立夫，囑其「照辦」，後來陳濟棠又以私人名義提一名單，蔣介石因為陳濟棠是實力派，初擬送就陳濟棠，把原來的名單更改，後經戴季陶力爭，仍決定原來名單，但陳立夫嫌西南提出的名單人數太多，就指使其嚙囉少投西南派的票。結果第一次投票，有許多西南派人沒有當選，而「中央黨部」的秘書科長，如方治、蕭道慈、張冲、徐恩曾等，都當選了中委。蔣介石覺得面子上过不去，他已親自答應，威信有損，於是第二次要選出的八十人，不再經過投票，一律由主席團指定，才了此一重公案。陳立夫操縱選舉還不僅如此。那次選舉自票數發表時，陳立夫所得的票數僅比蔣介石少一票，已使人覺得很奇怪，實際上陳立夫所得的票數比蔣介石還多四票，陳立夫自己覺得不好意思，親自到黑板上擦去一個「正」字（一票），所以比蔣介石少了一票。這一件事當然就馬上有人報告蔣介石，蔣介石感到陳立夫太「權高望重」，自己感到威脅了，民國二十五年初，要把陳立夫卸卸起來，陳立夫消息靈通，就躲入天目山「養病」，託了許多人去向蔣介石說好話，勸員了他的叔母（陳英士之妻）去說情，那時陳英士的獨養兒子學空軍跌死了，陳英士的老婆去向蔣介石哭，說：「我的兒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兒子，他有多大的胆敢不聽委員長的話！你難道忍心叫英士絕後嗎？」蔣介石火頭過了，想叫陳立夫以共有功，於是表示諒解，陳立夫的「病」也就好了。以後蔣介石就把朱家驊代替陳立夫，而調陳立夫去代王世

杰爲教育部長。

陳立夫做了教育部長以後的「德政」，就是變學校爲集中營，一方面制定教授的黑名单，命令各大學擱進步的教授解聘，或不許續聘；一方面利用戰區學生的生活津貼收買走狗，至規規矩矩求學的青年，飢寒交迫，所領津貼無論如何也吃不飽。重慶川東師範有一個大防空洞，成爲陳立夫拘禁青年的牢獄。民國二十九年重慶發生大隧道口被炸坍塌死數千人的大慘案，國民黨政府因此組織防空洞管理委員會，說要整頓一番，陳立夫爲委員之一。人家懷疑陳立夫和防空洞發生什麼關係，國民黨的中央社宣佈：「陳部長是專家」，人們不知「專家」的意義從何而來，陳立夫雖學過探礦，許多年來早忘掉了，後來有人點明，原來是使用防空洞的「專家」，不僅「專」而且「發明家」，世界上沒有第二個人會那樣使用防空洞的。到一九四四年，蔣介石爲了更進一步的加強國民黨的反動堅決性，又將陳立夫與朱家驊對調，陳立夫同任組織部長，朱家驊做教育部長。

CC的所以爲蔣介石所倚重，主要原因之一是其早搞特務。民國十六年的「一一·二二」慘案，就是陳果夫而置的，蔣介石藉此把西山會議派的氣餒壓下去了。在這以前，西山會議派常以「反共先聲」自命，他們是「先知先覺」，蔣介石是「後知後覺」，處處倚老賣老，蔣介石不易獨斷獨行，經過「一一·二二」慘案，蔣介石重行上台，聲勢就大不相同。國民黨中央開會的時候，對重要的案件，陳果夫老是說：「這要徵求總司令的意見，再好決定。」胡漢民雖曾發過牢騷：「究竟是總司令聽命於中央，還是中央聽命於總司令？這樣做法，不是愛戴介石而是害介石的。」可是毫無辦法能改變這種一切以蔣個人意志爲依歸的作風。後來就專設一個特務機構，專作對付共產黨的執行機關，叫做「調查科」，隸屬於組織部，由陳立夫親自領導，科長爲陳立夫的表兄弟徐恩曾（出身於上海交通大學，曾留美習電氣工程），在重要城市的公安局內設「調查室」，直接聽命於陳、徐。以後又在各省市黨部內設調查室，特務網的佈置遍及各縣區，這成爲蔣介石獨裁統治機構中不可缺少的部份。民二十一年以後，蔣介石的「剿匪總司令部」內設了兩個特務部門，第五科由鄧文儀主持，第六科由戴笠主持，以情報爲主，因鄧文儀的成績不及戴笠，特

辦工作就歸併給戴笠。(另外一個黃浦系的特務組織為康澤的「剿共義勇隊」，一般工作限於在蘇區「清剿」。)戴笠的特務系統一天天擴大，與徐恩曾領導的特務系統就發生了衝突。矛盾日益尖銳，民國二十五年，蔣介石就把他統一起來，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陳立夫為局長，陳煒(曾任南京警務總監)為副局長，徐恩曾為第一處長，戴笠為第二處長。名義上雖統一了，實際上第一處與第二處還是互相打架。到二十六年又分為兩個「調查統計局」，一屬中央黨部，以朱家驊為局長，徐恩曾為副局長；一屬軍委會。以賀耀組為局長，戴笠為副局長。兩個局長都是掛名的，實權都操在副局長手裏。到一九四三、四四年，徐恩曾做交通部次長，由葉秀峯(也是學工程的，曾任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江蘇省建設廳長，正中書局總經理、國民黨中委)任副局長，其後即升局長，實際工作則由郭紫峻負責。在抗戰時期。CC的特務工作「成績」，遠落在藍衣社之後，對日情報固然毫無建樹，就是以專門幹的「反共」工作，也不及藍衣社，因禁煙磨折愛國青年的集中營勞動營，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屬於藍衣社的，CC掌握的不足三分之一。CC特務系統人員投降敵人的雖為數甚衆(著名的如丁默邨、李士羣等等，丁默邨投敵後即與藍衣社連系)，但對CC毫無「貢獻」，CC其他投敵要員，如周佛海等，以後即與戴笠發生隔閡。所以日本投降後，蔣介石下了一道密令：「在收復區，只准軍統局有行動權，中統局只准做報告，不准行動。」因此，中統局劫收的財富比軍統局要少得多，在聲勢上也相形見拙。一九四六年戴笠墮機斃命，軍統局(已併入國防部)羣龍無首，各不相下，中統局始乘機擴展，恢復了一些失去的聲勢。

CC的另一特務工作，就是在學校中建立特務組織，抗戰前在上海各大中學組織的叫做「青社」，最初由吳醒亞領導，吳醒亞死後由潘公展領導。「青社」的社員，由CC發給手槍，可以隨時威脅教職員和同學，加入了「青社」，可以不上課，不考試，照常升級，照常畢業，畢業後升學或就業，都由CC所把持的行政機關負責，每月還有二三十元津貼，足夠在小舞場中夜夜跳舞。中學畢業會考，過去是很嚴格的，有很多學生爲了應付會考，逼出病來，但「青社」社員在考試前可以先偷題目，考試後又有「特別加分」，只要有半分就好加到六十分，會考就及格了。所以就有一批浮薄青年，加入這個特務組織。加入之後

的工作，就是監獄有正義感的愛國的進步學生與愛國的有正義感的教員，隨時做情報，今天說甲「反動」，明天說乙是「人民陣綫」。那時在上海各大中學都有，大學中尤以暨南大學為最囂張，暨南大學校長白鵬飛在禮堂講話，特務學生掏出槍來，喊「滾下去，滾下去！」白鵬飛不安於位，於是由CC的何炳松去代替他。何炳松上任後，帶了一批CC特務去當職員。被授，但特務學生仍極囂張，致好幾次由吳醒齋親自趕去解釋。暨南曾發生一個笑話：訓導處規定學生不准一人住一間宿舍，必須兩三個人合住一室，但有許多學生竊住一室，既不搬出也不讓別人搬入，訓導處職員去干涉，一個學生把袋一拍：「老子有手槍，老子不搬！」訓導處職員也把袋一拍，說：「老子也有手槍，老子一定要你搬！」民國二十五年的復旦大學風潮，就是潘公展想做復旦大學校長，而策動特務學生搗亂而起。CC則這套行動，使許多舊社會的士紳學者（甚至如國民黨老黨員曾任江蘇民政廳長的胡漢安等），都一致認為是「贖夫人之子」（害人子弟）。

41

CC的領袖除陳果夫兄弟外，重要的有朱家驊、谷正綱、程天放、余井塘、張勵生、李宗黃、張道藩；其次則有葉秀峯、潘公展、吳開先、徐恩曾、方治、蕭同茲、程滄波、馬元放、趙棣華、李中襄、許孝奕、陶希聖、陶百川、許紹楙、項定榮、羅慶天等。陳布雷的主張態度，與CC流溢一氣，但他直接受蔣介石的支配，只能算是半個CC。在上述諸人中，有些已脫離二陳（如朱家驊），或與二陳貌合神離（如程天放）或腳踏兩頭船（如張勵生），但他們都是CC出身本質，立場上與CC沒有分別，所以仍歸入CC。

朱家驊，字驥先，與張靜江、戴季陶、陳果夫為吳興同鄉，曾任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參加民國十五年北京「三一八」運動，其後與徐謙、顧孟餘、陳友仁等先後到粵，助鈕永建、葉楚傖辦「中央學術院」，戴季陶任中山大學校長時。朱任副校長，北閩後任浙江民政廳長（時張靜江任浙江省主席）。朱原與張靜江關係很好，後因閩閩騷擾事件與張積不相容，朱拉訴於戴季陶，戴言於蔣，民國十九年秋冬間，張、朱乃同時去職。朱回南京後即成爲CC的要角，曾一度任交通部長，抗戰時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日寇陷杭州，朱已狼狽四逃，因戰事緊張，蔣又派黃紹竑回浙主政，朱內調代葉楚傖爲國民黨中央黨部總書長，其後

又轉任組織部長，朱在擔任總務長與組織部長任內，不斷將各省市黨部書記長調入中央訓練團受訓，而派其私人代理，在CC團中單獨形成一派，脫離二陳而自樹一幟，人稱爲「新CC」。在國民黨內部，朱家驊雖有一部分勢力，但比起二陳來却相差甚遠，不能起決定作用。蔡元培逝世後，朱與北大關係，代理中央研究院院長，一九四四年與陳立夫對調，任教育部長。朱爲著名親德派，蘇德戰爭發生，與德使館人員相約在新羅見面者（意即德國完全打敗蘇聯，德軍進入中亞細亞而到新羅邊境，他們到新羅去慶祝德國的勝利），朱家驊亦是一個。

谷正綱原來是汪精衛部下的一員大將，民國二十一年汪蔣合作，谷任國民黨中央社會部長，其後社會部成爲行政院的一部，谷仍任部長。由於反共反人民極爲堅決，即與CC合流，汪精衛投敵後，谷仍留重慶供職，蔣對他更爲信任。民國二十九年冬，三十年春，中華職業教育社黃炎培、江慎源（問漁）、冷遯（黎秋）擬成立一政治團體，定名爲「國訊同志會」，黃等與蔣談及，蔣說「可以」，即由黃、江、冷三人出面寫一文件呈蔣，蔣親筆批「交社會部依法辦理」，黃等就持交谷正綱，要辦理立案手續。谷正綱與陳立夫、朱家驊商量後，決定無論如何不讓組織，但既經蔣介石親自批准，又沒有任何藉口不推組織，於是就由谷、朱兩人去恫嚇黃、江、冷三者，說：「共產黨太厲害了，我們國民黨有五十年政治鬥爭歷史與經驗，還搞不過共產黨，你們要成立一個政治團體，一定會被共產黨操縱，那時我們固然不好辦，你們也負不了這個責任。」黃炎培經此一嚇，就此不敢成立，以批評國民黨一頓了結。（民主政團同盟於民國三十年春及國成立時，原定由黃炎培任主席，黃因「國訊同志會」未組成，他沒有「政團」，未加入同盟，其後民盟名稱刪去「政團」兩字，黃始參加。）

程天放原爲蔣吳夫的頭頭幹部，陳果夫任江蘇省主席時程爲祕書長，其後CC排擠政學系的民政廳長邵仁發，程天放即爲一定由他繼長民廳。但陳果夫却因余井塘更爲忠實而給了余井塘，程天放因此一怒而去職，其後即投奔政學系，曾一度任中央大學校長，又出任第一任的駐德大使，鬧了不少笑話。以後就不大活躍了。

余井塘本非國民黨員，民國十六年從法國回來找不到職業，經西山會議派收養在中央組織部任幹事。十七年春蔣復職時陳果夫同任組織部長，西山會議派的職員都去職，獨余井塘因怕失業而留在部裏不走，因此受陳果夫重視，由幹事而總幹事，而秘書，而主任秘書，而中央執行委員，而組織部副部長，而江蘇省民政廳長，一帆風順，扶搖直上。余在CC中爲腐材之尤，但以盲從爲二陳所賞識。

張勵生在「九一八」後任國民黨河北平津特派員，專作逮捕進步人士及威脅意志薄弱者「自首」等特務工作，原屬CC在北方的健將，其後則與陳誠關係密切，因此抗戰後任軍委會政治部第二副部長，又一度任中央黨部組織部長，日寇投降後任內政部長，並爲國民黨出席政協會第八代表之一。一般稱張勵生爲「三陳系」，因他的老窩不僅爲陳果夫立夫兄弟，另外還有一個陳誠。

李宗黃是CC中的「縣政專家」，國民黨的「新縣制」，大部出於李宗黃主持的「縣政研究委員會」所規劃，因此得任雲南省民政廳長。民國三十四年杜聿明驅逐龍雲，由李代理雲南省政府主席，「昆明慘案」卽李與關麟徵二人合演的「傑作」，爲罪魁之一。

潘公展與二陳爲吳興同鄉，曾任「申報」記者，民國十六年「四一二」以後始加入國民黨，因同鄉關係得兩陳引援，歷任上海市政府農工商局長，秘書長，社會局長，教育局長，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九一八」後主辦「晨報」，爲公開鼓吹法西斯主義的國民黨機關報；民國廿四年因得罪孔祥熙而停刊。「八一三」抗戰時，利用社會局地位，與楊虎（淞滬警備司令）葉勳軍（警察局長兼戒嚴副司令）狼狽爲奸，勒索工商界，非繳納幾近半價的賄賂，不許搬出關北貨物，十一月國民黨軍撤走時，放火燒光，致損失六萬萬元以上（當時匯價相等於二萬萬美元），上海商人曾致電蔣介石：「請斬葉潘以謝滬人。」國民黨政府逃到重慶後，曾任中宣部副部長，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主任委員，日寇投降後回上海任「市參議會議長」。

吳開先在大革命時曾任上海「民國日報」校對，一度加入共產黨，「四一二」後首先叛變，成爲反共特務的主要人物，因此從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組織部總幹事而組織部長，而常務委員，成爲上海的「黨皇爺」。

「更換擬黃色工會，潘公展任教育局長時，用行政全由吳開先主持。其後與潘矛盾甚尖銳，曾啟發傳單，宣佈潘公展十大罪狀。抗戰後退至武漢，任C的公開組織「民族復興大同盟」書記長。汪精衛叛國後，吳開先系的上海市黨部委員，自書記長蔡洪田以下，汪曼雲、黃香谷等完全投敵，吳開先即到上海主持國民黨「黨政統一委員會」，與敵偽勾結，太平洋戰爭後，以「被捕」形式投敵，不久即由敵偽送回黨部，從事誘降活動。日寇投降後，任上海市社會局長。

程滄波，名中行，原來是研究系，「時事新報」主筆，批評國民黨以尖銳著稱，蔣介石曾公開在紀念週上罵過他，其後即受國民黨收買，出國「考察」後任「中央日報」社長，陳果夫任江蘇省主席時，繼程天放為秘書長。西安事變時痛罵張學良，從祖宗三代罵起，宋子文曾當面指示他沒有報格說：「你究竟是個學良，還是罵政府？張學良如像你所罵的一向極壞，政府就不該用他，責任就不在張學良而在政府了。」程私德極壞，其屬員眷屬之年輕貌美者，輒多方勾引，不避人口。民國三十年任監察院秘書長，日本投降後任江蘇監察使。

張道藩，曾留學法國，習美術，為C主持文化工作，曾任南京市政府秘書長（桂系何民魂任市長時），內政、教育兩部次長，抗戰後曾製造各種御用文化團體。但久不得升官發財，因此跟老畫師齊白石學畫，時發牢騷，蔣介石曾罵過他「愈過愈糊塗」。

馬元放（原名欽冰），最初在南京市政府任編審，受知於張道藩。投入CC，出任江蘇省黨部委員，抗戰後任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江蘇省教育廳長，民國二十九年任上海被捕即投敵，民國三十二年由周佛海派回重慶。日本投降後任南京市黨部主任委員兼南京市副市長。

趙禮華為C掌握財權的大員，陳果夫任江蘇主席時任財政廳長，抗戰後任交通銀行總經理。

陶百川出身小學教師，「四一二」後從幹事秘書而上升為上海市黨部常務委員，「九一八」後因私自擄捕北平學生代表，為上海人民法庭所通緝（由市長張羣親筆簽發緝捕令）。民國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年上書陳立夫，請求出洋留學，中有「他日學成歸國，決不如羊公之輔，對客不舞」（意思說一定為你出死力）。那樣的信息，

公開刊於上海市黨部的機關刊物中，真是無恥之尤。抗戰後在香港『國民日報』社長，其後回重慶任『中央週刊』社長，專門造謠，甚至說：『共軍劉伯承部襲國軍一二九師』（一二九師即劉伯承部番號）。其他諸人，葉秀峯、徐恩曾前都已談到過，方治（安徽人）原任宣傳部秘書，抗戰後一度任安徽省黨部主任委員。日本投降後代吳紹澍任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蕭同茲為中央通訊社社長，蔣馮閻戰爭隨張羣、吳鐵城出關活動張學良入關。李中襄、許孝天為抗戰期中的參政員，與陶百川為國民黨在國民參政會中的黨團負責人，許孝天為宣傳部主任秘書。陶希聖為著名漢奸，衆所共知，無庸介紹。許紹楙（即與郁達夫之妻王映霞通奸者）、項定榮、羅履天均為浙江黨閥。

藍衣社

『藍衣社』這個名稱是非正式的，是劉健羣提出的：『希特勒、墨索里尼有『黑衫黨』『褐衫隊』，我們就來一個『藍衣社』。』據說那時蔣介石既不贊成，也不反對，成了懸案，不過，照後來蔣介石辦事慣例，凡屬於法西斯統治的，不駁斥的就是贊成，就是默許（他決不公開批准，留一把柄給人，以便到應付不了的時候，可以推說『不知道』，或『我沒有許可』，就責任推在別人身上），也可以說是半公開的正式的名稱。至於公開的名稱則為『力行社』，蔣介石的婆羅們不是常宣傳『領袖的力行哲學』嗎？就是這個社名的來源。『力行社』的外圍團體有兩個：一個是『青年革命軍人聯合會』，全由黃埔學生組成（後來又發展到陸大學生）；一個就是『民族復興社』，則包括黃埔與非黃埔系的分子，軍人與非軍人，範圍較『青年革命軍人聯合會』為廣。所以也有人說：藍衣社的組織分為三層，核心是『力行社』，中間一層是『青年革命軍人聯合會』，外圍是『民族復興社』，也有道理。

『青年革命軍人聯合會』這一名稱，原是黃埔軍校初期進步的左派的組織，與右派的『孫文主義學會』相對立的團體（『孫文主義學會』為西山會議派的組織，黃埔軍校中以何應欽與蔣經國人為文武兩領袖，但聲明與西山會議無關，因此何、蔣兩人在民國十五年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均當選為中央候補

執行委員。所謂「孫文主義」，就是根據戴季陶所著「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一書，說孫中山是「繼承孫孫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統」的。蔣介石這竊這一名詞，用到了法西斯團體上去，不僅無恥，而且惡毒。他的目的就是在欺騙一般青年，把他自己的罪惡統統推測到別人身上去，除其本方面以反共反人民為中心，凡是可以把責任推給共產黨和人民的，統統推測到共產黨和人民外，對許多國民黨統治無可掩飾的罪惡，歸之於其他派別（如桂系軍閥，馮國璋，東北軍，西北軍，西南軍人等等）不能推給其他派別的，就推測到政學系或宋子文孔祥熙身上去。而蔣介石本人則是「盡善盡美」的。所以，許多狂妄而愚蠢的黃埔軍人，對於腐敗糜爛的國民黨統治，總說「這不是「領袖」的意思，是那「左右」把事情搞壞了，「領袖」也很苦悶」。這當然只是黃埔系中下級人員的迷信，至於上層分子，他們熟習蔣介石的一套（一面騙取黃埔軍人的信仰，一面又藉黃埔軍人以控制他系），就利用以獲取權位，一朝權在手，搜刮掠奪比CC，政學系等更為窮兇極惡，如日本投降後第一任淞滬警備副總司令李及蘭，公開綁票，民族資本家申新紗廠，茂新，福新麵粉廠的主人榮德生被綁，以五十餘萬美金贖出，就是李及蘭主使，因為這件事鬧得無法掩飾，李及蘭才就被撤職的。

「十三太保」

藍衣社的主要人物，有所謂「十三太保」（沙陀國王李克用有子及義子十三人，稱為「十三太保」，「太保」等於清代的「貝勒」，即「王子」之意），著名的有曾擴情、賀衷寒、鄧佛、戴笠、康澤、邵文儀、劉健羣等，另外還有潘佑強等幾個不著名的人物。其中除劉健羣一人外，均為黃埔學生，劉健羣在抗戰時期因受黃埔系排擠，曾一度出家做和尚（表面的原因是為了失戀）。曾擴情、劉健羣、賀衷寒三人均做過軍委會政治訓練處處長，主持過部隊政訓工作（即部隊中的特務工作）。曾擴情於民國二十五年任「西北剿匪司令部政訓處長」，西安事變時張學良楊虎城沒有逮捕他，他自告奮勇，在西安電台上廣播，號召蔣系軍隊擁護蔣副司令，為主任的主張。蔣介石被釋放後，曾擴情也到了南京，上了一個萬言書，解釋他

在西安時行動的用意，在保護蔣的生命，並如何發生作用。蔣介石在呈文的後面批了四個字「無聊之尤」，把會送到南京衛戍司令部去關了好幾個月。鄧悌於抗戰初期在長沙警備司令，民國二十七年放火燒燬長沙全境，因此被槍決。火燒長沙後，謠傳放火的目的，在出其不意地燒死周恩來將軍，因為武漢失守後，蔣將軍那時在長沙，而國民黨要人則不是到了重慶，就是到了歸陽，放火的命令是湖南省主席張治中與鄧悌商定下的，執行者是鄧悌，出事後輿情大譁，蔣介石派員去查辦，張治中和鄧悌商議，由鄧悌承認全部責任，張治中可以從中斡旋，理由是如果兩個人都牽涉在裏面，就沒有入好發言，鄧悌一人担當了，張治中就有權發言了。鄧悌同意這個辦法，把一切責任承擔下來，並在調查報告上簽名畫押，查辦大員馬上取出蔣介石的手令來，上面有八個大字：「查明主犯，立即正法。」鄧悌才知道上了張治中的大當，臨刑時大罵張治中做了圈套害他（另有人傳說：槍決的不是鄧悌，真鄧悌放走了，理由是鄧悌死後，他的老婆幾乎沒有哭過。此說不足信，但另一方面也說明藍衣社常做假事情，慣於偷天換日，所以有此傳說流行）。因此，藍衣社活躍的人物，就祇有賀衷寒、戴笠、康澤、鄧文儀四人，關於這四個人的故事，在敘述藍衣社的主要工作時分別談到。

製毒籌款

藍衣社的工作，可分為：調查（情報）、行動（監視、禁錮、以及暗殺）、組織、籌款四大類，尤以情報與行動為主，籌款則比較簡單，除財政部撥給軍事委員會的鉅額機密費，及向各地方軍事、行政長官索取報銷（實際類於攤派，如藉口舉辦事業，代募股金，或收買貨物，代墊貨款等）外，主要就是製造販賣嗎啡、海洛因等毒品。抗戰之前，上海就有兩個大規模的製毒機關，一個在上海北郊長江邊的瀏河鎮附近，是藍衣社直接經營的；一個設在南京市保安隊部裏面，是孔祥熙、吳鐵城、杜月笙經營的，要繳納一定的稅捐給蔣介石作機密費用（即藍衣社特務費）。後者的開始，是在蔣介石自兼禁煙總監，雷厲風行禁煙之後，在漢口抄到一批鴉片土，有五十餘萬兩（是四川軍閥的，他們販運大批烟土，沒有和藍衣社合作，

所以抄沒了)，蔣介石就交給孔祥熙去製造嗎啡，孔即轉交給吳鐵城（那時的上海市長兼淞滬警備司令）和杜月笙辦理。這個嗎啡廠就設在南市一個保安隊的中隊部，當然十分保險，沒有任何人敢去碰它。這個事情很秘密，怎樣會暴露出來的呢？因為上海市保安隊（楊虎統率的）不知道瀏河的嗎啡廠是藍衣社開設的，跑去發橫財，把這個嗎啡廠抄沒了，後來楊虎和吳鐵城知道了，把抄沒的東西大部分發還，但「太保」們認為奇恥大辱，就採取報復行為，衝到保安隊所保護的嗎啡廠去，把毒品和製造機器都搬走了。這樣一來，就鬧得滿城風雨，上海市知道的人就不少。吳鐵城因為他的嗎啡廠是蔣介石批准的，當然於心不甘，但藍衣社却揚出證據，說五十餘萬兩烟土早已過頭了，過去雖是「奉命」，現在却是私造，製海販毒成爲藍衣社的獨佔副業。（抗戰中期，一九四〇——四一年，蔣介石又在川康滇黔各省「嚴厲禁烟」，沒收了二千餘萬兩烟土，結果貼上「軍用品」的封條，運到廣東去轉銷於沿海各省，這次由孔祥熙與藍衣社合作，沒有內鬨起來。）

賀衷寒與鄧文儀

訓練工作就是各種「訓練團」及部隊中的政治訓練，其目的有二：一、灌輸法西斯思想，加強盲從教育；二、監視兼偵察受訓人員。他們在「訓練團」中常發動對國民黨政府的批評，藍衣社分子當首先發言，把一些官吏痛罵一頓，以引起別人說出不滿的話，因此判定誰是「不穩」分子，加上種種帽子。這一工作，主要由賀衷寒、鄧文儀兩人負責。賀衷寒在抗戰以前任軍委會政訓處長兩年多，還兼任「中央新聞檢查所所長」一年多（在賀衷寒之前這一職由國民黨中宣部葉楚傖兼任），一開口就罵新聞記者沒有「國家觀念」，是一個極端狂妄的人。據說他讀過很多社會科學和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他讀書的目的，並不是爲了研究什麼問題，而是從一字一句中去找「漏洞」（不顧具體的時間和空間條件），以充實他的反共理論。抗戰後曾任政治部的廳長及第一戰區的政治部主任。

鄧文儀現任國防部新聞局長，蔣軍中的政訓機構現已改變名稱爲「新聞處」或「新聞室」，「新聞」兩字的意義就可想見。上面實說過鄧文儀曾幹過情報，這一部分工作被戴笠所併吞了。在這同時，鄧文儀還是藍衣社文化工作的支持者，有一個叫做「中國文化建設學會」的團體，辦了數十個刊物，每月時經費達三十萬元之多（是民國二十一、二年的事）。後因航空署長徐培根飛機場案件，蔣介石派鄧文儀與調查，徐培根拿了八萬元鈔票出來，對鄧文儀說：「飛機場的失火事件確是我有意縱火的，我對你說實話，我挪用公款去做交易所，本想賺一些錢，不料一次次蝕本，累積到兩三百萬元，無法彌補，所以只好放火，把挪用的款子作汽油，飛機機件，機場設施等報銷。這假報銷的錢除還在交易所和我用去外，只剩下道八萬元。現在只有兩條路：一條是你收這八萬元代我彌補過去；另一條則是你不收這八萬元，我就一槍先打死你，然後開槍自殺。你如證實報告，我就有性命危險，同是一死，不如請你陪我一陪，做鬼也熱鬧些。」鄧文儀經徐培根一要流氓手段，嚇慌了，就把八萬元收進了，事後報告蔣介石，說：「飛機場因汽油太多，儲藏不密，天熱蒸發而起火。」田另外有人報告蔣介石，徐培根撤職後，在南昌關了一年左右，而鄧文儀也一度失寵，不僅原來已預定的南昌市長沒有到手，每月二十萬元的文化事業經費也取消了，「文化建設學會」就爲CC所主持的「文化建設協會」所代替。（文化建設協會的實際主持者爲後來投敵任汪記中央大學副校長的樊逆仲雲，主要的「理論家」爲托匪葉青，葉青在CC系統下雖十分賣力，但並不得意，抗戰前後轉入藍衣社後始被胡宗南優待，國民黨六全大會時以反共有功被提拔爲中委。（直到日本投降前後，鄧文儀才逐漸取得重要地位。

暗殺專家

情報工作與行動分不開，主要有戴笠負責。戴笠（字雨農）在黃埔學生中班次較低，資望較淺，但實際則甚大。在抗戰之初，戴笠的階級是上校，但做的步下却有不少「少將」，還有「過他保券而做民政廳廳長的，當然他是最得蔣介石信任的。蔣介石對他所以特別信任，其原因之一也是爲了他浙江人。戴笠所

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爲國民黨特務的中心機關，其工作分爲下列幾方面：第一位的當然是對付革命黨派與革命民衆，其方法爲陰謀破壞與血腥鎮壓，從造謠中傷、挑撥離間、收買脅威、打入內線、做情報、分化破壞、到行刺暗殺以及勾引極少數叛類叛變，還有製造假團體、假冒進步、濫惡羣衆等，這是陰謀的一套；另一套則爲監視、綁架、非刑拷打、勞動集中營，以至活埋槍殺？這是鎮壓的一套。關於這方面，大家知道得很多，無庸細說。其次是對於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分子、知識份子，或反對國民黨的專制獨裁者，威脅歐打，強迫解職，綁架囚禁，以至於暗殺，如對楊杏佛、史量才、李公樸、聞一多、馬寅初、馬敘倫等。其次就是對付地方勢力，那些地方勢力與蔣介石沒有什麼分別，同樣代表地主買辦資產階級，但不願爲蔣介石所併吞，因此內部有矛盾。蔣特的方法，分爲：刺探內情，收買分化，造謠挑撥，配合軍事壓力，造成內鬨，而瓦解分裂之；必要時則加以毒害暗殺，如對浙江省主席魯滌平，及四川的劉湘。劉湘的死得不明不白，已成公開的祕密；魯滌平則一般人只知道他是中風而死，明白真相者甚少，需稍加敘述：國民二十四年蔣特別刺殺史量才於滬抗國道，蔣介石爲掩人耳目，令魯滌平應緝兇。魯滌平奉命後果真認真查緝，而這個暗殺案做得毫不機密，杭州、海寧一帶的人民都知道兇手坐的是杭州警官學校的汽車，主要備置這一暗殺案的是警官學校的教務主任趙龍文（警官學校的校長是蔣介石，校務主任即實際校長吳一萍）。這一來，蔣介石和戴笠都慌了，怕實蹟露世凱刺宋致仁的覆轍（民國二年袁世凱使代理國務總理內務總長趙秉鈞，總統府祕書洪述祖佈置暗殺國民黨領袖宋致仁於上海北火車站，事後爲掩人耳目，令江蘇都督程德全、民鈔局長唐德閔緝兇，程應將兇兇捉到，把趙秉鈞洪述祖等的往來電報和其他證據都抄查出來，加以公佈，使袁世凱非常狼狽，結果毒死趙秉鈞，洪述祖最後亦被正法）。於是先下手爲強，將魯滌平毒死。魯滌平的猝死，他的如夫人曾看出疑點來，於是第二天她也死了，說是「殉夫」。其次就是監視肅清異黨嫌疑，如前面所說連錦齋立爐賭錢的故事，就是一個例子。如果那一個自己想自己形成一套勢力，蔣代替蔣介石做了比較重要的機密工作，那就要遭殺身之禍，誰者如楊永泰之死，後者如唐紹儀的慘遭槍死。抗戰以後，蔣介石爲刺探日寇的「和平」條件，叫唐紹儀在上海與土匪原往來，土匪

軍唐紹儀「出山做總統」，談好了許多方面可以「自主」的條件，後來又與北平去勸吳佩孚，吳佩孚做「副總統」，吳佩孚也敷衍他：「如唐少川上台，我也可收盧。」士麗層回東京覆命，說「唐吳均肯出山」，日本政府就命令士麗原來導「導演」趙鶴儂做，而唐紹儀以刺探日本態度的目的已達到，向蔣介石報告了，任務已完，拒絕與士麗見面，士麗原無法交代，就逼趙鶴儂中半與藍衣社合作刺唐，而蔣介石正要殺唐以滅口，於是把七十萬歲的唐紹儀用利斧劈死。唐死後，蔣介石政府下了一道褒獎令，但刺唐的兇犯被上海法租界捕房逮捕了，因為是「中國政府機關人員」，以「驅逐出境」送到寧波完事。爲了這件事，法租界捕房的督察長曹某也被藍衣社暗殺了。最後則爲國際情報，除派遣大批特務出外做「見習領事」與「領事」(從民國二十六年開始)之外，沒有什麼特殊樂意。

以戴笠爲首的藍衣社特務系統，除軍統局與中美合作所兩個(實際是一個)公開特務機關外，還有幾個重要部門：第一是警察，從杭州警察學校開始，逐漸遍及各大都市，這一方面以曾任內政部次長、警務署長的唐縱爲第一號狗頭，戴笠死後，即由唐縱負責。第二是武裝部隊，抗戰時期爲「忠義救國軍」，日寇投降後大部分改編爲「交通警察總隊」；這一部分原來是抗戰開始時戴笠與杜月笙合作搞起來的，絕大部分爲地痞流氓，抗日毫無用處，殃民則有餘，因此聲名狼藉，爲了與顧祝同的部隊矛盾重重，互相攻訐，蔣介石曾一度要取消它，戴笠發急了，就求救於胡宗南，由胡宗南推荐馬志超當「總指揮」，才算保留下來。(抗戰時期還有一個「交通監察處」，旅客往來，特別是買飛機票，一定要經它批准，但實際上即由軍統局兼辦，不過有一個公開名義而已。)第三是聯絡參謀與情報參謀，上自軍委會軍令部，下至各級參謀處，大部分是軍統局可以直接指揮的特務。第四是憲兵，所謂「中央」嫡系的憲兵團幾乎全是特務，不過其中有一部分則和戴笠系統有矛盾(因爭權奪利)，不能完全指揮如意。

以「劍共義勇隊」馮家的康澤，資格雖高於戴笠，但他極端死硬頑固，而且專信任他的四川同鄉(最相信是同縣而又是中學小學時同學的)，只要是同鄉同學，不論是怎樣飯桶，都得到重用。抗戰以後就担任「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處長，三青團是他的勢力範圍。雖然其他部門也滲雜一些康澤系統的人，因

為大部分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蠢才，所以作用並不大。由於廉潔一貫是最堅決反共反人民，所以始終得釋重任。

「國際情報」

戴笠所主持的情報工作，從封建專制力的內部來說，是比較強的，他供給了很多材料！地方反對派的，其他派系的，一直到嫡系幹部的言論行動，蔣介石都能相當了解，比CC的中統局要強得多！但對於外國的材料，特別是對於日本方面的情報，則非常貧乏，他雖然派了一些人與日本法西斯勾勾搭搭，也沒有搞到什麼有價值的東西。抗戰開始以後，蔣介石亟於要明瞭日本的真意向；以便決定或戰、或降、或拖，軍事戴笠沒有用，於是叫政學系的王芄生（抗戰開始時註日大使館參事）在最高國防委員會之下設立一個情報機關，叫做調查委員會，因為是最高國防委員會的，所以王芄生就叫做「最高調查委員會」（其公開的業務機關叫「軍事委員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既然是「最高」，他就要統轄軍統局與中統局，當然藍衣社與CC決不肯賣賬，叫一政政學系與藍衣社及CC鬥法爭權奪利的糾紛，也就不了了之，依然各幹各事。王芄生的「最高調查委員會」就專做國際情報，尤其是以攝日本的材料為主，因為王芄生本人是「日本通」，政學系又是專作對日交涉的親日派，有很多故交親朋在日寇方面做事，他再派一些人去，所以的確有搞到一些材料，會得過蔣介石的誇獎。這一件事實戴笠很不滿，他跑到香港去，召集他的部下訓話：「一定要把日本方面的情報搞好，可以多化錢，多派人，無論如何，不能讓王芄生佔先。」

戴笠派了一些人到上海去加強對日情報工作，其中有一個是他第三個小老婆的弟兄，毫無能力，是因裙帶關係而錄用的；上海區負責的人因為他是「老闆」（軍統局人對戴笠的稱呼）的小舅子，就派他管檔案文件（包括秘密單據），戴笠對軍統局的職員，待遇很苛刻，主要靠在外敲詐勒索，而內勤則掛名沒外勤的獎金津貼或勒索報效；而上海是淪陷區，敲詐較難，那個小舅子當然毫無生財門徑，一個月拿八十元薪水，不能享受上海的繁華（那時物價雖僅較戰前高一倍，八十元只夠吃飯零用，看戲看電影也勉強，更

說不上跳舞嫖賭)，很不痛快。恰巧那時由陳立夫派出常漢姪的李士羣，在滬西極司非而路七十六號主持「特工總部」，設法我上了這個寶貝，每月給他二千元，「二千元」是「八十元」的二十五倍，超過兩年，於是戴笠的小舅子，就把藍衣社的文件毫無遺漏地每種都偷出給李士羣，連每月領津貼的人員名單，真名假名，統統給了李士羣，結果是藍衣社在上海的人員，一網打盡，連上海區的主任陳恭澍也投敵當了漢奸了。(藍衣社投敵的早有王天水和忠義救國軍副指揮何某等。)

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歐洲的局勢扭轉了，戴笠的工作樹頭撇了陳公博(僞上海市經濟局長徐逆天深就原戴笠系統)、周佛海、丁默邨、僞社會部長，後任僞浙江省長，原爲G. G. 特務)的掩護，才重要建立起淪陷區的聯繫來。周逆佛海的所以拚命爭奪上海僞市長一職(汪逆死後陳道公博代理僞主席，所遺僞市長一職，引起羣魏逐鹿，那時周逆大有甯可不做僞財長，非做僞市長不可之概)，就是執行戴笠的指示，周逆到任後，曾致電戴笠，請求「蔣主席加委」，戴笠答應他「何時反正，何時即加委。」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周逆的「別動總隊指揮」名義就是戴笠委他的。後來周逆與丁逆默邨、羅逆君強等解送重慶，實際是戴笠讓送去的。

戴笠二三事

戴笠系統以軍統局爲主，又是中美合作所，又是忠義救國軍，又有警察，又有憲兵，「棍」漢奸，封房子都是他做，所以日寇投降後在淪陷區大發「劫收財」。戴笠到上海後，曾召集他的部下在杜美路七十號(杜月笙的新宅，這好即抗戰爆發，自己沒有住過，那時中美合作所即設在該處)訓話，門口停了四百多輛汽車，塞滿了幾條馬路，可見「發財」的廣度與深度。戴笠自己也覺得有說說不過去，所以說：「我給諸位的錢，央不夠坐汽車(實際上連吃飽飯也勉強)，但諸位都有汽車坐，可見別人所做不到的事(指廉潔奉公)，我們也不能做到。」

戴笠是蔣介石所最信任的人，但蔣介石發起神氣來，就揮拳捶他，「面隨一面罵」你是混蛋，你這混

政學系

「戴笠能恭敬他站好了讓蔣打；回去後就如法泡製他的部下，他被打了十拳，回去就打他部下四十拳，五十拳。當他打部下的時候，旁邊的人就互相交換着目光，好像說：『今天老闆又受了老頭子的氣了。』戴笠這纔真死，蔣介石曾大哭過幾場，對他的作用實在太大了，沒有人能真正代替他。」

政學系是蔣黨中的大派系，在行政及地方政壇中佔着極大勢力，當蔣介石與日寇勾搭時期（從「九一八」到「七七」，以及抗戰初期），政學系是執行「親日外交」的主角，除汪精衛一派（郭泰祺、唐有壬、高宗武等）外，幾乎全由政學系包辦，如黃郛、張羣、陳儀、殷同、陶尚銘、蔣作賓、許世英等。抗戰初期，地方要官中政學系佔三分之一，如江西的熊式輝、福建的陳儀、貴州的吳鼎昌、四川的張羣、廣東的吳鐵城，浙江的黃紹竑、上海的俞鴻鈞、青島的沈鴻烈，其他各省主席雖非政學系，而民政、財政、建設三廳長及其他會府委員與各行政督察專員（簡任職）中，政學系的人經常佔半數或半數以上。在行政院中，抗戰前後則有張羣長外交（行政院副院長），吳鼎昌長實業，張嘉璈長鐵道、交通，翁文灝的秘書長（吳鼎昌外放黔省主席，翁繼任濟部長），徐堪的糧食，後來俞鴻鈞又代孔祥熙長財政，而何應欽則是準政學系，所有重要大部，幾乎為政學系所盤踞。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蔣政權依賴美國，政學系也插足於對美外交。日寇投降，台灣與東北重歸版圖，這兩處都有重工業基礎的，在經濟主外交上都關係重大，又是熊式輝當東北行轅主任，陳儀當台灣行政長官。

政學系並無組織形式，是一羣政客和熱中於「學而優則仕」的「學者」，爲了互相援引、互相包庇、攫取權位的集團，他們一般具有辦事才幹（當然也有極庸碌的，如吳鐵城、韓楚毅之類），比藍衣社和CC高明，刮起地皮來，也巧妙得多；他們沒有一定的主張，總是看風使舵，順着大勢走，難得勢，就帶誰說話，帶誰做事（這當然是專指地主資產階級統治者內部勢力的消長而說），目的祇有一個：取得權位，保持權位。它可以爲統治頭子做許多喪天害理的事，但一看此話不道，馬上又會裝作『正人君子』，

是「幾不個人」，這樣，就不至於走上了絕路。正因爲如此，所以政學系能夠團結一羣不屬於其他派系的老政客與新政者（如過去的翁文灝、胡適等，後來的王雲五等），以及吸收原來所屬派系已失勢或沒落的人們（如原屬汪兆銘的玉世杰、郭泰祺）。政學系沒有形式的組織，對每一個成員除升官發財的利害關係外，也沒有一定的約束，可以隨時隨地隨人而離去，以達到技術取得最大權利，避免吃大虧的目的。

政學系的前身是同盟會的右派，黃興所領導的「歐事討論會」，最早的領袖是慈禧太后的寵臣岑春煊（八國聯軍之役，慈禧太后率光緒帝逃西安，逃出北京時，狼狽不堪，岑春煊率了兩營兵趕到「保護」，因此連年升擢，做到總督）。大家都知道，辛亥革命之前的同盟會是三個人大部分聯合而成的：第一是孫中山領導的興中會，以華僑及廣東的會黨（三合會）和一部分知識分子爲主幹；第二是黃興、宋教仁領導的會黨（哥老會），新軍及知識分子；第三是章太炎爲首的光復會，主要爲江、浙的知識分子。辛亥革命以後，章太炎一派叫出「革命軍興，革命黨消」的口號，首先脫離同盟會而獨立統一篇，不久即與袁世凱爲首的北洋軍閥及君主立憲派梁啟超，張謇等合作而合併爲共和黨，這是同盟會中的極右翼。黃興、宋教仁等幻想在中國實現議會政治，以爲取得了議會中的多數，就能使封建軍閥就範，因此民國初年由宋教仁擴同盟會改組爲國民黨，大收黨員，在第一次國會選舉中獲得了壓倒的多數，宋教仁以爲國務總理非他莫屬（他是國會多數黨的領袖），挾着「大政方針」到北京去，在上海火車站就被袁世凱刺死了。接着蘇、皖、湘、粵國民黨四都督（李烈鈞、柏文蔚、譚延闓、胡漢民）及南京留守黃興宣佈獨立，起兵討袁失敗，國會也被解散，這就是所謂「二次革命」（民國二年）。以後孫中山改組中華革命黨，黃興始終沒有參加，民國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當時國內發生參戰與中立，助英與助德的爭執，黃興即組織「歐事討論會」，並把岑春煊（廣西的大官僚大實業家，在粵、桂、滇、黔等省有勢力）拉進去以增厚力量，實際上就是與孫中山的中華革命黨分庭抗禮。民國五年袁世凱死後，國會恢復，原來國民黨議員就分爲三派：中華革命黨系統的叫做「丙辰俱樂部」（民國戊辰丙辰），其主要人物有林森、楊輔成、田桐、白逾桓等；「歐事討論會」一派的叫做「政學會」，其主要人物有孫瀚、孫洪伊、楊永泰等，即魏邦平春煊爲首領；

另外一派擁護段祺瑞的叫做「益友社」，趙澤運錢爲總統的豬仔請長英其源，亦其中的一員。民國六年督軍顧道潛擊元洪解散國會，張勳入北京擁護復辟。段祺瑞討平張勳之後，用研究系梁啓超、湯化龍之策，宣佈「法統中斷」，驅逐舊國會已失時效；另行召集「臨時參議會」，另辦一新國會「選舉」，於是西南成立護法政府，孫中山因處處受事，桂軍閻（莫榮新、陸榮廷等）的阻遏，離開廣東。岑春煊即成爲護法政府七總裁的領袖，護法國會中政學會議員最爲活躍，此爲「政學系」名稱所由來。

從「護法預會」之後，政學會議員即各奔前程，有的分散依附各派軍閥，有的從事社會事業。北伐以後，政學系人物首先在蔣介石集團獲得重要地位的爲黃郛與張羣。黃郛與蔣爲浙江同鄉，辛亥革命時任滬軍都督陳其美的參謀長，爲蔣介石的上司，北洋軍閥時代曾因馮玉祥的推薦一度任外交總長，民國十六年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府，以黃郛爲第一任上海市長，做帝國主義與蔣介石之間的牽線人，「九一八」後成爲親日外交家的領袖。張羣與蔣介石爲日本士官同學，辛亥革命時又同在陳其美部下任團長，與蔣私交頗篤，北伐以後任第一任軍政部常務次長（部長爲馮玉祥），其後繼桂系張廷幹之後任上海第三任市長，民國十九年蔣與馮國璋爭時，雙方均派代表出關拉攏張學良，張羣爲蔣的代表，以吳鐵城爲副，蕭同茲等爲隨員，這些都是標榜的好手，與東北官僚蔣傾儀得很融洽，再加上張羣的手腕高明，張學良入關助蔣，馮國璋失敗，爲蔣立下大功。以後歷任外交部長，行政院副院長，抗戰後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爲蔣介石四大親信之一（其餘三人爲孔祥熙、陳誠、胡宗南）。其他政學系人的發跡重用，大都出於張羣推薦。

民國二十一年淞滬戰役（一二八）後，蔣、汪同時登台，那時看到張羣的一切呈報都條理清楚，問題是誰起草的，張羣以楊永泰對，蔣就把楊永泰要了去。那時蔣正以全力「剿共」，即任楊永泰爲「五省剿匪總司令部秘書長」，楊永泰把各方來文，摘要分列，寥寥數百字，要義包羅無遺，所擬辦法，也極切當。蔣介石過去的秘書長，如邵力子、陳布雷，都只會做文章，不善處理問題，得楊永泰後，省力不少，備之如左右手，不僅靠他處理文件，還和他商量問題。楊永泰建議推行保甲制度，在五省創設行政督察專員，直接由總司令部派出，蔣均執行，於是楊永泰推荐同系的官僚担任湘、鄂、贛、皖、豫各省行政，真

以後又推行到其他省份去。楊既得蔣信任，即開始擅權；凡各省政府改組，如名單中沒有幾個政學系人物並担任主要廳長，就很難得到蔣的批准，他必從中破壞。那時蔣長駐南昌或廬山，遙制南京政務，凡國民黨黨人赴贛與蔣商議要事，如所談問題與楊的主張不合，或該事不利於楊的向系，則楊必從中阻撓，其方法爲：當談到將入正題時，楊即入室報告「有重要軍報須處理」，以打斷其談話；第二日再來時，因昨日尚未談出輪廓，蔣毫無印象，故須從頭再談，到將說及正題，楊又如法泡製。到第三日，則那一位要人就不敢再提了，因再提又要從頭講起，會引起蔣的討厭，不可能得到解決的，反不如識相些免得碰釘子。只有汪精衛與蔣談話，則楊永泰從不搗蛋，因爲他和汪精衛的主張是一致的。

由於楊永泰的辦事能力（反革命的辦法多），蔣介石才進一步重用政學系。民國二十四年冬蔣任行政院長後，除張羣長外交外，以吳鼎昌長實業，張公權長鐵道，翁文灝爲總督長，蔣延黻爲政務處長。同時也因爲楊永泰的擅權太露骨了，國民黨其他派系都不滿他，蔣也感到楊有暗施排擠的形迹，這是蔣介石萬萬不能容忍的，於是楊永泰就在湖北省政府主席任內被蔣蔭衣社所暗殺。（事後蔣黨製造偽證，說是西南的劉廬歷指使人暗殺的。劉廬歷是胡漢民的親信，國民黨推選他爲中央宣傳部長，那時從香港到上海，擬到南京去開會，在上海租界上發報架，劉被特務拉上汽車後，大叫「綁架」，爲租界巡捕截下去，蔣黨派滬警備司令部說他是「暗殺犯，奉軍委會令逮捕」，把劉再引渡去。）

政學系之所以得勢，除由於黨觀風雲氣色，會投機，能辦事，比國民黨其他派系的人材較多等條件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它有一個強有力的輿論武器——大公報。下面就談一談大公報。

關於大公報

政學會時代原來有一個機關報，叫做「中華新報」，在上海出版時，主筆就是張季鸞（名耀章，陝西人），那時毫無出色之處，後來吳鼎昌盤下了天津大公報，與張季鸞、胡政之（名霖，四川人）三人合作，吳任社長，張任總編輯，胡任總經理，因爲吳鼎昌是華北財閥的領袖——鹽業銀行總經理，中南、大陸

、金城、鹽業兩行準備會及兩行儲蓄會的主任，消息靈通，對統治階級敢作批評，逐漸引起讀者注意。蔣介石的統治在華北不很鞏固，地方實力派（桂系、馮、閻以及張學良）與蔣之間多少有幾矛盾，而天津又有租界，所以蔣介石的鞏固統治，比較南方為鬆，而大公報即利用這個條件，不時對國民黨政府作些批評。那時候，大公報却也曾說過真話，如它曾批評蔣介石「好話為先生說盡，壞事為先生做盡」，這兩句話不失為蔣介石一生定評。「九一八」後，國民黨報紙的威信掃地，蔣介石採納了張學良、楊永泰的建議，採取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運用民間的有力量報紙，對政府「小罵大幫忙」，於是就對大公報「特加青睞」，另眼相看。民國二十一年吳鼎昌到上海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但不包括「剿共」在內，其作用即在團結一切反動力量，以反對人民反對共產黨，鞏固蔣介石汪精衛的統治，所以得到國民黨各種御用團體的響應。這也是大公報與蔣介石合作的第一聲。民國二十三年蔣介石在南京勵志社大宴羣僚，各院部會長以及到者數百人，首席的主客却是大公報主筆張季鸞，蔣介石對他推崇備至，與席者大有「韓信拜將，一驚」之概。從此張季鸞就成為蔣介石的顧問，可以不待通報，直接跑進去見他。大公報即利用這個機會，在評論中或新聞中透露一些蔣黨新聞檢查所不許發表的消息，新聞檢查所如要檢扣，張季鸞打一電話去說：「這是委員長說的，由我對委員長負責。」新聞檢查所的奴才們決不敢去問委員長，只好通過。大公報對蔣介石的幫忙是無微不至的，但它的的方式很巧妙：平時對蔣政府常加批評，好像它真是「大公」一樣，但仔細分析起來，它決不批評蔣政府的基本政策，更從不批評蔣介石本人，只講些枝節問題和蔣下面的二三等或四五等角色。其作用即在麻痺讀者：基本政策方針是「對」的，只是若干具體辦法錯了；蔣介石是「好」的，只是部分的官吏不好，這是所謂「小罵」。至於「大幫忙」的手法則更為高明：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時，國民黨所有報紙都大罵張學良楊虎城，人家一看就說是一面之詞，大公報並不如此說，它開始大誇獎百耀廟的勝利與百耀廟勝利的艱難與偉大，還首先造成一個「政府已在抗戰」的印象，其次略說「說西安事變是一個不幸事件，最後則提出是非曲直，大家應聽一聽綏遠抗戰將士的意見與主張，它並沒有正屈詞白提出誰是誰非的話，而要大家聽傳作義的話，又在傳作義頭上戴一頂「抗日將士」的大帽子。

文章還都做法，對張學良楊虎城的打擊，比國民黨報紙的一味譏罵者要毒辣萬倍；對南京政權的幫助也十
分有力。這就是大公報一貫使用的手法，表面上使讀者覺得它頗為公正，並不偏袒蔣政府，實際上則偏袒
得最有力，最有效果。有時大公報對於國民黨的政策也作某幾批評，說那樣不行，會失敗；但其作用則在
搗醒國民黨，要國民黨理明，提防吃虧，基本上仍是幫助國民黨說話的。

大公報對國民黨的幫助這樣大，所以成爲蔣介石每天唯一閱看的報紙，而許多國民黨要人不論是那
一派的，也都注意大公報。政學系就利用這一點取得了若干政治上的便宜，當某一問題或某一重要職務的
人選尚未決定的時候，大公報就先進行輿論準備，使政學系獲得優勢或有利的條件。如民國二十二年吳鐵城
調廣東省主席，所遺上海市長一職，各派逐鹿，在人選難以確定時，以秘書長俞鴻鈞代理，以後大公報即
傳出「俞鴻鈞將真除」的消息，俞鴻鈞的資望是不足担任上海市長的（以能力講，他當然比吳鐵城強得多
），但競爭的各派，如自己不能到手，也不願競爭的對手得到，政學系就利用這點拖延決定繼任人選。最
後一次，蔣已同意給錢大鈞，第二天的中政會就要提出通過，政學系知道了（那時張學兼中政會秘書長），
當晚通知大公報，就在報上登出一則「專電」，說「上海市長決定由俞鴻鈞真除」。中政會開會時，大
公報上海版的航空報已早到南京，大家紛紛猜測，「是否蔣的意見又變更呢？至少表示蔣還沒有最後決定吧
！」於是反對錢大鈞的增加了勇氣，結果錢大鈞的市長就沒有到手，下一次，俞鴻鈞就真的成爲正式市長
了。這僅是一個例子。

大公報並不直接拿國民黨的津貼，但比接受津貼的報紙要多得實惠數百倍以至千倍。如日本投降之前
，重慶的美匯市價要三千元將幣換美金一元，大公報從財政部獲得外匯二十萬美元，是照最低的官價二十
元將幣換美金一元計算的，就是以四百萬元換到價值六萬萬元的外匯，其所得超過一千個職員全年的薪金
，比大公報全年的開支要大幾倍，那裏有這樣大的津貼！又如抗戰剛開始時，大公報向海外買進一大批紙
，運到了香港，價值近十萬元。那時俞鴻鈞真除市長不久，胡政之去對俞鴻鈞說：「紙已到香港，報館一
時無錢，請市長打一電報給廣東吳主席請代墊一下，並把紙代運到漢口。」俞鴻鈞當然立即照辦，不幾天

丁一筆大行情，而且那時專橫路運極極擁擠，花了大錢也不易運輸，大公孫不慌快運到，還叫別人出糞（糞紙錢和運費，當然由蕭鴻鈞彌補）。

政學系與其他派系的矛盾

政學系的許多要人，在抗戰之前還不是國民黨員，如吳鼎昌、譚公權、翁文灝等都是抗戰中期才加入國民黨的，但在政治上却佔重要地位，得到蔣的親信，因此引起國民黨內部的不滿，不斷發生磨擦。甚至有許多黨棍，屢次提出「政學系篡黨」的說法出來，並利用政學系包辦對日交涉（屈服投降），把親日妥協的責任統統加到政學系頭上去。但無論怎樣叫囂，蔣介石對政學系的信任，倚重並不改變，政學系的勢力沒有縮小而且相當擴大。政學系與藍衣社的磨擦較少，因藍衣社的勢力在行政方面的發展還小，沒有較大的利害衝突，只是在下面宣傳政學系對外屈服妥協的責任，目的是為了減輕蔣的責任，提高蔣的威信，至於藍衣社的上層分子則大家都明白，政學系是蔣辦事的，一切都是蔣的主張。宋孔與政學系則因財權的爭奪，矛盾較多，容下面再述。與政學系矛盾最烈的為CC，因CC的囂鬧多，單在黨務方面活動，油水不多，要向行政方面發展，於是就易於短兵相接，時常發生為了爭奪位置而互相傾軋，互相攻訐的糾紛。下面舉一個例子：

民國二十二年江蘇省政府改組，陳果夫代顧祝同為主席，省府委員及各廳處長名單擬定後電告南昌蔣介石，請求批准（形式上只要行政院通過即任命，實際上則要蔣介石決定了，再在行政院會議辦一手續，然後由行政院呈請國府任命），兩次去電均不答覆，陳果夫知道其中必有緣故，就去一電呈，說：「如有更適當擔任者，請鈞座直接指定。」蔣介石回電了，對周佛海連任教育廳長，趙棣華任財政廳長，葉芳舉任建設廳長，項政莊任保安處長均同意，原定的民政廳長程天放改為秘書長，民政廳長則要陳果夫在辜仁發、唐青兩人之間擇一揭請任命。唐、辜兩人都是「剿匪省分」的行政督察專員，陳果夫知道是楊永泰搗鬼，一打聽，知道唐青是江蘇人，老練圓滑，不易應付；辜仁發是山西人，比較蠢拙，於是決定選擇辜

仁發，提請任命爲江蘇省民政廳長，江蘇省政府收編成功了。政學系獲得了一個民政廳長，但委員會中絕大多數爲CC，凡是辜仁發提出案子，省府會議均不予通過，而陳果夫要民政廳的事情，辜仁發也置之不理，還這樣持了幾個月，便宜了一些本來應該換掉的縣長公安局長，他們雖失去聲山，準備下台，却多做了幾個月，多刮一些地皮。最後陳果夫打聽到辜仁發在山西原籍有一個老婆，又在外面娶了一個，就派他的機要到山西去把辜仁發的元副喉着南下，與辜仁發吵鬧，辜仁發最初以爲鄉下女人來了，給她幾個錢，就可以打發回去的，不料背後有人操縱，除向法院控告辜仁發重婚罪外，還在南京大發傳單，把辜仁發罵得一錢不值。這件事鬧得很大，CC又動員各地有關的報紙加以渲染，弄得辜仁發不能下台，只好丟掉民政廳長不做。在這一糾紛中，CC打了一個勝仗。但程天放却因沒有做到民政廳長（陳果夫雖同時推薦程天放與余井塘兩人繼任民政廳長，但他却當面向汪精衛聲明，要程天放做祕書長，故行政院會議通過了余井塘繼任），一怒而離開陳果夫，後來竟傾向到政學系一面，兼政學系之力做了一任駐德大使。

孔宋財閥

宋子文和孔祥熙兩人是蔣介石統治集團的兩個「財神」，蔣介石通過他們搜刮民脂民膏，費國肥己，以維持獨裁專制的統治與進行反人民的內戰；而孔宋兩人及其手下一批壞蛋，更加倍加幾倍的搜刮，以飽私囊，這樣才成爲「財神」。孔宋兩家的所以能掌握蔣政權的財權，先後達二十年之久，大家都知道是裙帶關係；宋子文是蔣介石的大舅子，孔祥熙是他的襟兄，在敘述他們怎樣操縱財政金融與國民經濟之前，先略述其歷史。

宋子文原籍廣東海南文昌縣，他的父親在上海做牧師，生長在上海，以此因緣，他的大姊露露，二姊慶齡，妹美齡都他自己，都到美國去讀過書。宋子文是哈佛大學畢業的，回國後，曾在清華大學國語部當領所辦的漢冶萍公司董事，後來又和盛宣懷的兒子吳頌魯合設一個公司，經營鐵錳口貿易，他了才

跑到廣東去投奔其姊丈孫中山。民國十三年間做廣東省政府商務廳長。那仲愷被刺後，繼任財政廳長兼財政部長。因為盛宣懷是江蘇武進人（蘇州府），所以宋子文最初所引用的湯壽潛州人。民國十七年時，南京的財政部號稱「常州同鄉會」，能次長劉蔭桓科員，常州人幾乎佔一半以上。據說宋子文在上海的時候，盛宣懷的第七個女兒愛他身體魁梧，外國話講得流利，曾想嫁給他，後來因門戶不當（盛富貴而宋貧賤），沒有成功。招商局（中國最大的輪船公司）的大股東是李鴻章和盛宣懷。李、盛的子孫互相爭權，時起糾紛，李國杰（李鴻章之孫，清末襲封侯爵，民國廿八年春因通敵被暗殺於上海）的下台與被囚，與宋支持盛氏反攻有關（當然最主要的還是爲了打擊那時的交通都督陳銘福）。宋子文平常不大講中國話，更不大會寫中國字，閱讀公文也很吃力，一切都會慣於英語英文，凡是他的部下，用中文寫的報告或簽呈，就不知要擱多少時日才批下，如用英文寫，則很快就可批下，而且採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因此，宋子文的財政部雖是中國的行政機關，部內的公文很多是英文的或者是有英文副本的；而民國十八年以後宋子文所引用的，就側重於留美學生，特別得到宋子文青睞的則爲哈佛大學出身的留美學生（和他同學或先後同學）。這也是宋子文所以被美國資本家重視的原因之一，他是「英語集團」中的人物。

孔祥熙是山西太谷人，原來是山西的土財主，也到美國去鑽過金，回國後在北京農商部做事。孔祥熙是一個毫無能力的庸才，其昏庸糊塗，當出於一般想像之外，前面已舉一些事實，如保孫孫運仲爲「特級上將」之類，不再多說。他的所以能掌握財權，對國家主權與國民經濟的危殆，遠超過宋子文多倍，累積的財富也最多（孔家的財產超過蔣宋陳三家），這與他有一個貪狼惡辣的老婆宋霽齡有關。宋霽齡不顧百分之百的指揮孔祥熙，而且還能相當程度的操縱蔣介石。當孔祥熙任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的時候，他的部下（財部可長或銀行部經理級的）向他請示，需要馬上解決的，孔會說：「你等一等，讓我問了太太怎樣辦。」說罷，馬上打電話給宋霽齡請示，旁邊有客人或新聞記者，他也聽不顧忌。宋霽齡的奶媽有一個兒子，奶媽要求她「栽培」，宋霽齡開照孔祥熙安插在中央銀行，孔就派他當專員。這位奶媽的兒子既不識字，又不會算賬，目的只想當一個司務（大銀行的出店司務，收入比一般小職員爲高），一旦做了

「專員」，自己也怪不舒服。連人家講的話也聽不懂，當然沒有事情可做了，要求另派小一些的事，中央銀行業務局經理唐德懋也主張另派一個名義，但孔祥熙却說：「是大大關照的，怎麼好派小事情呢？」結果還是當專員，不過不要他到銀行辦事，每月把薪水寄到他家裏去。

說起宋霽齡的嗜本領很大，有人把宋氏三姊妹比爲龍虎狗：孫夫人宋慶齡女士道德高尚，思想進步，政治上的操守極純潔高貴，爲全世界民主進步人士所景仰，是「龍」；宋美齡習着蔣介石賣國媚外，禍國殃民，但有時對藍人社和CC也偶表不滿，則是「虎」；而宋霽齡則一貫的無惡不作，只要有利可圖，什麼壞事都做，是一隻「狗」。以才能講，則大宋最前幹，可是她的能幹專用在做惡事方面的。當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孫中山在日本組織中華革命黨，有一相當長的時期留在日本，宋霽齡當孫中山的秘書，那時她就秘密與袁世凱勾結，把孫中山等行動報告北洋軍閥。這件事被同盟會的一些老同志發覺了，但孫中山不相信，最後有人把真實證據找到，孫中山才不用她當秘書，她的位置不久即由宋慶齡擔任。宋霽齡以爲孫中山是會和她結婚的，平時即以「總統夫人」自命，後來孫中山與宋慶齡正式結婚了，她才死了這條心，嫁給孔祥熙。爲什麼宋霽齡會嫁給孔祥熙，一個條件是孔祥熙這個人無用，她可以完全支配他，而最主要的則是孔祥熙有錢。那時國民黨要人一般都貧窮，雖然辛亥革命後有許多人做大官，那時一種「革命黨人」還知道愛惜名譽，刮地皮不多，逃亡到日本後，很多人沒有比較漂亮的禮服，常是一套好衣服輪流穿着出去拜客赴宴會等，而其餘的人則在家裏「鏟草芽」（上海俗話，指沒有衣服不能出門者）孔祥熙家裏有十幾萬財產，就是富翁了。（孔祥熙現在的財產如折成抗戰以前的貨幣價格，當相等於五千萬萬圓一實萬萬，比他原有的財產增加了十萬倍。）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逝世，當蘇聯送的玻璃棺材沒有運到時，就是孔祥熙盤出五萬元買的銅棺材收殮的。那時孔祥熙能拿出五萬元來，在國民黨中是一件頗人注意的大事。（雖然孫科在廣州市長任內已刮了一百多萬，但孫科是著名政客，一毛不拔的。）

民國十五年武漢政府時代，孔祥熙曾做過實業部長（時期很短，實業都是四月中央與農民、勞工、司法、郵部同時裁立的，武漢政府到七月就垮台），民國十七年以後，在南京政府的工商部長，後改實業部，民

二十一年蔣汪合作，實業部要讓給蔣公博，孔出國考察，回國後辦顧法西斯，到民國二十二、三年間，宋子文把所兼的中央銀行總裁讓給孔祥熙，不久因蔣宋不睦，宋辭職，孔祥熙與宋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並曾一度任行政院院長，直到一九四四年才下台，做財政部長歷時十年，可見蔣對孔信任之專。

在孔宋兩人之間，蔣介石特別信賴孔祥熙，其原因有二：一、宋子文比較有魄力，一部分資產階級，特別是買辦資產階級對他的信仰，英美帝國主義也看重他，這是蔣介石所嫉忌的；孔祥熙則什麼人也不信他，重親信，大家都要識他是一個「套人」，所以蔣介石對他完全不要担什麼心。二、宋子文有些資本主義的作風，要講究手續，蔣介石向財政部取錢，他要問作什麼用的。蔣介石因此很不高興；孔祥熙則完全不管這一套，你要用就取，決不問作什麼用，只要自己荷包裏裝滿了就好。孔祥熙做了十年財政部長，總是一本帳蓋帳，有許多機關領過多少錢，財政部是不知道的，孔經手取去的錢，究竟給了誰，財政部長本無人知道，也無賬可查；這種情形，真是古今中外所少有，而蔣介石却認為這樣的財政部長最好！

宋子文的理財財術

宋子文是國民黨的「理財大家」，蔣介石連年內戰，龐大的軍費和特務費用（包括收買分化地方勢力的鉅夫支出），主要依靠宋子文籌劃。北洋軍閥時代，能夠借到兩百萬元借款的就能做財政總長，袁世凱把鹽稅及關稅一部份（除支付庚子賠款本息之外的多餘部份）抵押給五國銀行團借到的善後大借款，不過二千五百萬元。而民國十六年到抗戰的十年間，國民黨發行的內國公債和庫券大小三十二種，最少的五百萬，最多的一萬萬元，五千萬元，合計達十萬萬元以上，借的外債則僅棉麥借款一項就是五千萬美元，合華幣一萬五千萬元左右。國民黨統治時期的開支比北洋軍閥統治要增多數十倍，而蔣宋孔陳四大家族更掠奪養佔入私囊的財富，比國民政府的支出還要多幾倍。上面所提到的盛宣懷，是清末最會搜刮的也是最富的官僚，滿清滅亡的時候，他的財產僅值六千萬兩，以那時的物價與匯率計算，合今天的美金一萬二千萬元，比起蔣宋孔陳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那末，宋子文怎樣搞到這許多錢的呢？當然主要是加稅和借債

爾頃（孔祥熙長財政的時期，除照宋子文時代的老辦法之外，又多了一項通貨膨脹）。問題是在半殖民地中的中國，不僅償債不容易，加稅也是阻力重重的，不要說北洋軍閥時代的一些「財政家」常有「可畏仰屋」之嘆，就是「九一八」後孫科做行政院長，羅超用花旗銀行買辦黃漢傑為財政部長，也終因財政無法應付而下台，讓位給汪精衛，仍由宋子文掌握財政。宋子文有什麼本領呢？他的辦法就是使有勢力反對的人反能因此獲利，於是阻力就變成助力，雖然多數人民因增加負擔而不滿，但他們沒有力量，不能起阻撓作用，而能夠反對的有勢力者，則不僅不反對，還轉而贊助他，當然就能夠推行順利了。

例如捲烟統稅，就最容易說明這個道理。捲烟抽稅，起源於江蘇省教育會派（黃炎培、袁希濤、沈恩孚為領袖）為求得教育經費獨立，而創辦的新稅。那時江問漁（恆源）做江蘇省教育廳長，嚴家熾做財政廳長，陳陶遺做省長，因為教育經費老是積欠幾個月，教職員時常吵鬧，省教育會派是帶有全國性的「學閥」，其勢力不限於江蘇省，也不僅在教育界，它建議開徵新稅，一則在「教育」的大帽子之下，商人不致反對，二則實際上減少了省財政的支出，三則省去許多麻煩，再有許多人事關係，所以得到了省當局的批准而舉辦。那時是一種消費稅，是向零售商店徵收的，最初估計只能抵省教育經費的一部份，後來舉辦的結果，逐年增加，大大超過了全年的教育經費支出。北伐以後，國民黨政府收回自辦，成為主要的收入之一。裁釐卡後，改為產銷稅，出廠即繳稅，以後行銷全國，不再抽稅，所以叫做「統稅」，為國家財政的三大主要收入之一（另兩種為關稅和鹽稅，而關稅和鹽稅的收入雖多，但都抵押給外國債權人，所餘不多，而統稅則為新稅，沒有抵押掉，所以財政部主要靠這個稅收抵充政費軍費。統稅除捲烟外，還有棉紗、麵粉、水泥等）。中國境內的捲烟廠，最大的就是英美烟公司（為英國資本家在華投資中最大的企業），其產額超過全部華商烟廠的總和，但英美烟公司却拒絕繳納統稅，理由是它的紙烟經過釐卡時本來不納釐金的，裁釐與否，和它沒有關係，它不能也不應該增加額外負擔。英美商人有領事裁判權為護身符，他不繳稅，拿他沒有辦法。宋子文上台後，去和英美商人交涉，結果同意繳稅了；而且把過去欠繳的也補繳了一部份。宋子文不僅在財政上「成功」了，在外交上也「成功」了（宋子文後來擔任國民黨中政會外交委

員會主席，是國民黨外交政策的指導者，是外交部長的上司。英美資產階級及其買辦都很「佩服梯維的才能」（宋子文的英文譯名為 T. S. GOUGH，故洋人和洋化的中國人都叫他做「梯維宋」），而特別表示接近或親密者則更只稱名而略去姓）。宋子文究竟有什麼本領呢？說起來很簡單：他把原來的五級稅制改為二級稅制。統稅是從量稅不是從價稅，是每五萬支烟（二天箱）抽若干錢稅的，紙烟的等級相差不多，價格上下，相差到二十倍以上，所以過去分爲五級，稅額多少不同，但同一級內最高與最低的已負担不公平，如三百元一箱的烟與四百元一箱的烟同樣抽稅四十四元二角五分（假定一般的稅率爲百分之二·五），前者的負担爲百分之四·七五，後者則僅爲百分之二·〇五，前者的負担比後者多百分之三強。宋子文又把它改分爲兩級，於是南洋兄弟公司所出的白金龍，華成公司的美麗牌，與英美烟公司的白錫包，大砲台，價格雖相差到二三倍，但每箱所繳的統稅却一樣；南洋公司的大聯珠，華成公司的金鳳，與英美烟公司的紅錫包（即大英牌）價格相差近一倍，金字塔的價格僅及紅錫包的三分之一，所繳的統稅數額却也一樣。彈擦的稅則，大大幫助了英美烟公司在商品市場競爭中壓倒一切華商煙廠，更便利於英美烟公司擴大市場，以至獨佔某些地區的（如華北）市場，當然他就不反對而會擁護了。拿南洋公司華成公司與其他小廠比較，則小廠出低級紙烟的負担更重；而小廠則無力反對。增加稅率的時候，也是如此，稅率愈高，對英美烟公司，愈有利，商人本應反對加稅的。在那樣原則下，大資本家，特別是洋商，不僅不加阻撓，而且首先照辦。「你看，外國商人都服從政府的法令，中國商人反漠視國家的困難，只圖私人的利益，未免太缺乏國家觀念，愛國心太薄弱了！」這個帽子多大，你還能不乖乖地照辦，「共濟時艱」嗎？「精紗稅也只得兩級：二十三支以下爲粗紗，是一種稅額，以上爲細紗，另一種稅額。中國紗廠所出的細紗，一般以卅二支爲限，日商和英商紗廠則有四十支到六十支的，價格相近倍，而稅則相等；日商英商的紗廠所出的粗紗，極少在二十支以下（市場上亦叫做「細紗」，稅則上的細紗，市場上叫做「綾」），而華商紗廠的粗紗，則有十支、八支的（綾毯子用），其價格相差則不止一倍，但繳納的稅金也完全相等。這種稅制，完全有利於外商企業，愈加稅外商愈有利，而對華商（尤其是小廠）則愈不利。這就

宋子文所以能夠加冕而不遇到大阻力的原因；也是英美資產階級及其買辦所以推崇宋子文的話本原因。

再說到借債，這也是件難事，中國的商人驕忌和官吏往來，給些小便宜與官吏，甚至給賄賂，以便取得更多的方便，而絕致厚利；但却不願管錢給官廳。因為政治局勢常有變遷，人事一有調動，就沒有人負責，如袁世凱籌備帝制時用去的中國、交通兩銀行的準備金，和「九六公債」之類，都未清償或整理。所以北洋政府時代能夠借到一二百萬的財政總長，已是了不起的大本領。爲什麼宋子文能發幾萬萬元鉅內的公債呢？他用了兩個辦法，一個是「維持債信」，一面定期還本，按期付息，一面又借新債；一個是「誘以厚利」。爲了說明宋子文發行公債的策略，我在此插入一段黃楚九起家的故事，這個故事雖與財政無關，但道理却相同的。

黃楚九是上海大世界遊藝場的老闆，他經營的事業除大世界之外，還有日夜銀行、日夜交易所，共計台、中法藥房、中西大藥房、九種製藥廠（出「百齡機」的）等等，是一個白手起家的企業家，上海人都知道這位「滑頭大老闆」，雖然他病死之後（約在二十年前）沒有幾天，日夜銀行被擄倒，而其他企業都相繼換了主人；但不能否認他是一國有本領的事業家，正如不能否認宋子文的「才能」一樣。黃楚九沒有錢，他的資本最初是怎樣的？後來又是怎樣累積起來的呢？他開始選擇了一個債主（據說是一個當舖），向他借二十元，約定三日後歸還，這個錢黃楚九並不用它，放在家裏等到第三天，就拿去歸還；第二次再去借五十元，約定五日，到第四天就去還掉了；這樣建立了信用起來，借的數目從一百元，五百元，一千元……增加上去，一直借到二萬元，黃楚九就用它積下了中法大藥房，製造艾羅補腦汁，債主因數目太大了，逼也沒有辦法，逼倒了他，本錢也不能全收回，更不更說利息，只好長期放給他生利。這是黃楚九起家的第一批資本。他從此陸續擴充他的事業範圍，一區在各事業中間用厚利吸收存款（除利息較銀行大半倍一倍外，還按月贈送出品，如香水、肥皂、補藥之類），發行禮券等辦法吸收資金，一面又創辦了一所日夜銀行，除利息比別家大半倍一倍，晚上也開門營業，隨時可以存付（那時法租界有公開賭場，這個夜間營業的銀行，大大便利了賭客）。因爲利息大，手續簡便，很多女傭也向日夜銀行存款。黃楚九就

靠了這些辦法吸收資金以擴展企業，而自已則過著享受頗為奢華的生活。（黃死後雖破產，但其家屬的生活仍相當富裕，掩匿而棄敵特的黃特——抗戰末期在秦縣出版『大道月刊』，後來又投入周佛海部下的——就是黃楚九的孫子。）

宋子文孔祥熙的發公債辦法，就是和黃楚九的取得資本同一作法。宋子文組織了一個叫做「內國公債準備委員會」，辦理還本付息事宜，把上海的金融業領袖都網羅進去當委員，每月應還本息，先由財政部令國庫（中央銀行）如數撥足，還多撥一些，以建立「債信」；而他的中央銀行的理監事，則大部分任用上海銀錢業的領袖，中國、交通兩銀行的「官股董等」也是如此，如錢新之、徐新六、李馥蓀、陳光甫、胡孟嘉、胡筆江、蔡扶霄、秦潤卿等，都拉在官家的金融機關中兼上一個差使，他們有了發言地位，對債權就多了一層保障。這是一方面。另一更重要的因素，則為利息特別厚。國民黨發的公債，年息多的是八厘，少的是七厘，比市場的利率為低；從條例上看，公債發行的折扣從九五折到九八折，照九五折合算，年息八厘的也只合到年息八厘四，和銀行的存息差不多，不僅無利，而且還要倒貼開銷。這是表面上的計算，實際則利息大得很。國民黨發行的公債，幾乎都是先以四五折或五折抵押給銀行和大錢莊，然後上市（證券交易所），再四市價結賬，所以銀錢業所繳的款子和財政部所實收的，最高是六折，低的則僅五折，平均約為五五折，因此利率就比表面增六一倍。還不僅如此，因為資本是實足的，所以實際的利率更大。假定某種公債，年息八厘，十年還清，市價是六折（以最高價格計算），某銀行購進一百萬元，則某年的利潤有如下表：

年度	本	金	持	有	公	收	入	收	入
			債	票	面	債	息	還	本
第一年	六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第二年	五四〇.〇〇〇		九〇〇.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五四〇.〇〇〇
第三年	四八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六四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〇

第四年	第五年	第六年	第七年	第八年	第九年	第十年
四二〇.〇〇〇	三六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	一八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〇	三〇〇.〇〇〇	二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	四八.〇〇〇	四〇.〇〇〇	三二.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	一六.〇〇〇	八.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收回成本

實

際

核

算

實際利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
一一二.〇〇〇	一〇四.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	八八.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	六四.〇〇〇
二〇.七%強	二一.六七%	二二.八五%	二四.四四%	二六.六六%	三〇.〇%	三五.五五%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二〇.〇%
四八.〇〇〇	五六.〇〇〇	六四.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	八八.〇〇〇	九六.〇〇〇
八〇.〇%	四六.六六%	三五.五五%	三〇.〇%	二六.六六%	二四.四四%	二二.八五%

照上表每年平均收回本金的計算，最初一年利率最小，還達二分，最後一年則高到八厘。如果求得每年的利率相等，開始少還本（如第一年作為收回本金四萬元計），則每年的平均利率在二分三厘以上。還

是一種高利貸。而國民黨以發行的公債（或庫券），年限有少於十年，折扣均低於六折的不少，其實際利率就比這還要大。在抗戰之前，一般銀行的存款利息，是年息八厘到一分（活期則僅四厘到六厘），放款則為一分二厘到一分六厘，很少超過一分八厘的，至於高利二分的，那只有銀根特別緊的日子，一年只有幾天（那是按日計算，合到這個年利率）。銀行的業務就是賺存款息與放款息的差額。現在試算一下，如果銀行吸收存款五百萬元，平均的存息為九厘，全年付出利息四十五萬元，放款同數，平均利率為一分四厘，全年收入利息七十萬元，收支相抵毛利二十五萬元，如該銀行一年的開支為十五萬元，則該行的純盈餘為十萬元。如果該行把這五百萬元買了公債，則一年的利息收入為一百十五萬元，付出存息四十五萬元，毛利為七十萬元，開支還可節省幾萬元（因為放款需要調查研究，以及監督稽核等工作，需要人力較多，而買公債則僅發張紙，鎖在保險箱裏，就安全無事，只要一兩個人注意證券市場動態即盡其職事），就是以開支相等計算，其純利為五十五萬元，較前者增加四十五萬元，為百分之五百五十。公債的利債高到這樣，自然金融家就不願意投資於生產事業了。中國經濟衰落，生產不發達，當然原因很多，國民黨政府把社會上的游資（本來可用於擴大再生產的）用公債吸收了絕大部分，以供內戰費用，以充實私囊，變成外國貨幣，使維持原來生產也感到資金不足，更談不上擴大再生產，無疑是主要原因之一。這就是宋子文的「才能」與「功績」！

銀錢業從公債中得到的好處還不僅是上述的高利一種，更可用作向中央、中國、交通等所謂「國家銀行」領用鈔票的準備金。照規定：銀行錢莊只要繳六成硬幣或金銀外匯，四成有價證券（以公債為主）即可領用十足的鈔票。如某銀行以五百萬元存款，其中三百六十萬元收購金銀或外匯（所謂硬貨），一百三十二萬元照五五折計購進公債二百四十萬元，即可向中、中、交、農等銀行領取鈔票六百萬元，還多八萬元在手另作用途。如果它再把這六百萬元如此利用，以四百三十萬元存儲硬貨，以一百六十萬六千元買進公債二百九十二萬元，即可領取鈔票七百三十萬元，連前還餘九萬四千元。如果再轉手一次，以五百四十萬元儲硬貨，以一百九十八萬元買公債三百六十萬元，就可以領用鈔票九百萬，這樣翻了三次手，五百

萬元的資金變爲了九百萬通貨可以週轉，而且它繳作準備的八百九十二萬元票面的公債，利息仍歸儲鈔銀行所有，因爲這批公債的主權並沒有轉移，以年息八厘計算，一年可收入八十萬零二千六百元（公債的還本，要抵價額用的鈔票，不能作爲收益）。如果它再把九百萬元投資於公債，一年可收入二百零七萬元，兩共二百八十七萬二千六百元，比作工商業放款的收入是四與一之比，如計算純利，則要相若二十幾倍。（以上的算法，是與與四大家族相勾結而有密切連系的行莊而言，如果不是「朝裏有人」，長袖善舞就不可能如此做，二則公債的抵作準備金不能照市面算，而要照市價，只要便宜到四成證券的利息，以五百萬元計，即二百萬元的利息十六萬元，不能愈滾愈多，二則領用的鈔票有詔號，發鈔銀行收回若干，馬上要面領鈔行莊兌現，如以五百萬元的資力而領了二千二百餘萬鈔票，非有極大舉由不能冒此危險。）這樣一來，金融業固然獲得了大利，而國民黨政府與宋孔財團更一舉而兩利：既發行了大量公債，又發出了大量鈔票。

發公債，對銀錢業有大利，所以銀錢業不怕公債多，而只怕公債少，不怕當局要它承銷公債，而只怕不叫它承銷。這是一方面，是宋子文的公債政策能夠收效的主要原因。但一到公債發得多，銀錢業雖雖公債發了大財，但它的資金大部分變了公債的時候，銀錢業領袖們與掌握財政大權者之間的關係就起了變化：過去是財政部長俟銀錢業領袖，不得到他們的幫忙，他信不到款；現在則銀錢業的命運操在財政部長手裏，只要公債的本息一動搖，銀錢業就有許多要破產，而不能不遷就財政部，依附於蔣宋孔陳四大家族。甚至國民黨政府公開預備，無條件延長運本期限（改爲統一公債），銀錢業還要帶它維持市價，原因是自己手裏太多，不能讓它跌價。

「法幣」與「外匯」

孔祥熙繼長財政之後，一般是「蕭規曹隨」，在政策方針上和宋子文沒有什麼差別，他的最大的「功績」就是實施「法幣政策」，把白銀收歸「國有」，從此奠定了濫發紙幣的基礎。民國二十四年英國財政

蔣顧問李滋羅斯到遼東來，目的是把日本和中國拉進英鎊集團，到中國活動了一個時期之後，就到日本去活動，結果是碰了釘子回到中國來，於是全力策勵「幣制改革」。那時中國的貨幣是銀本位。是世界上僅有的銀本位國家，國際收入的差額要用白銀計算，而銀價的漲落則由美國操縱，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產銀國，也只有美國政府能夠大量收買白銀（民主黨在美國叫做「銀黨」，怕銀價跌落了銀礦主受到損失，所以民主黨政府就以收贖白銀作美元基金以維持銀價）。銀價在國際市場上是時有漲跌的，銀價漲跌，中國貨幣的對外匯率就時有變動，這對於外國的買賣（一般從定貨、運輸到交貨，通常要經過幾個月時期），尤其是外國對華投資，要冒外匯漲落的危險。（中國銀元對英鎊的匯率，最低時為一先令二便士，即十七元四角二分三合一英鎊，第一次歐戰時最高達五先令，即四元合一英鎊，相：四倍以上。即以通常漲跌四分之一計算，如甲英商在銀元合英匯一先令六便士時投資中國三十萬鎊，合銀元四百萬元，到銀元漲到二先令時，則四百萬元合英鎊四十萬鎊，對投資者有利；如同時乙商運入英貨三十萬鎊，其成本合銀元四百萬元，則銀元漲到二先令時，成本合銀元只三百萬元，這對英貨推銷有利；如果在中國的商人以四百萬元購英貨三十萬鎊，運回時就只值三百萬元了，平空就蝕本一百萬元，這樣的生意就無人敢做。反過來，某英商在匯率二先令時投資中國三十萬鎊，合銀元三百萬元，到匯率一先令六便士時，三百萬元就只值二十二萬五千鎊了，蝕去了七萬五千鎊；如華商某：匯率二先令時借英商二十萬鎊，合二百萬元，到匯率一先令六便士時却要還本二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餘元，吃虧也很大；輸入貨物也同樣，成本購高，銷售就困難。所以匯率不固定，無論貿易或投資，都要負擔比價漲跌的風險。）如果中國的貨幣與某一外國的貨幣的比價固定了，則某國的對華貿易與對華投資就解除了匯率變動的危險，得到了發展的便利條件。所以李滋羅斯把中國拉進英鎊集團的幣制改革計劃，其目的在造成中國政治上對英國的更多依賴，而便利英國的對華經濟侵略。蔣政府的算盤上，自然也是利益很多：第一，得到英國的支持，便利了外國投資；貨物輸入，可多得買辦利潤（佣金）；第二，鈔票不要兌現，就不必再發公債，財政赤字可以印刷機與彌補；第三，白銀集中了，增加了四大家族壟斷居奇的資本。所以，「法幣政策」就很快決定實施了。

在「法幣」編度公佈的前一天，財政部發言人經過國民新聞社（財政、外交兩部的機關通訊社）發表了一個談話，聲明「外幣制改革之說，完全無稽」，報紙把這一消息用大字標題刊載的一天，當天晚上就宣佈白銀國有，鈔票不再兌現。蔣介石統治集團的善於說謊，還可以說是一個典型。

在實施幣制改革以前，全國性的發鈔銀行，除中央、中國、交通、中國農民四行外（這四銀行的鈔票就規定為「法幣」），最大的為中南銀行，其次為浙江興業，中國農工、農商、中國通商、中國實業、中國鹽業、四明等七家銀行（其地方性的發鈔銀行則很多）其中農工銀行為李石曾所辦，接近宋子文，農商銀行為實業部所控制，是官家銀行，以上兩家發鈔均不多；浙江興業發鈔甚多，實力雄厚，中南銀行發鈔雖多，但由中南、金城、鹽業、大陸四大銀行（所謂華北四行）合作，設有聯合準備庫，不易動搖併吞；因此孔宋財團在實施「法幣」制之前向通商、鹽業、四明、中國實業四行進攻，由中國、交通兩行集中了上述四行很多的鈔票，驕然去兌換現銀，造成「不投降即倒閉」的局勢，於是這四個銀行均加入半數以上的官股而完全改組，成為中、中、交的附屬機關。

幣制改革辦法宣佈後，外商銀行以匯豐銀行為首，立即表示擁護，將所存白銀移交。因為這一改革是英國策動的，是英國對華經濟政策的大勝利，所以英商首先擁護，它不是擁護國民黨政府的法令，而是擁護英帝國主義獲得了有利條件，而英商銀行則在外商中佔領袖地位，單匯豐銀行一家，它吸收中國的存款在十萬萬元以上，其餘所有外商銀行的總計，還抵不上它一半，英商照辦了，其他各國雖要抗拒也無能為力了。這又算是孔宋的「成功」。但在國內却不那樣順利，除東南及中部各省的白銀多數集中之外，華北各省發鈔雖為統一，白銀却被宋哲元、韓復榘截留，要留在當地作準備金，不准南運；兩廣則銀元是不用了，但鈔票還是以券券為主，直到民國二十五年陳濟棠失敗之後，肇南才通行「法幣」，白銀才大部到了蔣筠之手。山東的白銀三千餘萬兩，到民國二十七年韓復榘退出山東，運經河南時才截下來，平津黨派的白銀補為三萬萬盎司到四萬萬盎司，抗戰初期全部運到海外去，不到三年就用光了。

「法幣」既不兌現，當然就是「紙本位」了。他本來的價值就是一張紙；其唯一能獨立信用的就是可以換取一定數量的外國貨幣。那時的法定價格為每元值英鎊一先令二便士半，即十六元五角五分一厘七換一英鎊，與英鎊緊聚聯繫起來，所以也可以說是「英鎊本位」。隨著英鎊的伸縮而漲跌。雖然宣佈時同構列舉對英、法等國貨的比值（如每百元合美金三十元）。但這僅是形式的，因英美、英法之間的匯市有漲落，如果相差太大，就要以英鎊作標準。因為只有在兌換外幣時才能顯出它的價格（所代表的購買力），所以只要準備一部分外匯應付需要，此外就可以不要準備。宣佈幣制改革是在星期六的晚上，星期日晚上孔昭祥又要表一驚雷面談話，說明「準備依然很可靠」，他打電話叫中央社上海分社派記者去抄取。中央社因事情重要，特別由採訪主任陳萬里親自去取，到了中央銀行樓上財部駐滬辦事處，原稿沒有騰清，要當場抄，陳萬里抄的時候，中間跳了一行，原來是說：「法幣的準備四成以下為有價證券，六成以上為金、銀、外匯及其他準備」（大意），陳抄時漏了一行，變成「有價證券與其他準備」；中央社把這一談話廣播全國，並分送各報發表。第二天孔昭祥大發脾氣，要封閉中央社，中央社嚇得連忙更正道歉。因為他所說是假的，始派去一行之後反說穿了事情的真相，所以他認為是故意搗蛋。

這個幣制改革案在公佈之前是嚴守秘密的，公佈後始揭出立法院會議追認，當時立法委員中有不少人不同意，認為這樣有礙國民生的重大事件，不經過立法手續而貿然公佈實行，是一種違法行為；那時立法院財政委員馬寅初還是在蔣黨團立場上說話的（每次蔣政府決定一個經濟財政問題政策或措施，事前必由馬寅初發表一篇文章或談話，說某事應該如何如何，以作輿論準備；直到抗戰第三年，馬氏對蔣門大發戰爭時，而中庭階級以下瀕於死亡線上，實在忍耐不住了，才開始反對蔣黨的財政經濟政策），在立法院會議中說：「此舉經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會討論決定，有最高立法當局孫院長參加，並不是跳過立法機關。」（經濟委員會常委為蔣、汪、宋、孔、孫五人，時汪未參加。）上海某報有一個小品文，說：「大委員蔣大爺，小委員蔣小爺，此之謂五權分治！」

上頭說過，「法幣」是屬於英鎊集團的，美國當然不願意；而中國每年有鉅大的國際收支差額（貿易

上的入超除以匯票抵補外，不足之數尚相當大，何況還有一筆鉅大的資金逃竄，特別是四大家族的國外財產，必須售出白銀結幣平衡。世界上能夠大量吸進白銀的主顧又只有美國，因此中國的貨幣單和英鎊單擊還不能解決問題，滿足了倫敦的主子，還必須討好紐約華爾街的主子。民國二十五年由宋子文與美國談判出售白銀問題，確定了「法幣」對美元的匯率不受英美匯率影響的影響，又認了一個「洋爸爸」。民國二十六年抗戰開始，蔣政府聲明無限限制供給自由外匯，造成鉅大的資金逃遁。南京撤退以後，才採取申請與核准制度，外匯發生了黑市，但上海依然昂昂支出外匯的最大口岸，敵人從韓北、華中淪陷區搜到「法幣」到上海大量套購外匯。民國二十七年冬到二十八年上半年，英商匯豐銀行與中國、交通銀行總結了協定，中、交兩銀行出英鎊五百萬鎊，匯豐、麥加利兩銀行借給中國五百萬英鎊，由匯豐銀行掛牌維持上海黑市外匯，每元為八便士，八九個月之後，一千萬鎊的基金就用光了。匯市就從六便士、五便士、四便士、三便士……跌下去，到三十年冬，已不足三便士。在這一過程中，單是麥加利銀行就賺了四百萬鎊，匯豐銀行當然更多，而宋鶴齡一個人，據說就撈進了八百萬鎊。這一筆賬應該怎樣算呢？中國貼去五百萬鎊外匯基金，又欠了五百萬鎊債，損失一千萬鎊，而英商銀行則拿出了五百萬鎊，賺進了八百萬鎊到一千萬鎊，還有五百萬鎊債權在手，遲早要收回本利。但英國那時的確是幫助中國，因為牠在華北、華中也有不少投資，是希望中國抗戰勝利的，美國那時還幫助日本，正大量供給日本以軍火及軍火原料呢！

孔祥熙的發財法

孔祥熙的財政政策與宋子文沒有分別，但他的弄錢辦法則比宋子文更多更狠，宋子文還講資本主義的一套形式，要手續清楚；孔祥熙則根本不講什麼手續，錢用去了不知道那裏用的；宋子文對部下較嚴格，不得他的許可，或容易為人發覺的，就不許胡亂發錢；孔祥熙對部下就不管你錢從何處來，用什麼方法得來，只要分一部分給他，就一律包庇。孔祥熙簡直錢會污，實官發爵，受納賄賂。坐地分贖，利川職權，

找價獲利之外，特別厲害的是操縱市場，壟斷居奇。

當實施「法幣」之前，外面還毫無風聲，孔祥熙當然早知道了，宋霽齡就以大量資金在公債、黃金兩市場大做買賣，賺了很多的錢。因為公債的漲落是與政局的穩定或動盪有聯系的，如果政局不穩定，還本付息可能延期，公債價格就要下跌。實行了「法幣」，則公債與鈔票的性質就相等，反出鈔票又不要兌現，多印幾張無妨，當然用不到停付公債本息，今後又須多發內國公債，因此價格必然穩定，而且會一致看漲。「法幣」實施後，上海證券交易所的公債市面，一般由六折漲到八折。這一過程中，宋霽齡及其一幫壞蛋發了大財。金業交易所買賣黃金，一般是便利進出口商人為避免外匯漲落的風險的；某商定購一批洋貨，要三個月後運到，結價時不知外匯長短，很難計算成本，他就在定貨時買進三個月或四個月期的黃金期貨，反正只要付十分之一不到的保證金，到時就不受外匯放長或縮短的影響。（在平時英美金行的漲跌甚微，故金價與外匯是同時漲落的。）出口商也是如此，運出一批貨物也要到遠目的地時才能收到外匯，如外匯放長，則折合華幣的數目就少，為避免風險計，在貨物運出，在金業交易所賣出幾個月的期貨，屆時就以收入的外匯作抵。華幣與英美匯價固定之後，金市的漲落必然縮小，宋霽齡等在事前製造的金市風潮中又大發其財。接着在收發統一公債與規定金市以關金結價兩事件中，宋孔又發大財。所謂「統一公債」就是把若干馬上到期的公債庫券，一律延長還本期，從五年到十五年，因此公債又跌下來，先知道風聲揚出的佔了便宜，拋空的（手裏並無公債票，先賣空，俟跌價後再補進，是無本錢生意）更大賺錢。金市本以美金結價的（如售出黃金而手裏並無黃金，到期時以美金三十五元抵黃金一兩），改為以關金結價，則完全由中央銀行操縱。（關金為虛金本位，其價格由中央銀行掛牌決定。）

黃金買空是一定要有對手的，一方面賺錢，即另一方面蝕本；一方面賺大錢，則另一方面就必然吃了大虧；所謂「晉之厚，秦之薄也」。賺錢的是宋孔，吃虧的是誰呢？CC、政學系，以及上海大多數金融界工商界，因此流行了「四凶」之稱。那「四凶」呢？是：「孔祥熙，不祥；徐堪（財政部常次），不堪；陳行（中央銀行副總裁），不行；宋子文（中國建設銀行公司總經理），不長！不祥，不堪，不行，不

真，是謂四凶！」冤家這樣多，當然「官吏投機，搗亂市場」的風聲就傳到蔣介石耳朵裏去了，那時蔣兼行政院長，還假裝正經，他鄭重其事的對翁文灝說：「詠霓，請你辛苦一趟，到上海去調查，回來時什麼時候到南京，就什麼時候來見我，越快越好。」翁文灝見到蔣如此聲表示，認為調查後一定要辦一下。翁文灝到上海調查了兩天，把什麼都搞清楚了，回到南京時已近黃昏，打一電話給蔣，問他是否接見，蔣回答他「明天再談」。翁已覺得奇怪。第二天一見蔣就說：「我已明白了，上海銀行界向來是吃財政部的，現在庸之不讓他們吃，所以他們恨庸之。」翁文灝說：「我在上海調查的結果，似乎不是這麼一回事，……」蔣馬上截斷他的話：「我已完全知道，你用不到講了！」竟不等翁文灝開口，就端茶送客，連「你辛苦了」一類的敷衍門面話也沒有說一句。蔣對翁文灝是一向比較客氣的，翁從來沒有碰過這樣的釘子，回到行政院，氣得話都說不出，停了一會，對蔣廷黻（那時的政務處長）說：「不好幹了，辭職，一定辭職！」蔣廷黻問他爲了什麼事，翁講了一遍。蔣廷黻想了一會說：「我看辭不得，要辭也要等三個月以後，事情冷了下去再辭。如果現在攢紗帽，就種下了裂痕，如有人說起這件事，他們會說是我們「露出去的，他（指蔣介石）豈是能容人的：說不定會招殺身之禍！」經蔣廷黻這樣一說，翁文灝的氣憤被嚇去了一半，不敢再喊辭職了。（翁任蔣的行政院祕書長，大概參預一些秘密，所以蔣廷黻會說「恐招殺身之禍」的話。）原來蔣介石派翁文灝去調查的時候，不知道投機操縱者是誰，所以大打官話，派翁去的同時，又派戴笠去密查，戴笠比翁文灝早回南京一天，已一五一十把內幕對蔣講了，蔣一聽牽涉到宋鶴齡，這件事就絕對辦不得，所以不讓翁文灝開口，免得說出了反而爲難。

在公債市場，黃金市場得了大利之後，「四凶」的投機操縱對象又轉到紗布、麵粉、雜糧方面去。做公債、黃金買賣的還限於金融界、政客、投機商人，投機操縱的影響還不深刻，紗布、麵粉、雜糧的漲跌，則影響全體人民，什麼人都害到了。政學系、CC等上一次吃了虧沒有出氣，這一次有大題目可做，自然不肯放過。交易所的監督管理權是這撥分的：證券、金業屬財政部；紗布、麵粉、雜糧則屬實業部。而實業部長則是政學系的吳鼎昌，「大公報」上不斷明確要求澈查法辦，作輿論助員。吳鼎昌親自到上海各

交易所調查，把經紀人的賬都封起來。吳鼎昌知道要扳倒孔祥熙是因難的，先扳姜錕，電告蔣介石後經電令，把統稅署長吳啓鼎、蘇浙皖三省統稅局長盛昇騰兩人（宋雲勳的親信爪牙）扣押起來。到移送法院之後，由杜月笙的幾個門生出來把一切責任頂下來，賬戶上的某記是某甲，某記是某乙，他們是商人，交易所條例上又沒有只許買多少，多買了就犯罪的規定，連一戶明明寫着「盛老七」的也由盛昇騰的妹子盛七小姐來承認，賬上又沒有註明「男老七」或「女老七」，誰也不能說「男七」不是「女七」。於是烟消雲散，依然一天星斗，吳啓鼎、盛昇騰官復原職。

常這件事情得正兇的時候，孔祥熙已提出辭職，蔣介石也同意孔辭職。GG的王延松（上海市黨黨委、商會常委、滬業銀行董事長，為陳果夫的養妹婿，陳家的「丫姑爺」，他的老婆原是陳家的丫頭，到出嫁時由陳果夫的母亲認為義女的，在迭次反日會時發財不少。）在南京聽到二陳騷起，回上海告訴潘公展，傳二陳之命，叫潘在「晨報」（鼓吹法西斯的蔣之嫡系機關報，由潘公展任社長）上罵孔祥熙，潘在幾次交易所風潮中也辭了本，正想出出氣，聽說有此機會，就接連寫了兩篇文章。不料「晨報」刊登反孔文章時候，蔣已心還意轉，預留孔祥熙繼續任職了。孔祥熙看到了「晨報」的文章，拿法對蔣介石說：「你編輯把我罵得這樣，你看我怎樣做法？」蔣介石無話可說，立即下命令，把「晨報」停辦。

抗戰以後，孔令侃做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一切公家需要的外國貨，都由他統一採購，不知賺了多少錢。孔祥熙自己在重慶開設了三十四家大公司，什麼商品，什麼行業都由他操縱。在鈔票愈發愈多，物價一天比一天漲的條件下，誰能先取得辦發行的票子，誰就佔大便宜。大家想一想，難道能搶在孔家的前面嗎？

所謂「英美派」

在談「英美派」之前，先談一談一般所謂「派」的意義及形成「派」的經過。中國舊時士大夫階級中

，還有「魯派」與「陸王派」，古文有「桐城派」與「陽湖派」，聲調也有道派那派，這就是說信仰耶穌人和佛教、學習耶穌人的思想學說方法，同時又排斥其他不同思想學說方法的（所謂有「入主出奴」之見的），即成爲什麼派。從清季派留學生出國求學以後，因爲英、美、德、法、日等國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各方面都比中國強，有些留學生回國後，總是誇獎外國的長處（有一個諷刺留學生的故事：某生留美回來，講起什麼東西來都是美國的好，中秋賞月，他說：「月亮也是美國的好」。他的父親氣不過，就打他一個耳光，罵他忘本，他卻說：「就是打耳光，也是美國人打得好！」），住過甲國的說甲國好，住過乙國的說乙國好，從甲國學的歡喜用甲國的出品，從乙國學的熟悉乙國的機構，於是就成了英國派、美國派、德國派、法國派、日本派……到那一國去留學，理應知道該國的長處以及學他們的長處的，否則就不必去學，日本也有所謂「知英派」「知米（美）派」「知獨（德）派」之稱；但在咱們中國，因爲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帝國主義者掌握最高的支配權，所以若干「知英」「知美」……者就不僅對英、美……等國盲目崇拜，遇到任何事情產生「如果在某國就一定有辦法」的想法，且進一步依賴某一國，以爲「只有某國能有辦法」；這就不是「知什麼」派而是「親什麼」派了。

以留學生的數量講，日本的最多，「親日派」就產生於留日學生之中，但所佔的比數並不大，因爲日本的教育精神強調了狹隘的愛國主義，所以大多數日本留學生是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數量上佔第二位的是留美學生，第一是美國在華所辦的大學特別多——如燕京、金陵、聖約翰、嶺南、滬江、湘雅、協和、東吳、之江、文華、華西……。選於南北東西各大城市；第二是美國首先把孔子賠款用於對華文化教育方面，特別是用於派遣留學生方面。留美學生回國後，雖然不是多數變成「親美派」，却大多數對美國有好感，或多或少地信賴美國。英國是第一個打開中國的門戶，一直到抗戰爲止，操縱中國政治最有力的是大英帝國，上海人把美貌的人（不論男女）叫做「大英」，以形容其到處吃香，可見英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勢力的龐大與深入。英美兩國語言文字極同，在國際政治鬥爭中常採取平行政策，雖然彼此間也有矛盾，所以「親英派」與「親美派」就從英、美一氣，通常就叫做「英美派」。

從廣義講，整個蔣介石集團都是「英美派」，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的走狗頭子，一切都依美國，宋子文、孔祥熙固然徹頭徹尾是美國買辦，黃埔系、藍衣社，CC也都是執行美國顧問的命令與實施「中美合作」的，就是素以「親日」著名，靠「親日」起來的政學系，現在是靠美國主子的青睞而掌權，張羣就是到美國去「養病」，被美國當局評定為「自由主義分子」而回國任「行政院長」的。馬歇爾說：「蔣介石是為英語民族的利益而作聯的，這句話如把「英語民族」改為「英美帝國主義」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確。但我們這裏所說的「英美派」，含義更如此廣，只是限於藍衣社、CC、政學系、宋孔集團之外的一些職業外交政客與金融買辦一種人物，連王世杰、曾奉勳都不算在內。

在職業外交政客中，著名而又主要的數王寵惠、顧維鈞、王正廷三人，後進的則有魏道明、錢泰、金問泗、劉師舜、徐謨等人。

王寵惠（寵惠）是法律專家，辛亥革命後任南京臨時政府司法總長，北京政府的外交總長，民十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回北京後，曾一度出任「好人內閣」的國務總理，「好人內閣」的命運很短，根本沒有做什麼事。民國十六年以後任南京的司法院長，先後担任海牙國際法庭法官多年。孫中山說過中國有三個半人的英文好，他就是半個（其餘三個為辜鴻銘的文學，陳友仁的時事評論，伍朝樞的政治宣傳文章）。民國十五年起當選為國民黨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其後一直連任到六屆。抗戰期間，曾一度任外交部長，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政治協商會議後為改組行政院候選院長三人之一（其他兩人為孫科、張羣，最後始由蔣確定任用張羣）。王寵惠在國民黨中是元老，是學者，一般認為是「正派」「清白」的。我只講他一個故事：從「好人內閣」之後，王寵惠、潘世和、羅文幹、顧維鈞四人結為兄弟，以便互相援引。那時國內三大勢力，奉系、直系、國民黨，究竟誰勝誰敗，孰興孰衰，尙難預料，因此他們就分了工：顧維鈞投奔吳佩孚、湯銘和、繆文幹、傅澤深作幕，王寵惠本是老國民黨員，又係廣東省人，則「參加革命」，將來不難勝利成功，他們兄弟就都「朝裏有人好做官」。北伐完成，東三省易幟，國民黨的統治優勢是成功下，蔣、韓、湯都保持原有高官，但內部矛盾既多，帝國主義間角逐甚力，還是舉棋難定，特別是「九一

八。以後，更不湯斷定「應死鐘手」，於是又有了新的部署，馮爾和還在北方遊日本使等者勾搭，羅文幹利南家投宋子文系統，任外交部長，拉攏美國對抗日本（顧長外交時對日本探不與態度，日本公使來由亞洲司長接見，參事等來由科長接見，因與汪精衛的政見不合，於宋子文出席世界經濟會議時被罷汪免職），王寵惠則以元老資格調停軍事，實際上偏袒西南，顧維鈞則周旋於英法之間，以觀時變。「七七」以後，馮爾和公開投敵，出任華北臨時政府的「常務委員」兼「政務督辦」，死得早，未受裁奪。羅文幹則參加了精社黨，以第三者姿態出現於國民參政會，不久就病死昆明，沒有一顆身手。王、顧兩人則依然做國民黨的大官。

「黨繫類」顧是有名的青年外交家，設備一口流利的英語和法語，熟諳悉一切西洋禮節，儀表很好，在國際會議中曾屢次駁倒日本代表（日本人的外國語，一般都說得拙劣時）；但他的本領就是這些。顧少川（維鈞）是唐少川（紹儀）的女婿（唐另一女婿為施肇基，亦為外交官），得唐紹儀的擡拔，逐步上升，第一次歐戰後召開巴黎和會（民八）時已任公使，為中國出席和會代表之一，以後歷任駐法，駐英公使，民十華盛頓會議又為出席四代表之一（其餘三代表為施肇基、王寵惠、伍朝樞，伍未出席）。其後即讓兼直系吳佩孚，是年直皖戰爭，段祺瑞失敗，吳佩孚正聲勢煥發，顧曾任外交總長，並一度代理國務總理。中蘇建立邦交，即顧在外長任內與加拉拉談判，一切俱已商定，即將簽字，其時直系內部又分為洛（曠）派（吳佩孚）、保（定）派（王承斌、曹銳），雖共同擁戴曹錕，但彼此開爭權奪利，互相排斥甚烈。顧瀾洛派，保派對顧大肆攻擊，吳佩孚則通電支持顧派，但顧終為保派所傾，故中蘇協定由王正廷簽字。顧之元配唐早死，續絀為南洋精衛當補黃氏，係爪哇糖商黃某之女，以豪富著名，據傳顧妻所戴的珠寶飾物，曾使英國王后自愧不如，其父親死後，她又承繼到遺產八百萬鎊（合美金約五千萬元，那時美國人看財產百萬元的即稱富翁）。當舊國會最後在北京復會期間（即賄選曹錕為總統的猪仔國會），顧維鈞曾一度代理國務總理，當向國會請願案時，有幾無恥的議員們說：「顧少川嗎？沒有問題。顧夫人臉紅耳赤，數錢說也很容易，何況做總理。」顧瀾對江憲黨定人，是屬十三號江浙戰線（江幫為直系寶號）。

浙江爲皖系（盧永祥），直系軍隊的總樞樞，江浙人民恨之切骨，而顧維鈞則爲直系強悍，其黨定的著家即爲直系軍隊所擁護，他元國唐氏的棺材也給直系軍隊擄走了。那時上蘇的紳士曾由賓觀潮（番號）發一打電報痛罵顧維鈞，說他「顧國賊」。

國民黨執政之後，曾企圖在黨棍中及有關的大學校授中起用一種外交官，以代替舊的外交官僚，如以劉文島爲駐意大使，程天放爲駐德大使，張乃燕爲駐比公使，張敬濟爲駐羅馬尼亞公使等，結果都鬧了不少笑話，騰笑國際，最後還是不得不重用外交官僚。顧維鈞即以此因緣，故法調英，由英調美。

王震堂（正廷）與蔣介石同鄉，小時曾同學過。信其督教，辛亥革命時任黎元洪的軍政府外交部次長（總長爲伍廷芳，南京臨時政府成立，總長仍爲伍，次長則易爲馮宗堯），任南北議和代表參贊。民軍代表爲伍廷芳，參贊爲馮宗堯、汪兆銘、王正廷，臨時參議院議員，民二第二屆國會召開，任參議院副議長，民六西南護法，王亦南下，民八巴黎和會，南北合派代表，王正廷爲南方代表，與陸徵祥、顧維鈞等同時出席，曾把山東問題密約告訴留法學生代表，當時頗負時譽。時傳美國威爾遜，是王正廷在美讀書時的教授，與王有師生之誼，威爾遜頗有幫助中國「翻案」之意，因北洋政府的佞表軟弱，故毫無結果。這一說法，是政會中人爲抬高王正廷的聲望而編造的，實際上美國與日本早訂過「藍辛、石井秘密協定」，承認日本接管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是租日的。巴黎和會之後，王正廷就離開了南方而投到北洋政府去做官，聲望頗會墜後，因直系軍閥的支持，任接收青島的督辦，在洛、保派的爭執，王正廷是保定派，是聲名狼藉的曹銳（曹錕）之弟，時任直隸省長的門下客，因此得任外交總長。民國十三年以後，王又以同爲起督辦的關係成爲馮玉祥一派；十六年後，以同鄉關係任蔣介石的外交部長。王正廷在南京做過兩次外交部長，也被粵生打了兩次，一次是爲了濟南慘案，日軍佔了濟南，殺了交涉使蔡公時，國民黨政府完全採取退讓政策；一次是「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採取不抵抗政策。還當然不能要王正廷負主要責任，但他就做了外交部長，就首當其衝，嘗了愛國青年的拳頭。抗戰開始，王正廷做駐美大使，那時蔣介石把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希望美國出來調停「動員黨（抗戰）」的目標，是「三國干涉遠東之舉，不難單見於

今日！」，而不學無術的王正廷，却爲羅斯福總統所輕視，王每次去請見羅斯福時，羅斯福在禮節上不能不接見，但總實在不耐煩與王談話，所以每一見面就先邀王正廷打高爾夫球，以消磨時間，使王沒有談話的機會。蔣介石知道了之後，不得不把王正廷調回，而派「學者」胡適去繼任大使。（不過胡適的荒唐更超過王正廷，胡適到任不久，外國記者問他：「中國的游擊戰打得怎樣？」胡適的問答竟是：「游擊戰，不過害老百姓而已！」）所以許多華僑控告他，說他「完全不是中國人的立場，竟像是日本的大使。」

王正廷下台的另一原因，是爲了他建議徵用中國銀行海外分行所保有的國外證券（股票、債券），宋子文說他「不明事理」。抗戰初期，只有蘇聯借軍火及派遣空軍志願兵到中國來助戰，直到第二次歐戰發生時止，英國或美國貸給中國的借款，不及蘇聯十分之一，總計起來，不過幾千萬美元，而且都附有苛刻條件。王正廷在美國既借不到錢，覺得難以完成任務，恰巧他的兄弟王正序担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經理，從王正序那裏知道中國銀行存儲着外國證券有二萬萬美元之多，就一個電報向蔣介石建議，由政府徵用這筆財庫。蔣介石聽到「兩萬萬美元」那樣大數字，很爲高興，馬上邀宋子文商量如何提用。宋子文是中國銀行的董事長，他考慮了一下，還擔答覆蔣介石：「政府一定要動用呢，也可以，但要給我一個月時間，把所有海外中國銀行分行的負責職員統統都調回來，準備好破產辦法，免得他們都吃外國官司。因爲這二萬萬美元的證券，是所有海外分行的存款準備，如動用了，就無法支付存戶揭款，那只有破產；而中國在外國又沒有領事裁判權，各地分行的負責人就要吃外國官司的。」蔣介石一聽，等于兜頭一盆冷水，把一團高興化爲烏有。接着宋子文就主張把王正廷撤換，促成了王的去職。（同時王正序也因此被調回，改任總行專員。）王下台後居香港，與杜月笙、錢新之等代蔣與日本與匪院代表進行秘密談判投降條件。日本投降後，王任揚子建築公司董事長，成爲孔系財閥的傀儡。

在金融界辦中，我只介紹兩個典型人物——陳光甫與貝淞蓀。一般說把他們列入宋子文系，那也有相當道理，一則他們都和宋子文密切合作過，二則他們是「具體而微」的宋子文，起着與宋子文同樣的作用；但從另一方面講，他們的社會地位與政治資本，並不是依附宋子文得來的，正因爲與宋子文能起同樣的

作用（只是量的不同），不免「同行嫉妒，互相爭寵」，所以不應作為案宗。僅限在某些方面與宋子文完全抗衡一氣，某些方面則與宋子文「分庭抗禮」，不受宋子文的支配。

陳光甫（輝德）江蘇鎮江人，在上海金融界（鐵莊幫），有四帶：江蘇的蘇州幫與鎮江幫，浙江的寧波幫與紹興幫。從鐵莊發展到銀行，鎮江幫勢力較大，在大錢莊中（匯豐莊）則當波居優勢。陳光甫從美國留學回來，以二十萬元的資本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由於辦法新穎方便，營業科舉會理給往來者以許多便利，業務逐漸擴大，資產日益雄厚，截至抗戰之前，上海銀行所吸收存款之多，在全國商業銀行中佔第一位。陳光甫有那樣的成績，所以中外資產階級都承認他是一個有能力的成功的企业家，特別是美國資本家很看得起他，因為他從美國學到本事，能靈活運用而得到成功。民國十七年起，宋子文掌握南京財政權以後，在上海銀行界中特別倚重兩個人，一個是上海銀行總經理陳光甫，一個是浙江實業銀行總經理李觀藻（銘）。浙江實業銀行是四十萬元資本搞起來的，那時也已為大銀行之一，不過從發展的比例上講，「浙實」就不如「上海」。從表面上看，中國所有銀行都是從小到大的，實際上則有許多銀行都是有所憑藉的，如北四行中的金城銀行是孫傳估交通銀行起家，大陸銀行則孫傳估中國銀行起家的；金城、大陸兩銀行為中交兩行的高級職員所創設（大陸銀行在北京時就設在中國銀行的後門，室內完全相通），放款做生意，賺了錢就算大陸、金城的，蝕了本就記入中交兩行的賬內，這樣才成為大銀行。在上海，中交兩行（特別是中國銀行）扶植了新華信託儲蓄銀行，但新華銀行到今天還不能算什麼大銀行。可見上海銀行與浙江實業銀行的緣，替得法而逐步發展，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正因為陳光甫有這一資本，所以他在美國資本家眼中的地位，僅次於宋子文。抗戰初期，蔣介石要從美國取得物資與借款，同時又不願重用宋子文（那時蔣宋之間有矛盾，宋孔之間有矛盾），而宋子文則多少有「你頭打通美國關係，就非我不可」的氣概，蔣介石既不肯對宋讓步，孔祥熙又不中用，不得已而思其次，就派陳光甫到美國去，談判借款和換貨協定，借款和易貨，均以鑄砂、桐油、豬鬃等特產償付，一九三九、四〇年時有人主張設貿易部，以陳光甫為部長，但孔祥熙不肯把太刺讓入，結果只設一貿易委員

會，以陳爲主委。在這一階段中，蔣介石孔祥熙以陳光甫代替宋子文，所以也有人說陳光甫列入孔家系統，那更不恰當，陳根本應不起孔，而且多少有矛盾。在抗戰之前，陳光甫的事業，民族資本的氣味較重，抗戰後特別是做了貿易委員會主委之後，買辦性的比重就大大增加，一九四七年蔣政府「改組」，要把陳光甫列入「府委」，除爲了取得美國財閥的好感外，是沒有其他作用的。

貝淞蓀（祖詒）是江蘇吳縣（蘇州）人，出身於封建地主兼買辦的世家，第一次歐戰中發大財的顏料大王貝潤蓀是他的哥哥。曾任中國銀行紐約分行行長，香港分行行長，宋子文做中國銀行董事長時任滬行經理。宋子文任行政院長，宋漢章病死，貝淞蓀就繼任中國銀行董事長兼總經理。抗戰時期對黑市匯率的處理，貝淞蓀是實際的負責者。據說中國只有半個人懂得國際匯兌，這半個人就是貝淞蓀，所以貝淞蓀不僅是中國對國際匯兌問題的專家，而且是權威。因此他在美國資本家裏也有「信譽」，所以他被選爲談判「五億七千萬美元援蔣貸款計劃」的代表。中國銀行歷史上就分爲兩派：一爲浙江的王克敏派，一爲江蘇的張公權（嘉璈）派，在北洋軍閥時代，王克敏任總裁，張公權爲副總裁，大權操於王克敏，民國十六年北伐軍到了上海，張公權就把上海區間行（中國銀行在全國分爲四區，滬行管東南各省分行，津行管華北各省，漢行管長江中游及西部各省，粵行管華南各省，上設總管理處於北京）改爲總行，自任總經理，排斥了王克敏的勢力；宋子文攫奪中國銀行，把總經理制改爲董事長制，擡走張公權（給以中央銀行第一副總裁的空銜），就利用王克敏系的力量對張反攻。貝淞蓀是中國銀行的老幹部，在王張兩人之間，比較接近張公權。一九四八年初赴美談判「援蔣貸款計劃」，主要是政學系的意見。

所謂「夫人派」

談到了「英美派」之後，順便附帶講一講所謂「夫人派」，就是歐美美輪描拔的一批具有若干美國作風，美國臭味，能說流利漂亮的英語的人物，其中主要的就是吳國楨、董穎光，還有一個黃仁霖。

吳國楨做過蔣介石的私人秘書，因風致不遂俗，英語很流利，蔣宋美齡所賞識，外放漢口財政局長，升湖北財政廳長，轉漢口市長，官運亨通。儘管他做了廳長、市長，只要蔣宋招待外賓（不論大小）有他在座，宋美齡就叫翻譯，他必站在一旁翻來譯去；武漢失守後退到重慶去，任重慶市長，又轉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一九四六年又繼錢大鈞為上海市長。為國民黨官僚中升官最快的一人。

董顯光出身新聞記者，曾任研究系的時事新報社董事，英文「大陸報」主筆，後由宋美齡勸我，任華南委員會國際宣傳處處長，為蔣對外國記者的發言人，抗戰後國際宣傳處名義上改隸國民黨中宣部，董亦轉任中宣部副部長，國際宣傳處長則由曾虛白担任。一九四七年蔣政府改組董任行政院新聞局長，為蔣政府的法定發言人。這個局長是特任官，和部長地位一樣高，董就任以來，每星期必發表一篇撒謊談話。

黃仁霖為東京大學畢業，做過青年會幹事，蔣介石設立勵志社時，由宋美齡推荐他為總幹事，蔣介石、宋美齡出外旅行，常帶了他同走，實際上是蔣宋的「高等」副官；為什麼要說「高等」呢？因為黃仁霖的階級是「陸軍中將」。開羅會議時，羅斯福帶的專家與隨員有四百餘人，邱吉爾則帶了九百個人，蔣介石則連宋美齡的老媽子在內也不過二十人左右，除蔣介石宋美齡之外，職位最高的就是黃仁霖。英國的參謀長在佈置議程時問黃仁霖：「中國出席陸軍會議的代表是誰？」黃答：「委員長。」「海軍會議代表是誰？」「委員長。」「空軍呢？」「委員長。」「運輸問題？」「還是委員長。」……「委員長。」……「委員長。」英國的參謀長不禁問：「中國人口有四萬萬五千萬，為什麼只有一個委員長呢？」黃仁霖啞口無言，他有什麼話可說呢，「委員長」之外，就是「夫人」，「夫人」之外，就是他這最高副官，不是「委員長」出席又有什麼辦法！

孫科派

孫科是孫中山的獨養兒子，孫中山在世時，人家叫孫科的集團為「太子派」，現在這個名稱已為蔣經國的「建國社」所代替了，為什麼孫中山在世時孫科已自成一派呢？這就充分說明他們父子之間並不一條

給他的贖，他們父子之間有顯著的不同：孫中山慷慨奉公的，他的遺產僅上海愛利哀路一幢小洋房，還是華僑送給他的；但孫科則僅在廣州市長任內刮了一二百萬（淨餘的），武漢政府時任交通部長，出售平漢路房地產，僅佔了三百餘萬，南京政府鐵道部長任內又有三百餘萬元公款沒有報銷，至於浮報僑債的當然更多。此其一。民國十三年後孫中山實行三大政策，聯俄聯共，而孫科則背後反對三大政策，孫中山逝世不久，即支持西山會議反對蘇俄反共。此其二。蕭佛成曾罵孫科「不肖」，說他「沒有一點像總理」。蕭佛成是右派，政治主張是反動的，但他對孫科的批評，却很正確。

孫科一生的主張與傾向，是變得很多的：民國十四年是國民黨的右派；民國十五年冬到十六年又是「右派」了，成爲武漢政府的中間分子，蔣介石曾要逮捕他。七月以後，他又與蔣介石合作反共，到南京做官。從十七年到十九年一直聯蔣反汪，二十年又跑到廣州去聯汪反蔣。二十年底，一度出任行政院長，被蔣迫倒，蔣汪合作同時上台；他在上海不斷發表談話：「獨裁要反對，變裁也要反對。」蔣介石答應每月給他十萬元特別津貼，立法院經費從六折發放改爲八折發放，他就到南京去做立法院長。這以後，他創辦「中山文化教育館」，發起「中蘇文化協會」，似乎比較進步；同時他又制定充滿濃厚法西斯獨裁氣味的「五五憲草」。抗戰以來，孫科是積極主張聯蘇的，他到過蘇聯，從蘇聯獲得很多幫助，被認爲抗日堅定，傾向民主；而一九四一年則公開譴罵民主政團同盟和救國會爲「新漢奸」。以後直到一九四六年政協會議時還是扮演「傾向民主」的國民黨「進步派」，最後在偽國大制僑憲及蔣府「改組」中顯出了原形，蔣介石實力反人民的代價，是被選爲「國民政府副主席」。

孫科的「善變」，正如西遊記上的孫行者一樣，但蔣介石給他殺了一個金箍，只要一唸「緊箍咒」，孫行者就伏伏貼貼地聽他使喚了。這個「金箍」是什麼呢？不是別的，依然是錢。孫科的所以善變，其關鍵在於「貪財」與「趨勢」，尤其是貪財一端起着決定作用，如民國二十年孫科離粵赴滬，聯汪反蔣，其主要動機就是因爲鐵道部的財產公款多數變成了孫科的私有，連造假賬也造不出如許大數目來，完全沒有方法可報銷，可交代，於是當着政治問題把所存公款藏括而去。廣東方面當然歡迎他去，增厚一分力量。

換不會向他算帳的類，南京方面已找著到他家，就是公捕或逼斃，人家也會認為政治上的報復，不增相怨。那時蔣柔寧人由贛南向蘇浙逃竄，揭發孫科的貪污事實，但一般的反映，多數認為蔣介石與孫科政治上反蔣而故違黨遺而不打蔣黨的，是蔣介石度量太小，並不因此而增加對孫科的不真實惡。蔣介石極得孫科的貪財濟私，所以就使他的拿筆好戲來，最後當然「有錢能使鬼推磨」，一個月十萬元的蔣別津貼，孫科就全心全力為他「翻盤」了。（對孫科就任立法院長後兩個月，蔣介石別津貼就有所變更，「中山文化教育館」的設立，似乎就是由此轉化的，「中山文化教育館」的經費，每月由行政院撥五萬元，上海市政府、廣東省政府各二萬元，南京市政府一萬元，總數恰合十萬元，還是一跡象；又孫科私人顧問約各種支出，大都是由中山文化教育館付賬的，中山文政館似乎是孫科的私人賬房一樣，這又是一個跡象。）孫科所愛的是錢，蔣介石就把錢使用他，也把錢來制控制他，順蔣的意思就多給早給，不順蔣的意思就少給遲給甚至不給。孫科主持「中蘇文化協會」主張聯蘇，一般人因此認為他是進步的，不錯，中蘇文化協會曾出版過介紹過一些較進步的刊物，藉此遇到反動的CC文棍的攻訐。抗戰之將，孫科曾邀一邀CC的中樞文棍談話，說：「中蘇文化協會及其所做的工作，是委員長要我這樣做的！一切做法也都是根據委員長的指示而進行的！現在有些人批評這樣，批評那樣，算什麼道理？自己不知道，還亂作主張，簡直是胡鬧！」態度狠為強硬，他憑什麼硬的呢？因為是「委員長」要他這樣做的，他所以有恃無恐。原來他的進步目的是奉蔣介石的命令扮演的。一九四一年秋冬之間，希特勒的侵略軍深入到蘇聯境內，佔領了基輔與明斯克，攻陷斯維倫斯克（莫斯科的門戶），希特勒準備到莫斯科去過他的十一月八日的紀念節，美屬的海軍部長諾克斯勸說而肯定地說：「祇有奇蹟才能挽救蘇聯的崩潰了！」中國的反動派準備到新疆去歡迎希特勒的納粹軍人。總之，一切中外資產階級都認為蘇聯是沒有希望的了。那位一向「主聯」聯蘇，一向「提倡」中蘇友好，一向「贊助」團結抗日的，「進步的孫哲生先生」，就在香港天空議論，紙張中擁護共產黨、救國會派，以及民主政團同盟了！可是局勢的發展出於資產階級的預料之外，德軍被擊退了，於是黨科又拾起要領的「進步」招牌。

「凡愛錢者必吝嗇，孫科當然不例外。他每用一個錢，都是由立法院或中山文化教育館出賬的，私人的錢是一毛不拔的。祇有一次大破慳囊，就是『交際花』藍紫珍肚皮大了要控告他『誘姦遺棄』，經杜月笙調停，孫科忍痛拿出了二十萬元。（這是民國廿四五年間事。抗戰後藍又到廣東去與孫科同居一時期，後於民國廿九年三十年間離滬至港，嘗往來於港滬間，與陳公博、褚民誼、錢大鈞等各大漢奸好談。）除此以外，就是幾百元也必由立法院或中華文化教育館付賬，如抗戰初期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由宋慶齡出面領導作對外宣傳，籌集經費，孫科出了一千元，結果是寫了兩張收據；立法院五百元，中山文化教育館五百元。正因為吝嗇，所以並沒有什麼可靠幹部。表面上看，孫科似乎自成一派，從民國十一年做廣州市長以來，部下却有不少人物，除吳鐵城已脫離孫科之外，有馬超俊、梁寒操、傅秉常、劉維熾、陳策、張惠長、黃漢傑、譚小岑、吳倚鷹、樓桐孫、陳長衡、吳經熊、衛挺生、陳伯莊、蔡增基、玉峴齋、鍾天心等，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所謂屬於孫科系統的有一二十人。事實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如陳策、張惠長已為過時人物，不起什麼作用，在海陸軍中既無勢力，也不能靠孫科而重握海軍、空軍權力；他們如想東山再起，則依靠孫科也無用處；不想東山再起，就無庸依靠孫科。吳倚鷹、樓桐孫、衛挺生、陳長衡等是立法官僚，胡漢民時代就當立法委員的，與孫科僅是職位上的隸屬關係。劉維熾、蔡增基是孫科刮錢的，自己也刮了不少，孫科做了立法院長之後，他們不能靠孫科之力取得掌握財政經濟機關，就無所求於孫科。馬超俊、梁寒操已投向蔣介石權系的反動集團，梁寒操且成為C.C.最反動的一翼。所謂『革新派』的活動份子；譚小岑則早成為C.C.特務。稱得上親信的只有黃漢傑一人，因為孫科的財產是黃漢傑經營的。黃為美商花旗銀行買辦，民國廿年底到廿一年初的極短時期中孫科做行政院長，曾以黃漢傑為財政部長（孫科做官刮地皮得來的錢，大部分委託黃漢傑運到外國去的，所以用他做財政部長），孫科下台後黃漢傑當然也下台，就做了孫科的限厚培生，因為黃既做過部長，表面上不好意思再做買辦了。

當孫科高聲進步，獲得羣衆擁護的時候蔣介石對孫科的策略，一方面命令C.C.等從側面予以壓力，一方面卻不能不用『草料』喂他一頓。但當孫科公開反動時，離席的嫡系一面在旁『鳴彩』捧場，而蔣介石

却只給孫科「草吃」，却扣其「料食」了。孫科却不懂這個道理，每當蔣介石對他加重重視時，他竟以露骨反動企圖取得蔣的好感，他比政學系不如進甚，試問：他反動還能超過CC嗎？正是「其愚不可及也」！

「下詔罪人」、「破格用已」

對於蔣介石的辭語，除大公报的「好話爲先生說盡」，環事爲先生做盡」兩語，一般被認爲中肯而恰當外，抗戰前南京曾流行過一副對聯，上聯是「不詔罪人，破格用已」；下聯是「勵精圖亂，發奮爲雄」。人們一看到這幾句話，很容易以爲是印刷工友排錯了字了：從來只有「下詔罪已」，沒有聽到過「下詔罪人」；只有「破格用人」，沒有聽說過「破格用已」。大家知道應該「勵精圖治」怎有「勵精圖亂」之理？司馬遷的史記上有「發奮爲天下雄」的話，「發奮」而又「雄伏」，就出於常理之外了。你覺得不合理嗎？蔣介石就是這樣的。

蔣介石統治中國逾二十年，造成深重的內憂外患，但在他的切文告中，總是責備「國人不自振作」，「國人玩忽」責備別人沒有照他的辦法，他的命令做，因此把自己弄壞了，甚至舉國人民都沒有「國家觀念」，不知道「愛國之道」。一切責任都是別人的，從來沒有說一句他自己做錯了什麼事。對於國民黨及其政府與軍隊的種種罪惡及腐敗情形，他有時也在某些會議上講過，有時也似乎說得很痛，批評得頗爲正確，但有一個特點，就是一切責任都應由下邊的人負起，都是小職員小幹部做錯的，從來沒有一個字說過他自己應負什麼責任，犯了什麼錯誤。（關於這一方面的例子，「蔣介石言行對照錄」裏搜集了不少，不再舉例說明。）愛國自衛戰爭的第一個半年，蔣軍被殲滅了的四十五個旅，蔣介石於三十六年新年發表一個文件，對他自己戰略上的錯誤，一字不提，專責備其部下的軍官沒有照他的指示去做。萊蕪戰役就是遵照蔣介石的指示而得到七十三軍四十六軍全部覆沒結果的，被撤職的却是薛岳。專制時代的皇帝，有時爲收拾人心或挽回人心，曾下「罪己詔」，廣揚有「萬方有罪，罪在一人」的話；但蔣介石却是「一人有罪，罪在萬方」，照他的講法：他是「從來沒有做錯過事的」（實際上恰恰是「從來也沒有做過事」

蔣介石曾建請於保定軍官學校，修學日本士官學校的功課，對軍事一門不能說他是門外漢，但對其他部門的知識與本領就未必都懂，更難說有所特長。然而他却有「本事」與「勇氣」做各式各樣的領導工作，從黨務、軍事、政治，到文化教育，以及財政經濟，無所不管。在「九一八」之前，他是「國府主席」，兼「海陸空軍總司令」，譯延闕死後，他兼「行政院長」，後來因有學潮，又兼「教育部長」。那時有聲有關教育文化的公文，文內「案據」之中又是「案據」，是「蔣中正呈蔣中正，蔣中正再呈蔣中正」；「案奉」之後又是「案奉」，則是「蔣中正訓令蔣中正，蔣中正再訓令蔣中正」。「九一八」之後到「七七」抗戰，他的職務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務委員」、「陸軍大學主任校務委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中央航空學校校長」、「中央政治大學（國民黨黨校）校長」、「警官學校校長」、「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汪精衛遇刺出國後又加「行政院院長」，國民黨「中常會副主席」，「中政會副主席」，「航空委員會委員長」。抗戰以後，除上述各學校的校長照舊外，總的方面為「最高國防會議（後改稱「最高國防委員會」）主席」，林森逝世後任「國民政府主席」；軍事方面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航空委員會委員長」；行政方面為「行政院院長」，「饒地黨政委員會主任委員」，「四川省政府主席」；黨務方面為國民黨「總裁」，「三民主義青年團團長」，「中央設計局」及「黨政考核委員會」主委；「民意」機關方面則為「國民參政會議長」；財政金融方面則為「四行（中央、中國、交通、農民）聯合總管理處主任」，「中國農民銀行理事長」；教育方面則一度兼任「中央大學校長」。黨政軍民財政各部門的「最高」職位，都由他二人包辦，那時不少人稱他稱「最高領袖」，原來他的所以成爲「最高」，就是那樣得來的。

蔣介石執政二十年，與內戰相終始（僅抗戰初期停止過一二年，以後即不斷磨擦），禍國殃民，罪惡滔天。但蔣介石本人却是很「辛苦」的，你只要看他担任上述數十種職務，就可見其「勤勞」了！他不相信別人，只有自己兼上，兼上就多少要費些精力，（如抗戰中兼行政院長時一天批五件公事，其餘由孔祥

照辦)，不是空担虛名的。可是他爲什麼「辛苦勤勞」呢？爲的是「殘害人民，閉門揖盜」！

蔣介石一生善於變腔作勢，好像他真是爲國爲民，民國二十年十月在南京對請願抗日的學生說：「三年以內如不能廢除不平等條約，驅逐侵略者出國，就殺我蔣中正的頭！」以後不斷搞這種運動，搞那種運動，也都裝出要發奮圖強的樣子，事實上則「不抵抗政策之後，連接來的是『淞滬協定』、『塘沽協定』、『通車通郵，軍實上承認滿洲』、『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敦睦邦交令』、『華北特殊化』、『張川越談判』、『七君子下獄』，直到蘆溝橋的砲聲響了，還是「和平未至最後絕望，決不放棄和平；犧牲非至最後關頭，決不輕言犧牲」——原來「發奮」的姿態，是爲了便於「屈服」。

「副總統」李宗仁

正當人民解放軍以排山倒海之勢突破各戰線蔣匪軍，勝利地展開攻勢時，南京的蔣家小朝廷扮演着一幕所謂「行憲國大」的醜劇。這一幕醜劇是蔣匪國國民黨及蔣介石本人臨死前的最後一場戲，和袁世凱的「高陞爲大皇帝」一樣，是蔣介石的「飾終典禮」。這幕醜劇中緊張精彩的場面，是蔣介石聲明不願做「大總統」，放棄競選，並提議推胡適爲候選人；「國大代表」要求槍斃陳誠；而最緊張最精彩的場面，則是「選副總統」，經過四次投票，纔把「桂系軍閥」李宗仁選出來。這三件事情是有連帶關係，環繞着一個中心發生的——這一個中心就是人民解放軍的勝利，蔣介石集團已迅速走上沒落崩潰的道路。連美帝國主義者也認爲蔣介石這個奴才頭子太沒有用，準備拋棄他而另換一個新奴才頭子。美帝國主義心目中的新的奴才頭子候補人，就是偽國大投了四次票所選出的偽副總統李宗仁。

蔣介石近十餘年來的最大希望就是做上「民選的正式大總統」，使他獨裁專制「合法化」；從「五五憲草」的製定之日起，蔣匪國國民黨的一切關於「憲法憲政」的言論和行動，都是從「由蔣介石任大總統」的預定前提出發的，製定偽憲法，包辦偽國大，一切都是爲了蔣介石坐上「總統寶座」。在偽國大開幕前後，所有國民黨青年黨民社黨以及所謂「社會賢達」等幾千名奴才中，沒有人肯出而作陪客，「做總統候

選人（最後才拉上一個居正陪襯一下），為什麼這樣呢？大家都知道「總統」是蔣介石的「禁樹」，蔣介石固志在必得，別人是不能染指的。偽國大開幕之後，蔣介石的「總統」馬上可以到手了，為什麼他要聲明不願作候選人呢？

一般的觀察，是蔣介石藉此自抬身價，取得廣泛權力；果然在各地奴才們通電呼籲，一致「推戴」之後，蔣介石就「俯就輿情民意」，放棄自己的「主張」而「應選」了。這和民國四年偽國民代表上書勸進「推戴大總統為今上皇帝」，袁世凱「謙讓」三次而後就，是同一手法。這種觀察，說明了蔣介石裝腔作勢，以退為進的作用的一方面，但僅是淺顯的一面，而不是其作用的全部。蔣介石裝腔作勢的主要作用，却在於下列兩點：第一，做給美國帝國主義者看，他得到「全國的擁護」，非他做「元首」不可；使美國主義者感到必須繼續支持他，如不支持他而支持扶植別人，事情就更不好辦。第二，做給準備代替他的人看，好像說：「你看，我的勢力多大，聲望多高？你雖得美國主子的支持，要想代替我，那是很不容易的事，不如早些收篷為好！」

還在偽國大開幕之前，美國當局在商討援蔣貸款時，馬歇爾和社魯門都會發表過有關中國問題的演說和談話，內容都涉及蔣政府的基礎問題，而且國務院的發言人又一再加以解釋，（先說在中國問題的聯合政府並非必須包括共產黨在內，以後又說也並非美國主張一定不包括共產黨在內）、國務院官吏對其總統和國務卿發表的言論作帶有修正性的解釋，在國際慣例上是很少見的，甚至可說是一個失態。為什麼會這樣呢？主要是為了表示對於蔣介石政府的不滿，含有「取瑟而歌」的意思。到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過撥貸款五億七千萬美元的時候，參院外委會發表了一個報告書，整厲批評蔣介石政權的貪污無能。南京的奴才們看到後有些驚惶失措，認為這個報告書對蔣政權政治上打擊之大，決非五億七千萬貸款所能抵償；過了幾天，參院請長兼外委會主席范登堡發表聲明，收回這個報告書，理由是「這個報告有些過分地方，發表之前沒有經他同意，不宜發表。」但他却說報告書中關於軍事部份的批評是恰當的，這一部份不要取消。表面上范登堡似乎是為了保留蔣介石一點面子，不要使他太難堪，實際作用並不如此：因為蔣介石失

敗的決定點就在軍事方面，軍事上的無能與失敗，注定了蔣介石集團已到了不可救藥的地步。范登堡聲明，雖在尾巴上拉上一句爲蔣介石捧場的話，其作用等於把小孩子打了一頓，小孩哭了，於是又去哄他：「乖，不要哭了，以後好好聽爸爸的話，爸爸還是歡喜你的。」可是言外之音，却含有「如果再不聽話，那就要打得更兇」的意味。

美國反動派對蔣介石「一面斥罵一面喂」的作法，除加緊籠絡蔣介石（「你再不好好幹，老子就不要你了」）之外，還含有對被培養作蔣介石替身者打氣的作用，蔣將來揮掉蔣介石這個奴才另換上其他傀儡時預作輿論準備，心照不宣。因爲蔣介石獨裁專制二十餘年，在反動陣營中建立了高度的「權威」，從來不允許有一個人能形成「第二人」的權位威望的，無論資望地位如何高，只要蔣介石感到足以威脅他或使他不能運用自如，蔣介石可以隨時拘囚、殺戮（不能公開殺的就暗殺）；因此美帝國主義需要鼓勵被培養代替蔣介石者的勇氣。又因爲蔣介石是中國反動集團的最高代表人物，「取精用宏」，根深蒂固，幾乎已成爲反動集團的唯一代表者，美帝國主義要撤換他，會引起反動集團的絕大混亂，許多反動份子會意味到「蔣介石尚無辦法，別人當然更無辦法」，於是動搖、沮喪、分化，退却，而加速其失敗與死亡的過程；所以美帝國主義者要適當削弱蔣介石的政治威信（這是對反動集團講的，蔣介石在人民中早已喪失威信可言了），使一旦要揮掉他時可以減少驚慌失措的程度。

當然，蔣介石是美帝國主義的奴才，一切聽主子安排的，但當主子要揮走奴才時，奴才爲拯救被逐的惡運，會特別賣力以顯出其能幹，表示他爲主子做很多有用的事，比其他奴才更有用處，以爭取主子回心轉意。這就是蔣介石「不願做總統」的主要作用。當這個「驚人消息」傳出，蔣黨所把持的各地各種團體，紛紛馳電「擁戴蔣主席爲第一任大總統候選人」的時候，「登報之下」的金陵大學（美國教會辦的）與中央大學教授却聯名發表文件，稱讚蔣介石不做總統是一個英明決定，說：蔣如能擺脫國事，到美國和蘇聯去遊歷遊歷，對中國前途與世界和平，都有益處。這句話表面上似乎並不激烈，實質上就是說蔣介石願錢下野出洋；如果再做「元首」，對中國和世界都有害處。在南京的大學教授們竟敢對專制魔王蔣介石說

這種熱風真動話，是不能想像的，除非他們得到司徒雷登的積極支持，否則是不敢有如此大膽的。美國資產階級報紙對蔣介石不做總統的表示，幾乎一致懷疑其誠意，也說如果蔣真不做總統，對中國是有利的，對蔣介石的裝腔作勢實質上是喝倒采。

馮國大在解放軍解放洛陽，收復延安，圍攻瀋陽……一連串的勝利聲中舉行，奴才們人心惶惶，蔣介石為安定奴心，特作了一次撒彌天大謊的報告，說兩年來戰爭中蔣軍只損失十分之一，而且已補充上了，共產黨不僅六個月不能肅清全國，六年也不可能；相反，他能在六個月內，「肅清黃河以南的共軍」。這一套騙三歲小孩也不會相信的話，引起蔣管區人士極大的震動，為誰知道這套套而沒有絲毫真實性的東西，澈頭澈尾是騙話；為什麼不講一句真話呢？一定是一句真話也講不得，所以只好全講假話，局勢的嚴重就可想而見了。馮國大代表對蔣介石的話不敢質問，對白崇禧的軍事報告就引起軒然大波，絕大多數「代表」拒絕聽其他偽部長的報告而要求先檢討白崇禧的軍事報告，在檢討中，許多人要求把準備到美國去「療瘡」的陳誠扣押起來，「槍斃以謝國人！」蔣介石的嫡系（C）和復興系本來企圖在軍事報告檢討中打擊桂系，結果一涉及實際問題，被當作「衆矢之的」老是陳誠。陳誠是蔣介石手下最大最親信的大將，馮國大代表要求槍斃陳誠，說明蔣介石在反動派陣營中已失去絕大多數人的信賴了。

「副總統」候選人共計六個：孫科、李宗仁、程潛、于右任（以上均為國民黨），莫德惠（「社會賢達」）徐傳霖（民社黨）。四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投票結果，李宗仁得七百五十四票，孫科得五百五十九票，程潛得五百二十二票，于右任不足五百票，莫德惠、徐傳霖各得二百餘票。李宗仁得票最多，但不足「法定」當選票數（一五二三人）的一半，四月二十四日第二次投票，李得一六三票，孫得九四五票，程得六一六票。當晚程潛聲明放棄競選，據說「是奉命退出」（合衆社）；接着李宗仁也聲明放棄，理由是「選舉沒有自由，有某種壓力施於國大代表，致不能自由投他的票」（合衆社南京二十五日電）；同時孫科也聲明「為肅清外面流言，清除誤會」而放棄競選，據合衆社說：「孫科的退出競選，是由於美大使司徒雷登的勸告」（同上電）。需要澄清的「流言」是什麼呢？路透社二十五日南京電稱：「寧市昨日標語約

傳，大抵傳單斥責李宗仁預定於當選副總統之後即發動政變，迫蔣下野。此傳此項傳單的主謀者為孫科。李方發言人稱，蔣正以一切力量助孫科競選。」同日中央社的編譯電中也供認：

「京市今日謠言叢起，其最足引起誤會者，為『新民報』所載交通服務社之啓事，其中竟謂蔣與李政見不合，彼此心相離宛不相協調，蔣不願支持李宗仁；又謂國民黨某有方人士欲藉黨權使某人（按指孫科）競選成功，並指某有方人士即蔣立夫；更有人竟謂蔣不時將遊歐訪問，李如當選，對安定時局勝任有餘，對外亦足具條件。……」

中央社是專門顛倒黑白的，官所要聞的謠言，什九是事實的真相。因為李宗仁的退出競選，造成南京的混亂，國民黨中執會，僑國大主席團紛紛開會，派遣代表請求李、孫、程收回放棄競選，以「完成行憲大業」，合衆社二十七日電稱：

「此間觀察家一致認為：李宗仁退出競選，已使其競選地位無限增加；蓋退出競選以及赴平之威脅，乃是一種手段，目的在達到預期之結果。此種手段，已獲得下列結果，（一）已使國民黨對選舉行使壓力問題公開化，迫使該黨不得不重申在競選中的「中立」地位；（二）使蔣介石不得不親向李宗仁請求其繼續競選，給予李氏的面子不少；（三）因蔣既表示擁李，實予反李者以嚴重打擊。衆信如李宗仁果真退出競選，則將使「國大」垮台，並可使國民黨分裂……故國民黨及蔣介石不惜一切力量公開贊助李之競選。」

經過一番波折後，僑國大二十八日進行第三次投票，二十九日作第四次投票，李宗仁以一四三八票壓倒孫科的一二九五票而當選為僑「副總統」。

這一醜劇說明了下列幾個問題：

蔣和偽黨中的「副總統」是毫無權力的，比美國的副總統更沒有權力（美國的副總統還是參議院的當議長），只有當「總統」出缺時，由「副總統」繼任。如果「總統」沒有意外，「副總統」就是「伴食中書」，不及一個省政府主席或部長重要。爲什麼值得如此投力競爭呢？當然不是爲了「一人之下，萬人

這分文上某「機構爲何後醫院受傷難民費救濟費，曾請求馮市府防空之上」的虛名，而是意味蔣介石下野的可能性頗大，當「總統」出缺時可以「繼任總統」，掌握政權，誰取得「副座」，誰就能在不久的將來「取蔣而代之」，所以要出死力相爭。此其一。

孫科的競選是得到蔣的全力支持的，並由陳立夫動員與壓迫國民黨員不投李宗仁的票而投孫科的票，所以李宗仁要揭穿蔣沒有自由」的內幕。孫科也不是蔣介石的嫡系，政治上是有野心的，蔣介石爲什麼不怕蔣而支持他呢？因爲孫科已喪失了自樹一幟的地位，沒有「取蔣而代之」的可能，孫科當「副總統」，蔣不感到威脅，蔣、陳的以全力支持孫科，說明李宗仁當選了蔣將威脅到蔣介石，「政變」的傳單，與「蔣不時將遊歐訪問」的謠傳，不是毫無根據的「危詞」，而是可能性的。此其二。

李宗仁一向不肯露鋒芒的，他很熟悉蔣介石「不能容人」的性格，十餘年來一直裝着「忠厚無用」的樣子。唯恐遭蔣之忌，如民國卅年夏白崇禧決定將香港的「珠江日報」復刊，去徵求李宗仁的意見，李堅決主張不要復刊，說「現在決不要讓別人感到我們廣西還要做什么事，愈少做事愈好。」這次居然一變過去「離伏」的慣例，出而競選「副總統」，而且竟敢揭穿蔣介石、陳立夫爲支持孫科所採取的行動，公然向蔣介石採取攻勢，先後判若兩人，這是什麼道理呢？根據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由於美帝國主義對他捧腹：他的出面競選，本來是司徒雷登親自到北平去勸出來的，特別是在李宗仁聲明退出競選之後，司徒雷登馬上對孫科行使壓力，「勸」孫科也退出競選，造成僵局，致蔣介石、陳立夫不得不對李宗仁讓步，這「着對於李宗仁的「當選」是有決定作用的。因爲：程潛即「奉令」聲明退出（當然是「奉」蔣介石的「令」），別人即無權「令」他，程潛也不肯聽別人的「令」；程潛的票子也一定「奉令」轉移到孫科名下，所以李宗仁會說「沒有自由」而以退爲進，聲明退出競選，這時候，蔣介石、陳立夫等可能表面上敷衍李宗仁，一面却繼續進行選舉，那末孫科成了唯一候選人，就勢算可操，當真要緊關頭，司徒雷登馬上出面干涉，壓迫孫科退出，才造成有利於李宗仁的條件。從這一點上可以看出：李宗仁已成爲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第二個乾兒子，而且「洋爸爸」對「第二乾兒子」的照顧，比對「第一個乾兒子」（蔣介石）更熱

心機。「有了小兒子，就不疼大兒子了！」美帝國主義是否就繼續支持介石？現在還不能作肯定的答覆，但已顯出這個傾向是毫無疑問的。此其三。

美帝國主義爲什麼着意李宗仁呢？先看美國新聞區（國務院編輯）電訊中所透露美黨產黨派的報紙對李宗仁怎樣捧場：

「紐約先驅論壇報」稱：李宗仁的當選，乃顯示一張張革新分子榮獲一舉萬之地位。……李向來即要求一誠實有力之政府，先得人民之支持，然後即可能擊敗共產黨，故李之當選不宜忽視。」（譯盛頓四月三十日電）

「克利夫蘭俄亥俄」正官報「五月三日社論稱：過去幾個月由各方面的消息，所說的無非是國民政府軍事上的敗績和國民黨政治機構的繼續腐化與窮困，上週國民大會推選李宗仁將軍爲副總統，確是一個難得的好消息。……他一向爲和平中國作戰；他有很豐富的政治經驗；……知道忠實的政府所應做的事情；他知道中國在反抗共產黨方面獲勝的唯一希望，乃是儘可能提供最好的政府。李宗仁將軍希望獲悉各方面的意見，還在向來是百分之百以國民黨固步自封的政府各界中，是一種新的傾向。他堅持實行「本的軍事、經濟、政治改革；這種行動，蔣介石實避不採取。李宗仁將軍並不是蔣介石「唯命是聽的人」，他對中國有見解，也是二十年來統治階級內部最好的見解。」（同七月五日電）

「費城日報」五月一日評論稱：李宗仁將軍代表國民黨內部反動分子的反對派；這些反動分子是中國行政系統民主化的主要障礙，他們阻撓馬歇爾國務卿的努力。……（同上電）

美國反動派爲什麼選擇李宗仁呢？因蔣介石已失盡人心，沒有希望了，在中國反動陣營中選來揀去，只有李宗仁還可能起騙人作用，所以給他出來使一盡害怕革命的人們對此發生幻想，使中國反動派可以重新組織力量。其次，中美反動派已選擇兩廣爲最後負隅之所，但兩廣人民過去吃了蔣介石集團很多虧，蔣介石要退到兩廣去，是不可能見容於兩廣人民的，宋子文雖是廣東人，也無能爲力，而李宗仁在兩廣多少有些潛勢力，充其是我輩以奉李宗仁一兩在外面，一切危害人民的毒不能算到他的賬上去，容易起騙欺

作用。第三，李宗仁與李濟深的私交素好，如果李宗仁把蔣介石擠下了台（這當然要由美國主子決定），有拉攏李濟深等合作的可能。於是李宗仁就成爲美帝國主義者武庫中最後一件法寶。

這個被美帝國主義者稱爲「一向爲和平中國作戰」的李宗仁「將軍」，最初是廣西大土匪陸榮廷（袁世凱時代的廣西將軍）的部下，後來則爲陳炯明的第一員大將林虎的下屬，（陳炯明的三員大將，第一名爲林虎，第二名爲葉舉，第三名爲洪兆麟。）民國十二年孫中山先生出師桂林北伐，李宗仁在西江上游魏擊大本營的船隻，打翻了幾隻，這就是他「爲和平中國作戰」的開始。民國十四年國民黨革命軍肅清了陳炯明的全部勢力，收復了東江和南路，李宗仁看到大勢所趨，才投降廣州的國民政府，改編爲國民革命軍第七軍。北伐以後，李宗仁駐武漢，武漢成爲屠殺民衆的最大屠場，殺人之衆多與殘酷，比起蔣介石在上海南京的「樂績」還要超過幾倍。抗戰後李宗仁擔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廣西軍在五戰區的不少，對抗日毫無足道，害民則首屈一指，強姦、搶掠、殺人、放火，甚至比日本鬼子還厲害！民國三十年春，國新社記者李洪路過安徽壽縣，桂軍旅長聽到有一新聞記者路過那裏，怕把遇敵潰逃和蹂躪民衆的真相被記者報導出去，當夜就把李洪活埋了，這種事情，在抗戰時期是任何反動部隊所沒有的，只有李宗仁「將軍」的部下才做得出！李宗仁白崇禧所統治的廣西省是有「模範省」之稱的，據說廣西的民衆是最有組織的，地方自治有成績，民衆自衛的力量很強；抗戰時期經過了兩次考驗：第一次是敵人從欽廉進攻南寧，西至龍州，南渡邕江；第二次是民國三十三年從衡陽進攻桂林、柳州。廣西的地勢是「無地無山，無山無洞」，阻擊與困擾敵人是最有利的，然而敵人兩次進兵，幾乎是如入無人之境一樣，桂林的保衛戰，不到五天就全部潰敗，連敵人也想不到會這樣容易。

桂系軍閥的頭子李宗仁，其反動的經歷與庶政無能，與人民公敵蔣介石正如半斤與八兩，毫無軒輊，中國人民是認識得很清楚的。

附

錄

勝利前後

八月九日蘇聯對日宣戰，紅軍長驅直入偽滿及朝鮮北部，日寇受到致命打擊，即接受波茨坦宣言，向聯合國無條件投降。處於日寇鐵蹄下達八年之久，忍飢耐寒，竄息下氣的上海人民，興高彩烈，歡欣瘋狂，請以爲從此重見天日，可以揚眉吐氣！然而「不戰而勝」的國民黨統治者所帶給他們的，不僅和敵僞「如出一轍」，而且變本加厲的剝削與掠奪。人民所期望的是「出水火而登衽席」，結果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有人說：「本來是天亮了，却又遇到「晝晦」。」「本文所要寫的就是日本投降前後四個月內，也就是「晝夜」和「晝晦」之中的上海一角的形形色色。（編者按：本文作於一九四五年頗，曾於同年十二月的新華日報連載。）

『百萬皇軍守護上海』

自從法西斯魔王希特勒德國崩潰以後，日本帝國主義的命運如何，已是大家所能斷定；問題只是日寇還能掙扎幾多時日。到琉球島的戰役結束，日寇的崩潰期更爲迫近。從此時起，上海一般人士所探詢，研究，猜測的是：蘇聯會不會提早參戰？（蘇日中立協定雖已由蘇聯通知不再繼續，但滿期還要等到明年四月。）美國軍隊究竟先進攻日本本土？還是先在中國沿海登陸？如果在中國登陸，則先在華南登陸呢？還是在華中——上海及其附近？最關心的還是上海會不會成爲決戰之所！

這並不是過慮，的確有許多事實呈現於人民面前的：在太湖三角洲一帶，敵人集中了七個師團，上海四周就有了五個師團，市郊以及郊外，到處都挖掘工事，所有空地上都造成無數的堦坑，有的構築成砲位或機槍陣地，有的則挖掘食糧及軍需品等。因爲根據日本各都市被轟炸的經驗。食糧被焚燬的威脅最爲嚴

重，所以價值要分欲掩藏避空壕。市內各馬路的人行道上，每隔四五丈就挖下半個人深的小坑，下雨時及雨後就積滿了水，晚上行路稍不小心，就會跌進去。（因永久防空，路燈少而且弱，所照的面積不到方丈。）上海向來流行的話，是「馬路如虎口，當中不可走」，一變而為「路旁不可走」了。那樣的小坑，據說是備老戰用的，山下奉文指揮菲律賓作戰時，在馬尼刺爭奪戰中曾挖過幾小坑大阻礙了美軍的進展。上海馬路上的無數小陷阱，正是日軍準備要滅上海的無言告示。上海四郊，則到處張貼着「百萬皇軍守護上海」的日文標語，及號召上海及四郊日僑全體參加戰爭的宣傳品。

據傳說：希特勒德國失敗後，日本就有人主張早日投降，以保存實力，利用並挑撥美蘇之間的矛盾而專振旗鼓。他們公開宣傳着：「如果希特勒在一年以前就投降——甚至無條件投降，德國既不會敗的這樣慘，也不至於完全由人擺佈。」日本所有都市受到大轟炸以後，這一主張在首腦部已佔優勢，但陸軍將領則一般地反對投降，主張作戰到底。特別是駐華陸軍，主張更為激烈，他們主張必要時放棄日本本土，遷都朝鮮或滿洲，以鮮北及滿洲的工礦資材為憑藉，在中國大陸上與美軍決戰。他們認為這樣還可以打他二三年。據傳說：日本大本營曾派一高級人員（一說為日皇裕仁的胞弟秩父宮親王）到上海來徵詢駐華陸軍將領的意見，在登部隊（第十三軍軍團）司令部開會，登部隊所屬七個師團的師團長，全部反對停戰；席間有人拔出佩刀，斬下自己的手指，說：「要排察議和論調，像截去這個手指一樣斷然！」後來這七個師團長都奉召回國，其中駐紮在蘇州的小林師團長即在返日途中被美國飛機打落瓊海。

『共死圈』

七月十八日起，美國飛機對上海市區作了四次以上的大轟炸，死傷的十分之九是平民，燬損的也多數是平民的房屋財產。這倒不是沒有目標或找不到目標，而是為了敵人的一切軍事機關都已遷入市區，故在居民稠密的場所：如蒲石路通源四雙口十三層樓的華豐公寓，成為登部隊的司令部（原來在市中心區）和警備旅軍監兵司令部（原來設在南京）；雙多區路的浦東同鄉會大廈，靜安寺的平安公寓等都成為重要

軍事機關；以揀整德路馬斯南路呂班路環龍路為界的顧家宅公園（俗稱法國公園）和暨且大學，都是日本軍警監獄場所。七月中旬日本軍部更下令徵用一切五層樓房以上的建築，限令此類大廈以內的商號住戶遷讓。如南京路的起瀨夫樓（大陸商場）、西區各較大的公棧，都接到此項通知。

這幾年來，因日本軍政經濟機關佔用的房屋很多，上等的房屋器機已極嚴重。那些被驅逐出大廈的人住到那裏去呢？於是紛紛找門路請求延緩出讓。日本軍閥居然網開一面，應允各大樓的最高一層可以留給中國人居住，有的則允許最下層的鋪面可以緩讓。為什麼日本軍閥肯給予這些「恩典」呢？它的所以徵用各鋼骨水泥的大建築，是為了防禦空襲，如果這一建築被中彈炸彈炸中，也祇會炸穿一層，那未炸死的是住在最高一層的中國人，他們自己還是安全的。據說十三層的謙慈公寓，其最高兩層並不居住日人，而是作為一部分英美僑民的集中營的。備用這一辦法向美國表示：「你來炸！反正你炸死你們自己人！」

這許多高大建築運於上海市區的一每部分，於是上海已沒有一處安全地方了。如果要轟炸日本的軍事設施，那就必然要殃及鄰近的平民。虹口塘山路附近已死亡數千人，就是為了轟炸日軍的煉油廠未中而遭殃的！如果炸彈直接命中各大建築，則大建築還沒有炸壞，而附近的普通建築却可能已先被震坍了！日本軍閥的如此與華人「親密」，對上海人民的威脅是難以形容的。日寇和漢奸常常宣傳「同生共死」和「東亞共榮圈」，上海人民至此即稱之為「共死圈」！平時日本人吃得胖胖的，中國人則連雜糧也配給不到，餓得剩一張皮，但事到臨頭，却非要你「共死」不可！而且在這「共死圈」之內，日本人恰住在最堅固的建築裏，以圖倖存，所以又有人稱之為「共死圈」中的「倖存點」。

七月中下旬大轟炸之後，市民死傷的很多，許多傷的難胞赴醫院求治時，日本軍管理的許多大醫院，如山東路的仁濟醫院等，都拒絕收受，醫院中雖明明有鋪位，但非先交傷醫三十萬元，不讓受傷者進去。而且在四兩小時內接續漲價，從三十萬而六十萬元，而一百萬元，但也有熱心的醫院，則桌子上都鋪滿了傷胞，把被單揭開包紮紗布，事後偽府及所謂社會名流也曾組織團體，商量籌款救濟。但除偽新中國報發給委贖者捐款，立即發費了二千餘萬元為數之外，其餘數十倍於此的捐款，則直到日本投降，也沒有發放

本部（部長是日人）派員指揮協助，偽市府的人要他們把捐款交去，「統一辦理」；該經手捐款者不願接受此項辦法，偽市府始允派員會同發放，但一再拖延，而且還要捐款者供給他汽車。據日本來人談：東京等都市受空襲的災民，日本政府是免費發給食糧衣服的，但一次空襲以後，一星期也沒有救濟完畢，所以很多人都等候不到，已凍死餓死了！法西斯統治者對其本國人民也好不到那裏，而殘忍腐敗的程度，主子與走狗也如出一轍！

日本投降了

七月下旬到八月下旬，上海市民正處於極嚴重的難關下，偽儲備券的購買力一天天急劇下降，黃金、股票，每天都漲停板（連日漲起百分之十五），停板後的所謂場外交易，投機者早按照着下一天再漲停板的預測價格做買賣，其他物價當然無一不跟着飛漲。除從事投機買賣者之外，一般市民都吃不飽肚皮。普通中上級居民，極少能每日吃飽的，一般都是吃粥或麵，而且絕沒有把握能顧到十月以後怎樣過活。普通人的食米。要離開上海呢，火車輪船都擠得要命，等上三四天還買不到票，黑市不僅加上幾十倍，更有許多人行李鈔票被騙被搶，弄得留不下，去不得。

八月九日蘇聯向日本宣戰了，這一消息震奮了所有中國人，而敏感的上海人則更爲興奮。因爲蘇聯紅軍的威力，在擊潰希特勒德國的戰爭中，已給上海人民以極深的印象。設備最簡陋的蘇聯俱樂部，每逢放映蘇聯戰爭影片，無論那一場都擠得滿坑滿谷；蘇聯的拳戰，第一足以斷定日寇即將迅速失敗，第二足以粉碎日本軍閥憑藉大陸作戰的企圖。特別是第二點，從極殘酷的戰禍恐怖中拯救了上海人民，所以說不出的高興。

十日同盟社突然廣播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但只開了一個頭，沒有繼續下去。而美國黃金山的

廣播則記日本要求保留天皇以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條件等等，全部都說了出來，重慶中央社則大播送各地熱烈慶祝勝利的消息。雖然上海民間的收音機都已割去短波，但秘密保留短波的還有不少，所以日本投降的消息馬上傳遍全市。

日本上海的陸海軍，態度向來是不一致的，虹口一帶所謂「海軍保甲區」，日本海軍當局允許居民慶祝，於是每一家都興高采烈地懸掛國旗，燃放爆竹，而林道栢生所主持的僑中華日報投機出了一張「和平號外」，把同盟社和重慶中央社的廣播，拉雜刊載，市民搶着購買。蘇州河以南的鬧市，馬上也接着懸旗放爆竹，百十萬人民都擁到馬路上，跳着叫着，說不出形容不出的高興。特別是在南京路上，擠得人山人海，每一輛載着日人的汽車過去時，大家把瓜皮擲上去，平時威風凜凜的日本人抱着頭東躲西閃。特別是對着制服戴軍帽的日本人，羣衆把他拖下車來，請他戴一帽八年來他們對中國人所憤恨的耳光滋味。有的則把軍帽拉下來在腳底下踐幾下。這樣，稍稍發洩一下八年來所積的怨氣。平時兇狠如虎狼的日本軍人在羣衆的怒潮下嚇得噤也不敢時一聲。

但日本陸軍並不同意把這一消息發表，日本在滬陸海軍及大使館事務所所合組的「弘報局」通知各僑報：「下午九時有正式新聞發表；除此以外不許刊載一字。」到了九時，又通知要十一時發表；十一時又通知要十二時；十二時却說：「不發表了。」於是十一日的各僑報上沒有一字記載，祇有僑書長羅道君強發表了一篇勸告大家「鎮靜」的文章。

馬路上站滿了武裝的日軍，依然驕倨地鎮壓民衆，若干國旗都被敵軍扯下了。僑中華日報的總編輯楊道邁演，則因撞出「和平號外」而被日本憲兵隊捉去，其他因議論日本投降而被捕的也時有所聞。

三位一體

日本正式宣佈投降的（天八月十五日），漢奸大頭子周佛海對僑中央儲備銀行的職員訓話，說：「中央已有命令下來，對本行職員一律保障，不僅安全有保障，職業也有保障。希望大家安心工作。」爲什

應他敢這樣說呢？原來周逆佛海早在二三年前和顧祝同、戴笠相勾搭，進行「和平」活動，去年小磯內閣對蔣介石所提出的「議和」條件，就是經周佛海之手送到重慶去的。

日本投降消息一傳出，周逆就拍了一個電報給蔣介石，大意說：他將結合稅警團、保安隊和警察的一萬多實力，保持上海的完整，以奉給與中央，「職與其死在共產黨之手，寧願死於主席之前！」據說：蔣介石接到這個電報後，非常高興，立即叫秘書覆電嘉獎。後來有人勸蔣直接答覆周逆，於面子上不大好看，所以「嘉獎」的覆電沒有直接給周逆而由蔣伯誠間接轉達的。

這位蔣伯誠「將軍」，國民黨上海黨政統一委員會的主任委員，去年八月間在上海被日本憲兵隊逮捕了，不久之後，即由周佛海的親信夫保出來，日本憲兵隊怎樣會釋放他？那是不便深究的事。日本一投降，蔣介石就派他做「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駐滬代表」，就成立了「委員長代表公署」。

蔣伯誠「將軍」在上海是比較高級的「中央大員」，但他沒有公開做什麼事情。據說是因為血壓高，不能見客，所以不願多管閒事。實際上並不如此簡單，他所見的是「貴客」，所辦的是「大事」。據消息靈通者說：「日本投降後，登部隊的參謀長兼上海陸軍部長川本少將曾奉命拜訪蔣伯誠，提出下列建議：

『為切實執行中日合作，日本駐華陸軍可改編為「剿共志願軍」，或改入中國籍，成爲中國「國軍」以協助中國政府剿共。』

蔣代表甚爲嘉許，立即發電向重慶報告並請示。據說重慶最高當局對此極爲滿意。

在這一大事之外，蔣代表還做過一件小事。出版「國定教科書」的「中國聯合出版公司」，被「地下工作者」查封了，蔣代表大發雷霆，立即下令啓封，由「中國聯合出版公司」自行清理。該公司在報上登了一則清償啓事，說：「本公司爲對抗敵偽文化侵略而設，現在抗戰勝利，本公司任勞任怨，即日清償清理。」包辦敵偽所編纂「國定教科書」的出版與發行的「中國聯合出版公司」，可以自稱爲「對抗敵偽文化侵略」。那南京的偽官偽將當然都是「對抗敵人的政治侵略、軍事侵略、經濟侵略」的「功臣」了！

偽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兼偽江蘇省長任道援道就任「南京先遣軍司令」的新聞發表了，民衆都莫明其妙

，有一位老國民黨員打電報給蔣介石說：『任逆居然給以名義，聞之痛心！』後來知道有名義的不僅任逆一人，南北各地大漢奸，都奉到『革命』的。周佛海的新任命爲『軍事委員會別動隊上海行動總隊指揮』是和任逆的任命同時得到的，因爲周逆比較調皮，他先去向日本軍部請示、解釋，獲得日本主子的諒解了，然後公開就職，所以周逆就任『行動總指揮』的新聞，比任逆遲了三五天。

報界敗類金逆耀白，是周逆佛海手下的紅人，一身兼金融、新聞、律師三界的領袖，不久之前，以八十餘（八百兩）黃金購進一住宅。他對部屬說：『過去是混混的，老中央來後，我才真正兜得轉（有面子，有辦法）哩！』

『新太子派』

第一個在上海出現的『中央大員』是『軍委會宣傳委員』何民魂（比蔣伯誠還早一天），那位何老先生是反共的老前輩，到淪陷區已有相當年月，據說他擔任的是『策反』工作，日本投降後，在南京上海各成立辦公署，並設立各地區的地方工作委員會。所搜羅的人物，真是五光十色。南京的工作人員是王逆敬中（僞內次、教次、僞江蘇省財政廳長），戴逆英夫（僞教次、僞組織部副部長、僞上海市教育局長）等，江蘇省的負責人金逆家鳳（僞中委兼華中運輸公司——日本的國策會社，爲華中振興會社的子公司——總裁），上海地方工作委員會的負責人是王克修，僞市金庫復興銀行的秘書。據說王克修是蔣經國的人，參加蔣經國所領導的小組織的。因爲蔣介石認爲戴逆所負責的藍衣社，太偏於情報與行動，且聲名太顯，人家對他既怕且恨，不能担当組織鬥爭與政治鬥爭的任務，所以叫蔣經國另起爐灶，組織『新太子派』，名叫『建國社』，作爲嫡系中的嫡系。王克修奉派到上海來，把羅逆君強吸收進『新太子派』，而王克修就在羅逆任董事長的『復興銀行』裏擔任『秘書』。

所以在日本投降前後，羅逆君強非常賣力，八月十日晚上發表『勸告上海市民』『鎮靜』的文章，十四日就『市警局長』兼職，十六日以後，統率僞保安司令部及僞警察局在主要馬路上白天宣佈戒嚴，以

便利日本軍隊日本機關運物資及礦產、發掘物資。

日本一投降，上海市區馬上軍行宵禁，晚上十時以後即禁止行人及車馬通行。要走路就必須向偽保安司令部領取通行證。因此，所以竟歷派來或自稱是「地下工作」的中央人員，都取得了偽保安司令部的「通行證」。這和「投降」後的日本軍隊依然雄赳赳地高視闊步的站在交通要道「維持治安」，有「異曲同工」之妙。

周逆就任「上海行動總隊總指揮」後，羅逆及熊逆劍東等任副指揮，但總指揮部的實權則操於「總書長」兼「軍法處長」程克祥之手，「總指揮部」設有「秘書長辦公廳」，其下分設各處，南京偽府的「部長」及偽上海市府的「局長」大都成了「秘書長辦公廳」的「參事」或「專員」，「少將」級的幾近百名。爲什麼有此不倫不類的機構呢？因爲程克祥是戴笠的人，周逆佛海要露他保鏢。

日本投降後半個月內，上海盛傳蔣經國要到上海任警備司令或警察局長，所以羅逆羣強非常安心。後來消息傳來，淞滬警備總司令是錢大鈞，副司令爲李及蘭，而市警察局長則爲宣鐵吾，蔣經國派到了東北去。於是王克修所接收的「新中國報」及「小報」（改名爲「革新日報」及「上海晚報」）又被前綫日報所接收。而羅逆君強也隨周逆佛海、丁逆獸郵飛去重慶。

關於吳紹澍

從內地來到上海的國民黨「大員」，第一個是吳紹澍，他的頭銜之多，足以駭人：（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兼上海特別市黨部委員，（二）三民主義青年團上海支團部團長；（三）國民政府上海政治特派員，（四）軍事委員會上海軍事特派員，後來又加上（五）上海市副市長，及（六）上海市社會局長，黨政軍民一手抓，聲勢之盛，氣焰之高，無以復加。除市黨部和三青团支團部以外，還設立了政治，軍事兩特派員公署，爪牙密佈，四出查封并接收殘廢遺產。因爲他一身兼黨政要職，所以許多漢奸都隨他的門路，貢獻賄物以取得諒解。據極不完全的估計，他在一個月以內，接收到一千餘幢房屋（多數是洋房）。

八九百輛汽車，黃金在一萬條以上（解放區的報上說是二三千條，實在太低估了吳主席，據說那是李士羣的內弟葉權先一人就送給他一千餘條），其他珠寶無算。日本「弘報部」（陸海軍及大東亞省聯合組成的宣傳機關，敵偽出版機關的黨報紙的副給者）的存紙五萬餘令，也經錢芥塵拉攏，由日本大使館的福蘭領事送給了吳紹澍。（錢芥塵是晶報的老板，「八一三」戰役結束，即受日方津貼以晶報作側面宣傳，並供給敵人情報，一方面又與國民黨的馮有真吳紹澍等互相通氣。這次吳紹澍等取得了日本的紙張——雖然那本是應該交給中國的東西——據說對錢極爲嘉許）

因爲他權大勢盛而金條更多，所以引起別人的不滿。據傳錢大鈞在重慶曾對人說：「上海既有了吳紹澍，我也用不到了！」這句話傳到上海，吳紹澍一想不妥，馬上領銜電迎「錢市長迅速來滬」。

馮恩白錢大鈞戴笠等相繼到滬之後，吳紹澍的氣餒較低，各方面都有對他不利的傳說（主要是爲了他撈得過多，太肥了），他放出空氣說：「上海市政府即將改組，市長將由朱家驊繼任。」因爲他是朱家驊一手提拔的，關係最切，絃外之音，就是「反正我吳紹澍在上海的勢力是不會倒的」。戴笠到了上海，拚命攔阻吳紹澍的錯處，接二連三地向重慶報告，據說重慶來電召吳去，但吳揮着不去，希望有人轉圜。到了十月底，他正坐着某漢好送給他的保險汽車出外，在路上被人打了四槍，手槍子彈打在保險玻璃上當然毫無損傷，但吳不免有些吃驚。事後調查，證明是戴笠派人嚇他，他知道揮着不走是不行了，十一月三日始飛到重慶去。不久之後，副市長就換了前任工部局會辦的何德奎。據說在重慶曾有人主張槍斃吳紹澍，「以肅官箴」，但後來有人爲他緩頰，說：「吳紹澍是中央所派到上海去的第一個大員，如果辦了，與中央面子有關。」

另一說：吳紹澍的能夠回上海，是和戴笠妥協的結果，妥協的條件，是吳紹澍送了相等於兩萬條黃金價格的財產給戴笠。

軍事特派員公署的負責人是「秘書長」周孝伯，據說他發的財僅次於吳紹澍。周孝伯原來是吳開先的秘書，一九四一年被捕後即公開附逆，任周逆佛海所轄「中央信託公司」要職，發了實國財，在國際飯店

與舞女小花狗(外號)結婚，極富麗奢華之能事。後因投機失敗，「小花狗」下堂求去，周孝伯逃債逃到屯溪，一年後又以「中央人員」的姿態回到了上海。因為他和奸商奸商都有一些「交情」，所以那裏有物資可搬。那裏有油水可揩，什麼人可以被騙，什麼地方可以搶，什麼房子可封，駕輕就熟，便利得很，所以一到就發了不少財。

社會部特派員陸京士接頭到了上海，因民衆團體都由市黨部派人整理，他無從控制，因此與吳紹澍暗鬥甚烈。陸京士和吳紹澍都是杜月笙的門生，但吳並不把杜放在眼裏，陸即運用杜門諸關係反吳；同時因魏笠不滿意吳紹澍，陸與魏及賀衷寒素有連繫，魏委陸為「工人忠義救國軍總指揮」，向偽警察局取得一些槍支，成立總指揮部。由於吳陸兩人的爭奪「工運」領導，大家向失業工人騙取會費，而且還害了一部分工人去吃冤枉官司。

「忠救」與中美合作所

八月二十日左右，上海盛傳有那一批「國軍」從溫州到了浦東，其中有美國顧問與美國教官，即將到滬。那一天早晨就有許多人聚在黃浦灘等候，準備好了爆竹、軍樂隊，還有插滿國旗紫着彩的大卡車，愛多亞路上斷絕交通達半日之久，結果是毫無影響，到下午二時許，大家無精打彩地走了，原來預定來上海的所謂國軍是忠義救國軍張阿六部隊(浦東的土匪地痞)，一切都接洽好了，但「維持治安」的日本軍部却不答應，發出了命令禁止張都登陸。交涉一無效，於是張阿六的聯絡參謀坐了汽艇迎上去叫他們退回浦東。

109

過了幾天，「忠救」淞滬區的指揮官阮清源(即袁亞承)率領了一羣黑衣破舊，挾着席子的赤兵非民的人，分乘卡車數十輛進入上海，阮清源之下又分設四個區指揮，其下又有支部、大隊、中隊、小隊。其中有一個區副指揮是著名賭台老闆朱顯林，他的作法是最直接痛快的，有人去投効，先繳傷幣十萬元至五十萬元，就發一張身份證給他，他可以出去「辦公事」，「辦事」，至少得帶五百萬元，最大

的一標，據說在十萬元以上。經手辦「公事」的人可以提一成到二成的獎金，再根據所辦公事肥瘠分派贖位。所以只要經手辦一樁起碼公事就以一本數利。因此他門庭若市，手下有數十個大隊長。朱順林刮了不少錢，就購辦軍裝、被服、汽車、汽油等等，發給阮清源。

戴笠的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對外用「中美合作所」的名義，總部即設在杜美路七十號杜月笙的新宅裏。『中美合作所』本身有武裝部隊，警車叫「定平」，所以逮捕漢奸等事，都由「軍統局」的特務指揮「定平」部隊執行，所以實權最大。淞滬警備司令部的稽察處，完全由「軍統局」負責，總司令副總司令不僅不能過問稽察處做些什麼，甚至連稽察處有些什麼人，都不得而知。

大概因為阮清源對戴笠的尊敬太少，十月初旬戴笠把阮清源扣押起來，到了十月下旬，甚至帶了手槍移送法院。這一件事引起「忠救」人員的憤慨。因為阮清源是「忠救」元勳之一，他曾幾次率領部隊進入淪陷區，既會「抗」過「日」，更大大地「反」過「共」，對戴老圃是有過功績的。就說是他到了上海後，敲竹槓，發勝利財，也並非他一人如此，不應獨辦他一個。而且退一百步說，他的罪惡無論如何比漢奸要抵些，漢奸帶軍隊的尚且一個也不提，交職的漢奸難提了一些，但到十一月底止，只有三十餘個不關重要的解送法院，而對阮清源獨嚴厲如此！大家認為戴老圃手段未免太辣——特別是對自己的部下。

如果說是爲了做榜樣，所以對自己部下要嚴吧！則陳恭澍（著「藍衣社黑幕」，曾任南京「特工」上海區長）（萬里浪（南京「特工」浙江區長）、「政治保衛局第一局局長」）等叛徒都照常任用，阮清源的罪終不至於超過陳恭澍、萬里浪等吧！

關於戴笠部下在上海的「廉潔」程度，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其全貌：九月下旬戴笠在杜美路七十號召集全體幹部訓話，門內門外停下了黑牌汽車四百餘輛之多。「軍統局」工作人員的每月薪津，沒有人超過法幣十萬元的，而普通都在二萬元以下。這幾個錢連黃包車都坐不起，怎能坐汽車？

「以毒攻毒」

上海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以前，曾經幾次破壞，特別是奚培文的破壞，把「所有的團員都出賣了」。奚培文是三青團上海支部書記，他拿上海全部團員的名冊向汪精衛的「特工總部」買了二十萬塊錢，另外當然還得到一個漢奸官職。漢奸特工就根據了名冊，一一逮捕或勒索，一個普通團員，大概納五六百元以至千元的「手續費」，「交際費」，「特工們成說：你的姓名已勾去了」。所以連西「特工總部」捉到很多人（這些人當然變成「和平運動」的幹部）之外，還營了不少財，其收入數十倍於收買奚培文的價格。太平洋戰爭之後，三青團的總務部長送一箱文件單據到屯溪去，路上被憲兵抄到了，於是又破獲了一次。從此以後，三青團在上海的組織，究竟有無，已成問題（沒有什麼活動，那是毫無疑問）。

日本一投降，三青團卻是最活躍的一個單位，除滿街貼「蔣團長萬歲」「擁護吳支團長」之類的標語，及印貼各種傳單之外，以謂最熱心的就是封房子、搬貨物、搶傢具。查封房屋最多的，在重慶來的機關單位之中，三青團考第一在。日本宣佈投降後的第三天，三青團在古拔路北端去封一家南京僑軍官的房子，那位僑軍官是汪精衛的親戚，頭寸也不大，照理是毫無反抗餘地的，不料此人却早有路道，已變了「地下工作者」，一個電話出去，僑保安司令部派了保安隊趕來保護，三青團有槍，僑保安隊的槍更多，於是僵持半天，三青團只好搖旗息鼓而去。上海最大的漢奸報，存紙最多的「中華日報」，也由三青團接收，改出「青年日報」。

三青團的分子，一部分是林道柏生所領導的「青少年隊」等（其中一部分幹部本來是三青團去的，現在算是「復員」），還有一部分則是漢奸特工及日本憲兵隊密探等。他們都搖身一變而為「地下工作者」。曾有人問過三青團的負責人，為什麼收容這些人物？據答：通過他們才能知道漢奸的確跡與財產，此之謂「以毒攻毒」！

所謂「中央的正式部隊」，最早到上海的是「中央憲兵司令部特派上海憲兵隊」。這個名稱既極特殊，組織更為特殊，因為到上海的既是一個隊長叫做姜公美，其餘均在上海就地招募，流氓、地痞、漢奸、

曹錕、販紅丸的、賣鴉片的、開賭台的、拐賣婦女的、一應俱全，而且全是這一些分子。當然，所發的工作無非是：查封、接收、逮捕、扣押、購斤額……，直到憲兵二十三團開到上海以後，姜公美的上海罷兵臨才結束。先是集中整訓，其次是解散，而姜公美本人則在各方攻擊之下，解送到南東去，但他的部下，則最起碼的人也發了為數萬萬元的勝利財了。

據姜公美自稱，他的如此下場，實在冤枉。因為他沒有說過別人的壞話，而別人則專說他的壞話，把自己做的事也加在他的身上。言下大有「好人難做」之概。

的確，姜公美是「好人」，他曾忠實執行當局的政策：第一，他曾命令他的部下，捉到漢奸，有錢即放，捉到共產黨，則可先殺後報，而且不要正式辦公文；第二，他曾收編了一些日本兵在他的憲兵隊工作，如是忠心耿耿，「功在黨國」，而為了一些貪污勒索的小事（何況那是大家有份的），而要懲辦他，怪不得他要不服氣。

接收報館

「共產分子」從「地下」一鑽出來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搶報館。國民黨反動派對於人民的言論出版，限制不遑餘力，但他們自己却深知言論出版的重要，在總的方面說，當然要控制一切，包辦一切，而內部各系派則你爭我奪，大家都想先下手為強。所以搶奪得最激烈的就是報館。

在日本投降之前，上海所有的敵僞報紙，計有下列各家：（一）日文大陸新報，在黃浦灘十七號英商字林西報館原址，為日本陸海軍的機關報。（二）新申報，由大陸新報社經營，等於大陸新報的華文版，地址同上。（三）中華日報，南京偽府的正式機關報，直屬僑宣傳部，社長為許逆柏生，代理社長為許逆力求，地址在北河南路原市商會國貨商品陳列。所遺逆尊嶽繼任僑宣傳部長後，該報人士並無變動。（四）新中國報，在河南路與漢口路轉角，董事長周逆佛海，實際上由日方直接支持，與日本大使館關係較密切；另出一八兩張報，名「小報」。（五）平報，周逆佛海、羅逆君強緊的機關報，地址在四馬路中市，

於日本投降前半個月停刊。(六)國民新聞，爲「特工總部」的機關報，董事長也是周連佛海，實際上爲李思浩的工具，地址在滬西靜安寺路，於日本投降前一個多月停刊。(七)申報，由日本海軍管理，社長陳逆彬猷。(八)新聞報，也是日本海軍管理，社長爲李思浩，副社長陳逆日平，李思浩的出任「新聞報社長」，且担任「全國新聞協會會長」，據說會徵得蔣介石同意的。

關於這些報館的「接收」，頗有一般曲折，甚至有接連三四次的。除「平報」早和吳紹澍事前有接洽，即由吳紹澍接收，出版「正言報」，並無其他糾葛外，其他各報都或多或少他有波折：

「中華日報」先由三香園接收，改出「青年日報」，後來重慶中宣部認爲偽中華日報是偽中央報機關，應由中央機關接收，命令撥給「民國日報」，但青年日報握持着不移交，而民國日報名義上的社長胡樸安先生是一位不會與人爭奪的長者，所以也就接收不到，只好借新聞報印刷。

「國民新聞」先送給CC團的朱應鵠（「國民新聞」的「副社長」黃逆敬齋本CC出身），出版「光華日報」，後來又代印「中美日報」，「時忠新報」，「大美晚報」。但偽國民新聞爲「特工」機關報，所以十一月又由簽發的軍統局接辦。

「新中國報」本來是預備送給第三戰區顧祝同的，日本投降的十五日晚上，CC特務「中央調查統計局駐滬專員」劉青白（化名）派人去接收，十六日又有吳紹澍系統的「地下總部」武裝接收，出版「正義報」；十七日被刊民魂趕跑，改出「新新日報」；八天之後，又有顧祝同的「前綫日報」奉命接收，而同時「文匯報」也奉「中宣部東南專員」馮有真之命接受，把革新日報的財產共同封起來，明天，馮有真的「中央日報」又來接收。於是以前中央日報爲主，前綫日報文匯報都擠在裏面。好在每家都出幾千份報，一架機器也來得及印刷。

「大陸新報」和「新申報」大家都去搶過，而前綫日報又志在必得，但日本人在門口架着機關槍，沒有人敢去，最後始由湯恩伯接收，改出「改造日報」（日文版）。

「新聞報」一度由簽發部下的陸默接收，竟沒有同意，令陳默退還，但李思浩不肯再收，直到詹文滄

到滬後，勒令停刊，聽候整理。「申報」自陳彬猷離滬後，內部無改變，報面上大捧程克祿（周佛海的秘書長），當然是傾向戴笠的，結果也勒令停刊。到十一月二十二日新聞報在程滄波指導、詹文滄經理之下復刊，申報在潘公展指導、陳訓念經理之下復刊，都成了CC的天下。

發了一筆大財

日本投降以後，大家所最關心的是「儲備票」怎麼辦。因為從一九四二年起，淪陷區的法幣已被敵偽強迫收去，以「二作一」換了偽幣，所有淪陷區的人民，都和偽幣有關係。偽幣的前途如何，成為大家的切身問題。特別是大部分的偽幣分散在農民和小販手中，真正有錢的人，財產數千萬數萬萬數十萬萬數百萬萬的，則絕大多數已變成了物資，對偽幣如何處理，比率如何，都沒有問題的；大多數保有幾十萬幾百萬偽幣的人，則買不起物資，又必須藉此應付生活，則偽幣比率的大小，成為嚴重的問題。

日本投降後，一般對偽幣處理方法的意見有下列幾種：（一）過去敵偽以「二作一」換成法幣，現在應以「一作二」換成法幣，使老百姓不吃虧。當然數目甚大，那應向日本索贖；（二）照上海物價和重慶物價相差的倍數，即偽幣與法幣的購買力，規定比率；大體上是二十五比一，即偽幣二十五元作法幣一元；（三）以偽儲備銀行所有的黃金等準備，照重慶財政部的官價折成法幣，以收兌偽幣。照這個標準計算，偽儲備銀行的發行額，據周逆佛海宣佈是一萬九千萬萬元，照一般的最大估計是三萬八千萬萬元，即較周逆所宣佈的加一倍；而偽儲備銀行的準備，僅黃金一項為五十萬七千兩；以當時重慶的官價每兩七十萬元計，值法幣八百六十一萬九千元，即每四十四元偽幣合法幣一元。

後來重慶的黃金官價，從每兩十七萬元減為售出價八萬九千元，收進價八萬五千元。如照售出價計算，偽儲備銀行的黃金值四百五十一萬三千三百萬元；照收進價計算，為法幣四百三十萬零九千五百萬元。照前者計算，每法幣一元可以收回偽幣八十四元，照後者計算，則每法幣一元可以收回偽幣八十八元。

當然，照第一種辦法是不可能實現的，但最低限度應該照第三種標準折合，因為這對政府是毫無損失的。雖然照那樣計算，淪陷區的老百姓已吃虧很大，過去的法幣被敵偽以「二作一」取去，換成了偽幣，現在又要以數十倍之多的偽幣換回法幣。

然而國民黨當局所定的比率，却是二百作一。「財政部長」俞鴻鈞發表談話，還說：政府顧念人民，不使人民過受損失。事實上單是接收到黃金，只要售去百分之四十，就足以收回全部偽幣了。僅僅是這一樁事，國民黨政府，就賺到黃金三十萬兩，合法幣二百七十萬萬元。

另外，更有一個奇怪的辦法，就是偽幣整理之前，已有不少學者建議，應防止因為偽幣收兌而更加造成通貨膨脹，所以應將大宗偽幣凍結。然而「財政金融特派員」陳健庵（行）的辦法，則命令各銀行錢莊自行清理偽幣存欠，道檯一來，把所有的偽幣全部趕上了市場，於是競相購買物資，互相拋出偽幣，造成物價空前高漲的速度。凍結當然談不到，而每一張偽幣也都要以法幣換回來。

總之，一句話，老百姓倒霉，國民黨政府大發一筆橫財。

湯恩伯與錢大鈞

對於接收上海，「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同時他又是「軍委會的東南行轅主任」，備制七、九、十戰區）會事先有過詳細佈置，派了許多人在上海，與敵人及漢奸都有長久的連絡。日本一宣佈投降，他即電周佛海轉告岡村寧次，要他派員向顧接洽投降。而在上海一地，三戰區的機關計有聯絡處、辦事處、聯絡委員會、宣導組、先遣警衛隊、及其某聯絡站等，總計達十餘單位。在顧祝同的心目中，南京、上海一定是由他接收的。不料後來重慶命令發表，京滬由「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受降」接收，使顧祝同大失所望。

為什麼會有這樣變動呢？據說是何應欽玩的花樣，他認為顧祝同在京滬一帶早有部署，如由他「受降」接收，就一切抓在他手裏，何應欽就沒有權利了。何應欽向蔣介石建議，蔣也認為顧祝同是江蘇人，且

久在江蘇，如蔣收京滬，將形應一雄厚的地方勢力，所以改派了與京滬江蘇沒有地方關係的湯恩伯。

湯恩伯到上海的一天，蘇商時代日報正連續譯載蘇聯雜誌關於檢討中國抗戰軍事的文章，那一天剛剛登載一九四四年河南戰役湯將軍命令他的士兵爲他搬運工廠及商島的情形，使人回憶起河南羣衆中所流傳的「河南四殃，水旱蝗湯！」

到滬「受降」的湯將軍，據說有這樣一個故事：

湯在華盛公寓接見日本登部隊（第十三軍團）司令官松井中將，湯開口說：「對不起，今天要在這裏來談……」坐在旁邊的美國顧問一聽之後，立即報告他說：「將軍！你要顧到你的地位，你是戰勝者，對於投降的人沒有什麼「對不起」，你應該說「我命令你」……」這樣，才重新用命令口吻發言。據說後來湯恩伯與松井單獨會見的時候，曾說：「早知如是，我們應該預先演習一下。」

湯恩伯的所以被派到上海——全國最重要最富庶的收復區——來，主要因爲他對蔣的服從心較強，他的政治野心較小，容易控制。因此，他到上海後相當謹慎，深怕特務去蔣前觸他的壁腳。

錢大鈞過去曾任淞滬警備司令，給上海人的印象是胡塗庸碌，這大概就是他被派到上海來的主要原因。錢市長還兼任淞滬警備總司令，一身兼軍政重任。實際上市政府的各局長都有與錢與錢會地位，非市長所能指揮，而市府本身的實權操在祕書長沈士驥之手，淞滬警備總司令部則完全由副總司令李及蘭主持，錢大鈞完全不加過問。

那末錢大鈞做些什麼呢？唯一的工作就是招待外國人——特別是美國人。他的日常工作，是舉行雞尾酒會，招待嘉賓。因此上海的中下級人，說他是「鹹水妹」的兒子，看到外國人都是他的爸爸！

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中，重慶來的官吏和原來留在上海的人員而復員的（沒有參加偽組織的）差別，是很大的。重慶來的（以下簡稱「重慶人」）薪給爲底薪的一百倍，留在上海的（以下簡稱「上海人」）爲底薪的六十倍；米貼呢，重慶來的爲法幣一萬六千元，留在上海的爲法幣四千元。機關中間飯時，「重慶人」的桌子上有六個菜到八個菜，「上海人」的桌子上只有四個菜。「重慶人」和「上海人」，分成兩個世界

。而工作效率上「重慶人」的工作既深，貪污方法尤其笨拙而顯明；因此一般「上海人」都瞧不起「重慶人」。

接收敵產與逮捕漢奸

「受降」接收人員以及自命接收人員一到上海，當然都搶着接收敵偽財產和查封漢奸財產，搶得愈多愈好。但因蔣介石所任命的「受降長官」遲遲發表，給日本人以騷擾、損壞、移轉變賣的機會。湯恩伯到上海後，成立了兩個接收委員會：軍用品接收委員會以三方面軍副司令官張雪中為主委，非軍用品接收委員會以市政府秘書長沈士華為主委，統一接收敵偽財產。另外則財政金融、產業、交通、電信等都由財政、經濟、交通部派員，受三方面軍的統一領導。但除敵人軍事有關者外，其他敵偽財產已均被先來者接收過一次或幾次，而大部分的機器零件以及價值高貴的東西，多數被接收到接收人員的私囊中去。其中也有較清白守法的，那就是接收之後百事不管。有一個皮革廠在被接收的時候，有三千張牛皮浸在池裏，一工廠職工再三叮囑接收的人，說：這些牛皮已浸了幾天，在一星期內必須製好，否則就要爛掉，沒有用了。那分職工說：「這些牛皮過去是日本人的，現在是中國的了，不應讓它毀掉。」但是那接收的人說：「我奉命接收，沒有奉命開工。」於是這三千張牛皮，祇有讓它爛掉——雖然那時市面上的皮革非常缺乏，而市價也很高。

所以國民黨一接收之後，上海的失業工人增加了幾十萬。其它貪污舞弊的故事，流傳甚多，數說不盡。十月中旬宋子文到上海來，命令各接收機關分別報告經過情形，及接收物品的細目。宋子文一回重慶，即發表設立一個全國性的敵偽產業處理委員會及上海敵偽產業處理局，統一管轄敵產，這個委員會的秘書長及上海處理局長由劉攻芸一人兼任。這一位置其重要與肥饒或超過任何部長吧，但劉攻芸是怎樣一個人，上海人都非常生疏。劉攻芸是重慶金融界新起的紅人，美國留學生，曾在郵政儲金匯業局儲蓄處工作，受知於徐柏園，前年重慶發動國民儲蓄運動時，他即任聯合儲金處處長，他擬了一些計劃，深得蔣的

着跡，從此一帆風順，歷任中國農民銀行副經理及郵政儲蓄局局長。雙十節他也得到『勝利勳章』。

至於軍用品的接收，據張雲中報告：共計繳到日本的槍支六萬左右。但上海地區的日軍陸軍，大家都知道有二十餘萬，如果包括在鄉軍人及民警團（都有槍的）等應有三十萬人，爲什麼祇有這一些槍呢？那是一個無從查問的祕密。當然日本人曾毀壞了一部分，但決不會相差如此之巨。

漢奸們自日本投降後，一向逍遙法外，直到九月廿七日才開始逮捕。當時大家拍手稱慶，說：『那現在真天亮了！』但發表名單祇有三天，三天以後，就不再發表了。原來這中間是另有機密交代的，國民黨本來不願意逮捕漢奸的，但外受英美美的壓迫，內受人民的督促，所以不能不提。事前美國人曾說：『南京僑府曾向英美宣戰，如果國民黨不加逮捕，則盟國將提出戰爭罪犯的名單。因此國民黨覺得不能完全庇護，祇好擇要逮捕，而公佈名單，以示懲辦。但是公佈名單後，就不能上下其手，所以三天後即不再公佈。逮捕的漢奸，據說是有定價的：小漢奸自法幣三十萬元起，大漢奸則爲黃金萬兩，上海流行一句話：『不怕犯天大的罪惡，只要有等身的黃金』。

聽說有一個『維新政府』時代的『立法委員』，去向逮捕漢奸機關自首（因爲他去偽職『簡任』，依法應逮捕的），但得到的回答是：『你窮得連飯都吃不飽，誰要捉你！』所以有了錢，不是漢奸也會有人找到你頭上，沒有錢則真正做漢奸的人也沒有人會捉。

僞官可用，僞學生要罰

錢大鈞的市政府成立後，對於留在淪陷區而沒有落水的舊市府職員的復任問題，甄別審查極爲嚴格，而且錄用時大都降級，待遇更與重慶來的大相懸殊。然而對於僑市政府的大小職員則繼續任用的不少，因爲重慶來的官吏和南京系統的僑市府各機關，是辦理移交手續的，和前後任辦理交接印的關係毫無差別。因此，有許多職員大都留用，『以資熟手』！

特別是財政局，爲了徵稅的便利，尤其大批留用僱員。市政府爲了徵收營業稅及奢侈稅（筵席捐及娼

辦精)，由財政局召集各商會人開會，財政局主席說明稅率及徵收手續的一位副市長，上海商人對他很熟悉，原來他就是以前在舊租界局裏時代的副市長。有許多商人感到莫明其妙：『在舊時代是他收稅，現在『中央』來了，為什麼又是他來向我們徵收捐稅？』

上海市的屠宰稅第一第二條稅則主任黃其和葛某，就是過去漢奸時代的屠宰稅徵收所所長主任，一個是舊租界工會第一理事長，一個是舊公會第一秘書長，平時想出許多方法來剝削肉商，敲榨徵納，向商人們徵收捐稅。現在看見他們仍舊高懸在鮮肉商人的頭上，大膽不滿，就刊登廣告，痛斥其過去的行為，要求撤換。第二日，黃其和葛也刊登廣告反駁，說他們的參加組織，是自主官機關考查，無庸問任何人管轄。大約想出各種方法來剝削老百姓，就是他們的『地下工作』！

國民黨對官制此舉，可是另一方面對學生却極爲嚴厲。上海的國立學校，如交通大學和上海醫學院，雖然已內遷，但大部分儀器都留在上海，沒有能搬遷。湯府成立後，不斷企圖搬遷這些儀器，因此就開始復校了，當然這些學校成了漢奸系統下的學校。但像一般的見解，這些學校的設備比較良好，比較遷移後方的學校要強一些，因為上海的原有科學設備較全，教學比較上也還認真。至於偽化思想問題，在上海各大學中，除趙道平平的偽上海大學，和遷徙復校的偽上海商學院外，比較微薄。然而日本投降以後，各學校一律停課，兩個月以後都沒有開學消息，學生們四處呼籲，要求給予繼續求學的機會。到十月下旬，國共黨宣佈了甄別辦法，要求各大學入『六學補修班』。半年至二年，然後再補級。而『補修班』的內容側重思想教育，顯然是一所變相的法西斯集中營。所以學生都不願意。十一月初國民黨教育部長朱家驊到上海視察，學生向他請願，他就召集學生訓話：『誰叫你們不到後方去的！你們要幸福，留在上海，受偽化教育，那你們就應該吃苦！叫你們停學一年或二年，那是最客氣的了，你們要知道：這是你們應該受到的懲戒！』

上海學生們給他的回答是『學生無偽』。偽官可用，偽學生反而一定要懲戒，難道學生有什麼罪惡，而且其罪惡還超過漢奸官吏嗎？這樣的措措，遠是接近國民黨的實際代言人的大公報也於十一月初曾發表

了一篇社論，要求當局重視青年，不要把青年都趕跑了。

然而國民黨的方針，並不是這號青年學生的僵化不變化，而是要青年學生全部法西斯化；你看：爲青年學校的「幹部」不是有許多已變成了「三青團」的幹部嗎？

4944

